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2/17  
27 December 199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0(a)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特别是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特别报告员 P. 科伊曼斯先生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1991/38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	1 - 5	1
<u>章 次</u>		
一、职权范围及工作方法 .....	6 - 19	1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	20 - 269	5
A. 紧急行动 .....	20 - 22	5
B. 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23 - 24	5
C. 与各政府的信件来往 .....	25 - 269	6
巴 林 .....	25 - 27	6
孟加拉国 .....	28 - 31	7
伯利兹.....	32	8
巴 西 .....	33 - 35	8
保加利亚.....	36	9
布隆迪.....	37	9
喀麦隆 .....	38	10
智 利 .....	39 - 40	10
中 国 .....	41 - 47	12
哥伦比亚 .....	48 - 51	15
古 巴 .....	52 - 61	16
吉布提.....	62 - 65	18
多米尼加共和国.....	66	20
厄瓜多尔 .....	67 - 71	20
埃 及 .....	72 - 86	23
萨尔瓦多 .....	87 - 94	27
赤道几内亚 .....	95 - 97	30
埃塞俄比亚 .....	98	31
希 腊 .....	99 - 101	31
危地马拉 .....	102 - 105	33

目 录(续)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海 地 .....	106 - 108	35
洪都拉斯.....	109 - 113	36
印 度 .....	114	39
印度尼西亚 .....	115 - 117	3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118 - 124	41
伊拉克 .....	125 - 126	43
以色列 .....	127 - 130	43
意大利.....	131 - 135	47
约旦.....	136	48
肯尼亚 .....	137 - 139	48
科威特 .....	140 - 144	49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45	51
马拉维.....	146	52
马来西亚 .....	147	52
毛里塔尼亚 .....	148 - 150	52
墨西哥 .....	151 - 156	54
摩洛哥 .....	157 - 161	58
緬 甸 .....	162 - 164	60
尼日尔.....	165	60
尼日利亚.....	166 - 167	61
挪威.....	168 - 169	62
巴基斯坦.....	170 - 175	62
秘 鲁 .....	176 - 179	64
菲律宾 .....	180 - 185	66
葡萄牙.....	186 - 187	69
大韩民国 .....	188 - 191	70
罗马尼亚.....	192 - 193	72
卢旺达.....	194 - 196	72

目 录(续)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沙特阿拉伯 .....	197 - 198	73
塞内加尔.....	199 - 200	74
新加坡.....	201	75
南 非 .....	202 - 205	76
西班牙 .....	206 - 207	77
斯里兰卡 .....	208 - 209	78
苏 丹 .....	210 - 221	78
泰国.....	222 - 223	80
多哥.....	224	81
突尼斯.....	225 - 242	81
土耳其 .....	243 - 254	86
乌干达.....	255	9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256 - 261	98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62	100
委内瑞拉 .....	263 - 264	100
南斯拉夫.....	265	101
扎伊尔 .....	266 - 269	101
三、访问以后的行动 .....	270 - 274	102
四、结论和建议 .....	275 - 294	103

##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通过第1985/33号决议，决定指派一名特别报告员审查与酷刑有关的问题。

2. 1985年5月12日，委员会主席任命彼得·科伊曼斯(荷兰)为先生为特别报告员，后者根据委员会第1985/33、1986/50、1987/29、1988/32、1989/33和1990/34号决议，分别向委员会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和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了报告(E/CN.4/1986/15、E/CN.4/1987/13、E/CN.4/1988/17及Add.1、E/CN.4/1989/15、E/CN.4/1990/17及Add.1和E/CN.4/1991/17)。

3. 委员会第1990/34号决议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两年，但仍维持年度报告周期，以便他能向委员会提出进一步的结论和建议。

4. 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根据第1990/34号决议编写的第六份报告(E/CN.4/1991/17及Add.1)，并通过了第1991/38号决议，其中决定：特别报告员在履行职责时应继续寻求从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获得可信和可靠的资料。

5. 特别报告员按照委员会第1990/34和第1991/38号决议，特向委员会提交他的第七份报告。报告的第一章介绍了与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有关的某些方面。第二章包括了特别报告员与有关各国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这些国家是指已收到指称其施行酷刑的详细资料的国家。这一章概要介绍了特别报告员致各国政府的信件，包括紧急呼吁和信件，以及截至1991年12月16日收到的各国政府的答复。第三章包括关于特别报告员过去进行访问后所采取行动的情况。第四章包括结论和建议。

### 一、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6. 1991年期间，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指称发生酷刑案件的来文，而且数量惊人。尽管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指称数目不能用于表明全世界发生的酷刑案件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但是它清楚表明酷刑仍然广泛存在，因此，必须不懈地继续进行反对酷刑的战斗。

7. 特别报告员按照第1991/38号决议中所载的他的职权，只要他认为收到的资料可靠和可信，就提请有关政府注意这些资料。在得出资料可靠和可信的结论时，特别报告员有若干方面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发表

的人权报告中公布的资料，所指控的案件是否与有关国家人权情况的一般格局相符？如果是一致的，提供的资料是否足够精确和详细，使有关政府能够进行调查？由于后一条件往往未能达到，这意味着所收到的来文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转送给各国政府。

8. 特别报告员向政府转送来文，不应当被看作他假设所包括的指控是真实或言之有据的。它只是请求调查该案，并请求将此种调查的结果通知他而已。因此，转送的信件总是应当与有关政府的答复放在一起进行评价。不妨回顾，人权委员会在第1991/38号决议第16段中呼吁各国政府在特别报告员执行任务时与他合作并给予协助，以及向他提供他所要求的全部资料，第17段促请尚未对特别报告员转送之信件作出答复的政府迅速作出答复。

9. 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政府遵守了这一请求，向他提供了答复。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指出，这种答复所包括的资料应介绍负责调查的机关、被询问者、医务检查的结果和实施检查者的身份、就一项最终提出的控诉所作的裁决及其理由，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一些收到的答复或多或少地符合这些要求或谈及警察的调查或已经提起的诉讼。在后一情形下，特别报告员认为，一旦调查结束，应当将结果通知他。

10.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这样的答复，它们只是谴责所转送的指控是捏造的或是为了污蔑当局。特别报告员强烈认为这样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当局在其他情形下曾承认在该国可能发生及确实发生过酷刑，则这样的答复尤其不能令人满意。国际社会反对酷刑的持久运动使各国政府有必要认真对待有关酷刑的指控，对提请它们注意的每一案件进行调查。

11. 特别报告员在以前的报告中说过，他清楚地知道，提出关于酷刑的指控，目的可能是污损政府的形象。由于酷刑一般是由政府雇用的人员在没有公正证人的情况施行的，关于酷刑的指控很容易被用于这一目的。但是，如果政府认为它是污蔑运动的受害者，最合逻辑的事就是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由他本人进行调查。在若干情况下，当政府代表告诉他所作的指控纯粹出于政治动机时，特别报告员建议这些政府向他提出这样的邀请，以进行调查性访问。作为此种调查性访问的方式，他建议由他和政府各从提交的指控清单中选出数目相同的案件。然后，特别报告员将与指称的受害人、其律师、检查他们的医务官员、进行审问的官员、受害人被关押地方的负责官员进行谈话。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国政府对这些建议作出积极反应。

12. 关于其履行职责的更为一般的方面，特别报告员强烈认为，如果他得到授

权不时进行一些现场调查，就能更有效地履行职责。委员会的专题职权往往被称为监测机制，既然事实调查是监测的一个部分，事实调查访问将大大增加此种机制发挥功能的效率。特别报告员认为，一些政府对邀请他进行这样的事实调查访问显然犹豫不决，其根源可能是害怕他的调查结果被认为是准司法性的裁决。他愿意强调，他的关于访问的报告只能揭露事实和在他访问期间提交给他的各种论点。

13. 在此情形下，特别报告员满意地注意到，吉布提司法部长在1991年6月10日的信中邀请他访问该国，对他在1991年4月17日致吉布提政府的信中提请其注意的一些指控酷刑的案件，进行客观和独立的调查，而政府在1991年6月10日的同一信件中也提供了详细的资料（见下文第62-64页）。这一访问原定于1991年10月前半月进行，但由于来往信件令人遗憾地拖延，不得不推迟到晚后的日子。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一邀请，愿意赞扬吉布提的合作态度。他认为，吉布提政府通过树立这一榜样，对委员会有效地发挥酷刑问题职权的作用，作出了贡献。

14. 紧急呼吁程序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转送关于指控酷刑案件的信件。每当特别报告员收到资料，表明某人被捕，并表示担心此人可能会受到酷刑，特别报告员就发出紧急呼吁。除其他外，此种担心的基础可能是亲属和其他访问者对被拘留者身体状况的叙述，或是被拘留者被单独监禁的事实，因为这是容易发生酷刑的条件。特别报告员的紧急呼吁完全是人道主义性质。只是要求有关政府向特别报告员保证，被拘留者的身心健全将得到保障。此外，这样的呼吁使政府有机会调查这一问题，指示实施拘留的当局尊重个人身心健全的权利，从而坚持该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

15. 在少数案件中，特别报告员在向有关政府发出呼吁之后，又从原先要求采取紧急行动的消息来源获悉，在特别报告员提出呼吁时，请求中所指的人已经获释。在此情形下，可认为呼吁无效，在报告中也不提及。

16. 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特别报告员自1991年11月4日至16日访问了该国，同当局、专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了磋商。关于该次访问的报告将载于本报告的增编。特别报告员表示深深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他的邀请。如同他在早先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此种访问向他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一国的一般人权状况，特别是酷刑发生的情况，从而使他能够提出防止酷刑的建议，同时考虑该国具体的法律和行政状况。为磋商目的进行的此种访问十分有用，人权委员会也承认了这一点，第1991/38号决议第19段鼓励各国政府认真考虑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它们的国家，以便使他能够更有效地完成任务。特别报告员可能会与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接触，讨论访问的可能性，他希望这些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就象过去邀请他的那些国家政

府所表示的那样。此种磋商性访问独一无二地表现出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要铲除酷刑罪恶的共同努力。

17. 如同过去说的那样，关于国家访问的报告中包括一些适合有关国家具体情况的建议。特别报告员一向邀请各国政府就这些建议提出评论。特别报告员感谢菲律宾政府对他报告中的一部分作出的反应。他曾于1988年访问土耳其，对于该政府向他提供的补充资料，他表示感激。从这些政府收到的资料载于下文第三章。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尚未收到秘鲁(于1988年4月访问)政府、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都于1989年9月访问)两国政府的正式反应。他在1991年10月17日和21日的信中提醒该三国政府作出这种反应，信中回顾了1991/38号决议的第18段，其中人权委员会向已邀请特别报告员访问的各国政府表示感谢，请它们适当考虑报告员的建议，并随时向他通报采取的行动。在此情况下，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秘鲁政府向人权事务中心提供资料，涉及某些已采取的并与特别报告员职权有关的措施。这一资料也反映在下文第三章中。

18. 1991年4月，特别报告员与反酷刑委员会主席及一些成员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他还与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理事会举行了正式会议。欧洲委员会的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向特别报告员提交了该委员会对奥地利和丹麦进行访问的报告；经有关政府同意，这些报告已经发表。特别报告员认为，如果领受与酷刑进行战斗任务的各种机制和机构之间继续交换信息，将会使它们更加有效。

19. 在1991年9月9日至13日于日内瓦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被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代表提请与会人员注意他所说的人权事务中心特别程序科的“系统过载”。他指出，该科提供服务的特别程序的数目在六年內从6个增加到16个，但是，为这些程序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数目远远跟不上这一增加。这种比例失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履行各种职责的质量。特别报告员也有同样的担心。人们越是更广泛地了解这种职责，就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因为需要更多地处理资料，与政府进行更多的通信。特别报告员认为，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必须采取措施，使委员会建立的特别程序能够继续充分和有效地发挥作用。



## 二、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 A. 紧急行动

20. 在本报告涉及的时期内，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越来越多的请求，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并收到一些资料，其中内容使他认为有理由采取紧急行动。这些请求涉及的主要是这样一些人，通常在被警察或军队单独监禁时或在审讯期间，据称他们受到酷刑，或人们担心他们可能受到酷刑。在收到这些请求后，特别报告员发出64份信，每封信涉及一个或几个人，要求各有关政府立即予以注意。在这样做时，他吁请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纯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确保有关人员身心健全的权利能得到保护，确保他们在拘留期间能受到人道的待遇。

21. 向下列政府发出了呼吁：巴林、布隆迪、中国、古巴、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希腊、海地、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马拉维、马来西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南非、斯里兰卡、苏丹、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扎伊尔。

22. 下列国家的政府答复了特别报告员向它们发出的要求采取紧急行动的呼吁（包括原先发出的、反映在特别报告员前几份报告中的呼吁）：巴林、哥伦比亚、古巴、埃及、赤道几内亚、希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肯尼亚、摩洛哥、缅甸、菲律宾、南非、苏丹、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扎伊尔。

### B. 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23. 根据委员会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第1991/70号决议，特别报告员于1991年9月11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涉及土耳其人权协会主席和该组织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Yavuz Binbay。此人一直定期报告该地区的人权情况。根据收到的资料，1989年4月和1990年3月，他在凡城受到安全部成员的口头威胁。此后，据报道他两次遇到车祸，他认为，这是有意挑起的。据进一步的指控，他受到MIT（一安全机构）成员和安全部当地成员的长期监视。他过去曾被关押并遭受酷刑，鉴于这一事实，人们表示担心他可能再次被捕，遭受虐待。

24. 特别报告员在1991年8月6日的信中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发送了所收到

的涉及Massoud Afravi先生的材料，他在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R.Galindo-Pohl先生1990年1月访问德黑兰期间会见了特别代表，此后不久即遭逮捕，据称后来受到酷刑。在与特别代表会见时，Afravi先生谴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指称1989年1月在Khalkhal草率处决其兄弟Naji Afravi。Massoud Afravi于1990年1月30日在家中被捕，被关押在德黑附近Nokonam大街的Shahr Rey监狱。在关押期间，据称他受到各种方式的酷刑，左上臂留下大块瘢痕。1990年期间，他数次被送到Pars医院治疗，但后来又被送回Shahr Rey 监狱，据称，在那里又遭酷刑。根据消息来源，Afravi先生有一封1991年3月18日签署的关于其左上臂伤疤的医生证明，指出关于酷刑的指控符合医生的检查结果。

### C. 与各国政府的信件往来

#### 巴林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25. 1991年5月3日，特别报告员就Salah Abdullah Habil Al-Khawaja案件向巴林政府发出紧急呼吁。1990年6月6日，已经向政府提交过他的案件(见E/CN.4/1991/17，第25和第26段)。巴林政府在1990年8月6日的信中通知特别报告员，此人已被判处7年徒刑，并确认他和前信所提的其他一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精神或肉体折磨。特别报告员提请巴林政府注意他收到的资料，据此，Al-Khawaja和其他囚犯曾绝食抗议拘留条件和据称受到的虐待。还指称，Al-Khawaja被警察殴打致伤，随后从Al-Manama监狱转到Jaw监狱，在那里，他受到单独监禁，得不到医疗。人们表示担心，除非接受必要的医疗，他的健康可能进一步恶化。

26. 1991年8月26日，巴林政府答复说，Salah Abdullah Hubil Al-Khawaja曾受到国家安全法院的审理，罪名是从事旨在改变国家政治制度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武器训练，并说他正在服刑。有关当局已证实，此人未受到任何形式的酷刑，在这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答复还指出，在家属访问和医疗问题上，每一囚犯都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

## 信件

27.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就遭酷刑致死的Mandooh Mahdi Ahmed案件致信巴林政府。据报道，此人于1980年13岁时被捕，被关押在Manama的Al Qala'a监狱，根据国家安全法令，他在那里被关了四年。在此期间，不允许他聘请律师，在头两年期间，他的家属不准探监。据报道，他遭到毒打，特别是他的头部和鼻部，致使鼻梁骨折，引起癫痫病；这一疾病影响了他的心智能力，引起间发性休克。尽管进行了治疗，他的健康还是恶化，1991年5月20日，他死于Salmaniya医院。

## 孟加拉国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28. 1990年11月27日，特别报告员致信孟加拉国政府，转送资料。根据该资料，1990年5月21日，来自Chittagong的24岁学生领袖Hasanul Karim(化名Manik)和Chandan Kumar Bhowmik在同警察发生武装冲突后被捕。据指称，在被捕之后，他们被带到附近的警察营地，遭到酷刑和踢打，后来，他们被转到Kotwali警察局。1990年5月22日，Manik的父亲得到通知，说他儿子死于去医院的途中。验尸报告表明，死因是撞击和颅内出血。据说，钝武器是致伤的原因。警察后来声称Manik的死亡是因为逮捕时遭到公众的殴打，但证人否认了这一说法。

29. 1990年12月18日，孟加拉国政府作出答复，叙述了Hasanul Karim及其同伙在被警察逮捕前遭到公众殴打的暴力事件。据称，为了从警察拘留地劫出两个被控犯罪的人，该两人所属的团体在法院用自动武器滥扫滥射，并引发爆竹。两名警察在该事件中受了重伤。Hasanul Karim得到急救，但是他的情况后来恶化，不得不送往Chittagong医学院的医院，他在医院因伤死亡。内政部部长指示刑事调查司充分调查此案，提出报告。但是，没能证实也无证据表明他是被警察拷打致死。因此，关于他因警察残暴和酷刑而死的指控完全是误解，歪曲和具有误导性，同事实无关。

30.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信孟加拉国政府，转送了关于Manirul Murshed的资料，他是在瑞典寻求政治避难的人，在其避难申请被瑞典当局拒绝之

后，他于1990年10月10日被迫返回孟加拉国。他一到达卡机场就被机场警察逮捕，在13个小时的拘留中，他多次被用警棍殴打，包括打他的脚底和生殖器，他还被用电缆抽打和踢打。获释之后，一名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医生证实，他曾受到严重酷刑，致使视力受到永久性伤害。

31. 同天，特别报告员还通知孟加拉国政府，他收到一份报告，涉及Chittagong Hill Tracts军事区的人权情况。根据该报告，被控为Shanti Bahini (地下政党Jana Samhati Samiti的武装集团)成员的人往往遭受逮捕和严厉拷打。

### 伯利兹

#### 信件

32.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信伯利兹政府，涉及危地马拉公民Luis Arturo Arévalo，据报道，1990年11月3日或4日，他被伯利兹安全部队的特别分队逮捕，据指称，他受到了酷刑，然后被交给危地马拉当局。据后来的报告，伯利兹总理曾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以充分和彻底地调查关于酷刑的指称。特别报告员请伯利兹政府通知他调查的结果和结论。

### 巴西

#### 信件

33.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信巴西政府，转送一些资料。资料指称，在巴西，逮捕人、对其施以酷刑、不加指控即行释放等作法非常普遍。资料进一步指称，施行酷刑的人在被人认出并受审判时，往往判刑很轻。为说明这一指称，资料来源报告了一位名叫José Gaetano Pereira的警察的案件。他被判定犯有施行酷刑罪，1990年8月被米纳斯吉拉斯州Ipatinga的初审法官判三个月的监禁。据报告，这一判决后来被减为六个月的社区服务。自从那时以来，许多人报告了指称同一警察施行酷刑的案件。

34. 还转送了关于一名16岁少年案件的资料，该少年名叫Domingo Vasconcelos Macedo。1990年10月，他在阿克里州的Rio Branco被捕，送往第6警察局。后来，他被宪兵带到第一营司令部，据称，他在那里遭到酷刑。

35. 1991年12月16日，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律草案，以便将酷刑罪作为危害民主国家和人类罪列入刑法中。

### 保加利亚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36. 1990年12月16日，保加利亚政府致信特别报告员，回答他1989年7月18日的信件(E/CN.4/1990/17, 第36段)，来信涉及下述指称：在1989年5月的暴力示威中，几名土耳其少数民族的人在遭安全人员殴打后死亡。政府说，关于暴力案件，已经进行司法调查，调查结果也已公布，各罪犯现在正被控以确定的罪行。政府进一步确认，在该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保加利亚议会最近通过了一些对现行宪法的修正案和补充案，并且开始进行大规模努力，起草一部全新的宪法。

### 布隆迪

#### 紧急呼吁

37. 1991年12月3日，特别报告员向布隆迪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涉及下列人员：Libère Barankitse，商人；Liboire Bucumi，中央银行雇员；Emmanuel Ciiza，技术员；Antoine Habonimana，中央银行雇员；Samuel Magenge，摄政亲王医院雇员；Comé Minani，机场雇员；William Munyembabazi，Musage地区的领导人；Vincent Ndayiheburu，安全警卫；Severin Nsengimana，卫生部雇员；Fidèle Ntezahorirwa，内政部雇员；Philippe Nzobonariba，Martens公司雇员；Augustin Nzojibwami，教师。根据收到的资料，这些人都是少数民族胡图族成员，他们于1991年11月25和26日被捕，罪名是与胡图民族解放党保持联系和对Bujumbura的军事设施进行武装攻击。后来，他们被带往Mura兵营和其他的警察拘留中心，据报告，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被捕时遭到毒打。人们表示担心，这些人可能遭到酷刑或虐待。

## 喀麦隆

### 信件

38.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信喀麦隆政府，转达一些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一些政治犯的关押条件极端恶劣，严重损害了其中一些人的健康，致使另一些人死亡。所报告的有下列案件：

- (a) 据说，Moudio hildina 并未于1986年刑满时从Nkondengui监狱被释放。1987年12月，他成为瘫痪，但有很长时间，他得不到医疗。1989年6月，他死于医院；
- (b) Abdoulaye Mazou过去是律师和地方行政官，1990年4日他被从 Nkondengui监狱释放，并被软禁。他离开监狱时患有几种疾病，包括视力和肾脏问题。但是，他被迫等待数月才获准去Yaounde看病。

## 智利

### 信件

39.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信智利政府，转送关于一些酷刑和虐待案件的资料，据报告，这些案件发生于1990年3月至12月之间。信件提到以下案件：Fernando Concha Galvez, Iván Concha Pizarro, Erwin Rivera Castillo, Pedro Felipe Ramírez Chaparro, Lino Enrique Palma Insulza, Vladimir Ernesto Salamanca Morales, Rodrigo Morales Salas, Alvaro Rodríguez Escobar, Sergio Vásquez Barrientos, Ester Alfaro González, Abraham Larrea Zamorano, Catalina Avila Lazo, Wilson Rojas Mercado, Rodrigo Saa Gerbier, Yuri Aliro Vargas Araya and Jorge Antonio Espínola Robles。据报告，这些人在各警察局受到酷刑和虐待，除其他外，他们遭到拳打脚踢，长时间绑住双臂，得不到食物、水和睡眠，电击身体敏感部分，用塑料袋蒙住头部，几乎窒息致死，“乘干潜水艇”，威胁他们及其家属，假处决。据报告，在被关在圣地亚哥第三警察局的Jorge Antonio Espínola Robles案件中，根据保护补救法，提出了派一法医部门医生到警察局的请求。医生注意到，被拘留者身上有各种伤，唯一的解释是，他在被拘留时受到枪伤并受到虐待。

40.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智利政府发出第二份信，转送资料，大意是，尽管政府采取了法律措施，但是，特别活动巡逻队和警察部门的成员仍然在使用酷刑。收到的大部分案件涉及反政府武装团体的成员，特别是劳塔罗青年运动和曼努埃尔·罗格里格斯爱国阵线，但也涉及在和平示威中逮捕的人或与刑事调查有关的人。尤其转送了以下案件：

- (a) Jaime Patricio Celis Adasme, Jaime Iván Pinto Aglioni, Julio Ricardo Prado Bravo, Marcela Laura Mardones Pacheco和 Patricio Alejandro Gallardo Trujillo 等人于1991年7月6日至10日之间在Concepcion被警察部门官员逮捕；
- (b) Iván Andrés Córdova Córdova于1991年5月27日被捕，被送往San Luis de Macul警察局；
- (c) Galia Gimpel Martínez于1991年5月20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圣地亚哥的第18警察局；
- (d) Lucio E duardo Maldonado García于1991年5月15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圣地亚哥的La victoria警察局；
- (e) Angel Patricio Muñoz Faundez于1991年4月19日在圣地亚哥的Cerro Navia被捕，被送往San Pablo的特别活动巡逻队队部；
- (f) Maria Teresa González Rodriguez 于1991年4月29日在圣地亚哥被捕，被送往特别活动巡逻队第38号队部；
- (g) Patricio Fernando Ortiz Montenegro和Pedro Alberto Ortiz Nontenegro于1991年2月28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第10警察局；
- (h) Claudio Cavieres Montanares 和 Camilo Cavieres Montanares 于1991年2月28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第3警察局；
- (i) Miguel Armando Montecino Montecino于1990年12月19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第3警察局；
- (j) Roberto Amado Pardo Ramírez于1990年10月2日在圣地亚哥被捕，被送往特别活动巡逻队第13号兵营；
- (k) Pauline Jenkin Solervicents于1990年9月13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
- (l) Félix Madariaga Ieiva于1990年9月13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第3警察局；

- (m) Leonardo Andrés Virán López于1990年9月7日在圣地亚哥被捕，被送往Penalolen的警察部门；
- (n) Marta Montiel Oyarzún于1990年8月25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
- (o) Efraín del Carment Rojas Acevedo 于1991年8月17日在圣地亚哥的Santa Adriana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
- (p) Gladys Carvajal fuentes于1990年6月13日在Graneros被特别活动巡逻队的成员逮捕；
- (q) Fernando Enrique Moreno Vega 于1990年5月18日在圣地亚哥被捕，先被送往第12警察局，后被送往第3警察局；
- (r) Miguel Angel Chacón Leyton 于1990年3月29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被送往Renca的警察局；
- (s) Juan Vásquez Ossa于1990年3月29日在圣地亚哥被特别活动巡逻队逮捕。

## 中国

### 紧急呼吁

41. 1991年8月28日，特别报告员就由于据称参与1989年6月北京事件浪潮而服刑13年的33岁的王军涛和39岁的陈志明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根据资料来源，这两位犯人自从1991年4月12日起一直在北京第二监狱被单独监禁。据报道，这两人于1991年8月13日起开始绝食，以抗议他们继续受到单独监禁、缺乏医疗和监狱中的恶劣条件。另据报导，王军涛患有乙型肝炎，据称是在监狱中传染的。特别报告员担心，如果不立即提供适当的医疗，这两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都可能处于危险。

42. 1991年9月17日，特别报告员就1990年4月被捕，被判处6年徒刑、此后一直被关押在拉萨 Drapchi 监狱的 Drepung寺院76岁的佛教僧侣 Lobsang Tsondrue 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报导，在1991年4月27日该监狱发生的一起事件以后，Lobsang Tsondrue 和大约其他20位犯人遭到严重殴打，据6月后期见到他的另一位犯人提供的资料，Lobsang Tsondrue 脸上和衣服上带有血迹，健康状况不佳。另据报导，他被长期单独监禁，这是违反中国关于这种惩罚不得超过15天的规定



的。鉴于这些情况，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

43. 1991年12月10日，特别报告员就以下人员向中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 (a) Sonam Wangdu, 又名 Shukden 或 Shungden, 198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目前正关押在拉萨 Drapchi 监狱。根据资料来源, 他于1990年12月在监狱参加一次和平方式的守夜祝祷仪式以后, 遭到严重殴打。此后他在恶劣的健康条件下被转到公安医院, 而且无法自己行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他于2月中旬被送回 Drapchi 监狱, 目前正被单独监禁。根据资料来源, 他的健康状况正在迅速恶化, 以至小便失禁; 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医疗;
- (b) Lonsang Topchu (俗名Kungyab), 系 Medro Lapdong Sera寺院的一位僧侣, 由于1991年5月参加拉萨 Bakhor 地区的一次示威而被捕, 并受到刺刀的多次刺伤。他先被送往 Sera 寺院附近的军事医院, 后来被转到 Gutsa 监狱, 由于他的背部和头部被刺伤, 因此失去了良好的视觉, 而且他的呼吸也受到严重影响。根据资料来源, 尽管他被人扶着也无法站立, 但他目前被关押在 Gutsa 的牢房中, 而不是送往医院;
- (c) Phuntsok Tsungme (俗名 Thupten), 23岁, 系 Sera 寺院的一位僧侣, 1991年5月由于参加示威而被捕, 目前被关押在拉萨 Gutsa 监狱。根据资料来源, 他受到非常严厉的待遇, 并受到监狱当局的严厉殴打;
- (d) Lobsan Delek (俗名 Sonam Choephel), 系 Sera 寺院的僧侣, 1991年5月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其兄弟的办公室里被逮捕, 被送往拉萨北部5公里的 Sangyip 监狱。他被安置在第二区, 自从那时起, 他一直被单独囚禁。在这种情况下, 特别报告员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44. 1991年2月14日, 特别报告员向中国政府发出一封信, 转交关于指控西藏的犯人遭到酷刑和虐待的资料, 包括在参加要求独立的示威以后被拘留此后又在 Gurtza 监狱受到酷刑的几位尼姑。多数报导的逮捕事件发生在1989年, 但两起事件分别发生在1988年和1990年。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以下拘留案件:

- (a) Ugyen Dolma, 21岁, 来自 Shugseb 寺, 1988年5月17在 Barkhor 被捕, 在 Gurtza 监狱被关押两个月。据称她受到的酷刑包括受到殴

打直到失去知觉为止，并受到他人使用电棍的性侮辱；

- (b) Namdol Tenzin, 18岁，来自 Tsangkung 寺)1989年两次被捕，总共5个月，被关押在 Gurtsa 监狱。她受到的酷刑包括对她的手指施行电击；
- (c) Puntsok Lamdru, 18岁，来自 Chubsang 寺，1989年10月15日连同另外两个尼姑在 Barkhor 一起被捕，在 Gurtsa 监狱被关押10个月。据称3位尼姑受到殴打，直到她们失去知觉为止，并受到有人使用电棍的性侮辱；
- (d) Kusang, 25岁，来自 Ani Tsangkung, 1990年3月被捕，被判处1年徒刑。目前她被关押在 Gurtsa 监狱，据称她被刀砍伤，被窒息和被反绑。另外据称，她在被捕以后，在 Sangyip 被殴打致疯；
- (e) Ani Kalsang Palmo, 24岁，来自 Shungseb修道院，1989年5月17日连同其他几位尼姑和僧侣一起被捕，被关押在 Gurtsa 监狱。据称她受到的酷刑包括被狗咬伤，受到残酷的殴打，受到有人使用电棍的性侮辱，连续几天被剥夺食物和药品。

45. 除了上述案件以外，据称20岁的 Lhakpa Tsering 于1990年12月15日在拉萨北部的 Drapchi 监狱被拷打致死。据报导，Lhapka Tsering 由于参加要求独立的活动而于1989年11月4日被捕，在 Gurtsa 监狱被关押几个月。据报导，Drapchi 监狱中其他几位同狱犯人听到他在牢房中受到殴打，并叫嚷他将被打死。同一资料来源声称，有人看到他的尸体上“带有许多伤痕”。据报导，将对他进行验尸，但验尸结果没有公布。

46. 1991年5月9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他的信中提到的两位人员的详细资料：

- (a) 归桑 (Kusang)，佛教尼姑，23岁，在被确定犯有“多次进行分裂祖国的违法活动”的罪行以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据称，她在监狱服刑，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关于归桑在关押期间遭受酷刑或殴打的指控被驳斥为“无稽之谈”。
- (b) 拉巴次仁(La Baciren) 以上称为 Lhakpa Tsering, 1990年4月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990年12月10日患病。中国有关当局积极为他安排治疗，但因病重，经抢救无效，于1990年12月15日死亡。中国有关当局组织专家进行验尸的结果是弥漫性腹膜炎和急性化脓坏死性阑尾炎。拉巴次仁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刑，这纯属中国内政。他是因患病并经抢

救无效而死的。据中国政府称，关于他被“拷打致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47. 关于另外4起指称的酷刑案，中国政府指出，经中国有关当局查核，得出结论说，这些案件“纯属捏造”。

### 哥伦比亚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48. 1991年1月9日，在对特别报告员1990年7月20日就 Juan de Dios Moreno 和 Licinio Renteria 发出的紧急呼吁的答复中，哥伦比亚政府提供了资料，大意是，这两人已经获得释放，但答复中没有提到关于酷刑的指控。

49. 1990年12月26日特别报告员就 Rodrigo Guisao 先生，他的儿子 Alejandro Guisao 和 Efraín N. Higueta 向哥伦比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他们于1990年12月11日被据称袭击乌拉瓦图尔沃市 Currutao 地区的 Prado Mer 种植园香蕉工人家园的 Voltígeros 营的士兵逮捕。据报导，这些人于12月12日被带到该营在 Carepa 的基地。鉴于以前关于犯人遭到 Voltígeros 营成员的酷刑和虐待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对这些人的人身健全表示担心。

50. 1991年1月23日和2月13日，政府报告说，Rodrigo Guisao、Alejandro Guisao 和 Efraín Higueta 未经指控而获得释放，他们告诉 Apartadó 省检察官，他们在武装部队手中没有遭到任何身心或心理虐待。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51.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哥伦比亚政府，转交了关于据称于1990年下半年发生的以下酷刑案件的资料：

- (a) 据报道，Germán Antonio Parada 和 Tairo José Jiménez Bautista 在1990年7月29日和其他人一起被武装部队成员逮捕以后，遭到严重酷刑。Antonio Parada 先生死亡，据一位证人称，他的尸体上留有受伤和殴打的痕迹。Jiménez Bautista 先生于1990年8月3日获得释放，据报道，他遭到酷刑和虐待，包括 Los Alpes 军事基地的一位中尉对他进行的模拟草率处决。他还声称，在获得释放以前，他被迫向

Arboledas司法当局声明，他没有遭到拘留，而是自愿作为向导陪同士兵，他脸上的伤痕是15天以前酗酒造成的结果；

- (b) 全国农村用户协会地区领导人Gabriel Flórez于1990年9月8日在桑坦德省Batulia市被蒙蒂贝洛部队巡逻队成员逮捕。他被关押3天，据称受到严重酷刑；
- (c) Carlos Lugo González，系地区大学的学生，他于1990年10月4日在波哥大的一次示威游行中被警官逮捕。据报道，他在被带往称为CAI的调查中心途中遭到警察的严重殴打。此后他被带往第五警察所，后来又被带往司法调查司，但该司拒绝接受他，因为他多处受伤，包括他头部几处受伤。当他的案件被提交特别报告员时，Lugo先生正被关押在Modelo监狱，而他本人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处。

## 古 巴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52. 1991年9月25日，特别报告员就国家保安部队原中尉Alejandro Joaquín Fuentes García问题向古巴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他于1991年9月在克拉拉镇北部海岸的一个地点试图乘船离开该国时被逮捕。他被带往圣克拉拉国家安全情报部，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遭到严重殴打，造成一个肾脱离。此外，几天以后，在克拉拉镇省监狱里，在他上吊自杀未遂以后，出现心肌梗塞；但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没有得到任何合适的医疗。

53. 在1991年10月23日的普通照会中，该国政府指出，Fuentes García先生在策划与其他五人一起非法离开国家时于1991年6月20日被逮捕，他正在候审。政府还说，Fuentes García先生几年来一直患肾炎，在他拘留期间，他患有肾绞痛，但始终得到正常的医疗，从未受到虐待或酷刑。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54.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古巴政府，转交有关以下酷刑案件的资料：

- (a) Arturo Alvarez Varela, 52岁，工人，住在圣米格尔德尔巴东

Jacomino地区圣伊萨贝尔。他由于“破坏国家安全”而于1990年12月27日被逮捕，并被带往技术调查部Aldavo第100号拘留中心。据称他在那里遭到酷刑，包括殴打，他的鼻子被打破；他还被关押在低于零度的牢房中和一片漆黑的牢房中。随后他被转移到 Combinado del Este监狱。据称他的亲属受到监禁的威胁，他本人也受到威胁，如果他或他的亲属揭露拘留期间的真相，他会受到更为恶劣的待遇。

- (b) Ramón de Jesús Almoa García在Combinado del Este被拘留。1991年4月22日，据称他受到军官的严重殴打；
- (c) Calderón Espín，被称为“政治犯”，1990年4月25日死于卡马圭省 Amalia Simoni医院。据报道，他由于遭到一位中士的殴打而死亡，该中士的姓名已经转交该国政府；
- (d) Daniel de Jesús Almoda García，被称为“政治犯”，据称于1991年4月23日带往“死亡”惩罚牢房，在牢房里他受到Combinado del Este监狱的工作人员的严重殴打(其绰号已转交该国政府)。

55. 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所收到的关于一起事件的资料。在这起事件中，普通法规定的罪犯占领Nieves Morejón de Sancti Spiritu监狱达几小时之久，抗议食物配给减少50%给犯人带来的虐待和饥饿。据说在保安部队发起进攻以重新控制监狱的过程中，好几人死亡，许多人受伤。另外据说，1991年5月16日，身上带有遭到殴打痕迹的100多位犯人因为参加Nieves Morejón监狱的起义，而被手脚捆绑起来关在Manacas监狱里。

56. 在1991年10月23日的普通照会中，该国政府转交了有关这些案件的以下资料：

- (a) Arturo Alvarez Varela 先生是由于各种经济犯罪而被拘留和审判的。他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可以肯定，他绝没有受到技术调查部当局和官员的任何不当的对待；
- (b) Calderón Espín(Miguel)先生由于抢劫罪目前正在卡马圭监狱中心服刑。由于所提供的资料不确切，无法肯定这是否就是资料中所提到的监狱，因此也无法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 (c) 至于Ramón de Jesús Almon Garcia 先生和Daniel de Jesus Almoda Garcia先生，监狱的核查表明，在过去或目前正在被监禁的犯人中，没有任何人的记载符合上述情况。

57. 关于1991年5月15日发生在Sancti Spiritu 监狱中心的事件，政府说，事

件是由于开始相互殴打的犯人之间的个人争吵而引起的，此后，监狱看守员试图恢复秩序。有些犯人得到武器，在控制他们的过程中，有几人受伤，3人被打死(José Roberto García Iglesias、Julio Mondeja Alvarez和Eloy Javiel Mata)。5位监狱看守员也受伤。

58.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古巴政府，所转交的资料的大意是，自由与信仰宗教协会主席 Maria Celina Rodríguez女士于1991年8月2日连同其3岁的儿子一起被国家保安部的成员拘留，并被带往L 和Malecón警察所。此后她被转到另一个国家安全部门，8月7日被关入哈瓦那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她同她儿子隔离开来。据报道，几天来她一直同精神病人关押在一起，这些病人不断侮辱和威胁她；此外她被迫目睹对病人施行的电疗。另外还收到资料，医院当局威胁对她也施行类似的治疗。到月底她获得释放。

59. 特别报告员还在同一份信中通知该国政府，他收到两份报告，其中声称，特别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有些人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他们遭到各种形式的身心酷刑，例如滥用电击和麻醉品治疗。

60. 在1991年10月24日的一份普通照会中，政府说，Rodríguez女士由于被指控挑起政治骚乱而于1991年9月2日被关押，但她的儿子没有被关押，她只有受到一天的监禁。在审判前的筹备性诉讼程序中，总检察长办公室要求Rodríguez女士接受专家医疗检查，以便确定她的行为是否是心理紊乱所造成。这种检查得到她的完全同意，目前她完全自由，她从未受到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61. 政府还说，在古巴共和国内，没有任何形式的身心虐待，法律规定，对于犯有这种罪行的任何官员或当局给予严厉惩罚。此外，心理治疗是按照心理健康的有关专业标准并在有关人员的同意之下进行的。

### 吉布提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62.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吉布提政府，其中转交的资料的大意是，1991年1月9日至11日在吉布提城被捕的几个人据称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据报道，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如下：Abdel-Kader，警官；Afada，军队中士；Ahmed Mohamed Badri，军士；Hassan Kader Dileyta，保安官员；Mohamed Ahmed Dini，军官；Hassan Ali Horsa；Bourhan Mohamed Houmed(“Barisso”)；Cheicko Mohamed，士

兵。

63. 这些人都是阿法尔社区的成员,据报道,他们是1991年1月8日武装袭击塔朱拉军营以后不久被捕的100人中的一部分。据报道他们在未经指控而被保安部队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过去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拘留的人曾经遭到各种酷刑,例如电击、关押在灌满水的牢房中,双手吊挂在水平棍上受到拷打(这种方法称为“秋千”)、将一个灌满水的瓶子吊在睾丸上,将瓶子塞入肛门。

64. 1991年6月10日,政府做出了答复,否认了关于酷刑的指控,就特别报告员信件中提到的每一起案件提供了资料,包括所列人员的确实身份和据认为他们参与阴谋的详细情况。所提供的资料如下:

- (a) Abdel Kader, (Abdoulkader Mohammed Abass中尉): 他从未遭到残酷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也没有在被指控之前或之后要求医生进行检查。目前他被关押在Damenjog拘留营,他能够得到其家属的探访;
- (b) Mohamed Ibrahim Afada: 他从未受到人体虐待,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他于1991年4月14日被保释释放;
- (c) Ahmed Mohamed Badri: 据政府称,对此人没有提起任何指称。他的真实姓名是Ahmed Mohamed Houmed,他从未告诉预审法官,他遭到任何残忍或虐待行为,也从未要求进行医疗检查。他在受到指控以后获得释放;
- (d) Hassam Kader Dilleyta: 据政府称,对此人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的真实姓名是Abdoulkader Dilleyta Ougoureh, 他于1991年1月18日被捕,目前被关押在Nagade的Idriss Farah Abaneh拘留中心,可以接受其家属的探访。在1991年1月28日给预审法官的信中, Abdoulkader Dilleyta Ougoureh 和其他15位被告揭露在拘留期间他们受到人体残暴行为。按照预审法官的要求, 3位医生对他们进行了检查,对被告进行检查以后发出的医疗证明并没有表明有任何明显的受伤或任何功能性残疾(证明的复印件随附于后);
- (e) Mohamed Ahemd Dini: 据政府称,对此人没有提起任何指控。他的真实姓名是 Mohamed Ahmed Omar, 他从未控诉人体残暴行为,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拘留令于1991年1月19日签发, 他于1991年4月14日被保释释放。(此人也可能是名叫Ahmed Dini Moyaied的一位准尉,他声称,他在其上级军官的压力下供认,他从未控诉人体虐待行为,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目前他被关押在Gabode民事监狱);

- (f) Hassan Ali Harsa, 据政府称,对此人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的真实身份是 Hassan Ali Arras。他从未控诉人体虐待行为,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他在受到指控以后获得释放;
- (g) Bourhan Mohamed Houmed ( Barisso): 拘留令于1991年1月18日签发,他于1991年4月1日被保释释放。他从未控诉虐待,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他的姓名列在控诉虐待的15位被告的名单上, Bourhan Mohamed Bourhan决心通知预审法官,他误入歧途(信件的复印件随附于后),他没有在控诉书上签名。然而按照预审法官的要求,他得到医疗检查,但没有表明任何人体伤害(证明的复印件随附于后);
- (h) Cheiko Mohamed, (Cheikho Mohamed Ali): 拘留令于1991年1月18日签发,他于1991年4月14日被保释释放。他从未控诉人体残暴行为或虐待,也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

65. 该国政府进一步表示,依预审法官的要求签发的关于14位有关被告的医疗证明(复印件随附于后)并没有证实出现了残暴行为。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函件

66.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转交所收到的资料,其大意是,19岁的海地公民Joubert Pierre先生于1990年4月20日在博卡奇卡其家中被警官拘留,并被指控偷窃丁烷气罐。他先被带往Andres Boca Chica的警察所,然后被带往博卡奇卡的警察总部。4月24日,Pierre先生向探访者控诉,他遭到警察的严重拷打。此后,当他的母亲前往探访他时,警察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被转到Luis Aybal医生的医院;然而当她赶到医院后,她被告知,她的儿子不在那里。此后他的母亲和海地驻多米尼加共和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在一个停尸室发现了他的尸体。

#### 厄瓜多尔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67.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厄瓜多尔政府,转交所收到的资料,其大意是,1989年和1991年在厄瓜多尔发生了酷刑案件。据称遭到酷刑或虐待的多数犯人是被怀疑犯有普通法所规定的罪行的人,另外还收到关于武装部队成员受到酷刑



和虐待案件的控诉。多数报告声称,皮钦查省刑事调查部应对此负责。另外据报道,一些地区警察和当地国际刑警组织(国际警察的分支机构)的部门也参与其中。另外还收到资料,其大意是,基多监狱管理当局就有些犯人受到警察审讯以后的身体条件向政府提出抱怨。酷刑的方法包括捆住犯人的手腕或大姆指吊挂起来,拳打脚踢;笞打脚跟,用含有催泪瓦斯的口袋将头蒙起来,几乎造成窒息;对人体敏感部位施行电击。在有些案件中,被警察关押的人员据称由于酷刑而死亡,特别是以下人员:

- (a) Selfido Ilves Camacho, 于1989年5月7日在博利瓦尔省Caluma被便衣人员(防止牲口失窃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和一位警官逮捕,并被带往城市警察的农村警察分部;
- (b) Gonzal Quintero Mina, 1989年7月在Sucumbios省Neuva Loja被国家警察成员逮捕,并被带往镇上的警察营地;
- (c) Segundo Chimbay Zhinin, 1989年8月30日在阿苏艾省Cuenca被逮捕,先被带往阿苏艾刑事调查总部,随后被带往阿索格斯的总部。

68. 另外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据称在被捕以后遭到酷刑的一些人的以下案件(其姓名后面括弧中为其被捕日期): Cesario Chaguay Vargas (1989年10月4日); Carlos Alberto Juela Molina (1989年12月21日); Saulo Cuesta (1989年2月24日); Mariana Ayora (1989年10月14日); Marta Perez (1989年10月14日); Héctor Mejía (1989年6月19日); Segundo Cajilama Chávez (1989年6月19日); Segundo Criollo Chávez (1989年6月19日); Nicolás Paguay Cuvi (1989年6月19日); Carlos Chicaiza Naranjo (1989年6月19日); Segundo Yanacallo Guamán Gerardo Tascon (1989年6月28日); Manuel Mesías Maiques (1989年2月28日); Juan Francicco Roca Ospina (1989年3月7日); Leonor Estupiñán (1989年6月15日); Liliana Ortiz de Estupiñán (1989年6月15日); Dora Lilia Coral (1989年6月15日); Jeanette Estupinan (1989年6月15日); Claudia Ruiz Morales (1989年6月15日)。

69. 以下案件涉及据称遭到酷刑的一些武装部队成员:

- (a) Marco Antonio Espín López, 26岁,系基多Rumiñahui通讯联络营的成员。他被指控吸大麻。据报道,在否认指控以后,他于1990年2月20日被带往Atahualpa军事要塞,遭到酷刑,有人对他的生殖器和身体其他部位施行电击;
- (b) Héctor Roberto Manotoa, 20岁,系基多Eloy Alfaro军事学校的新兵。1990年5月17日,他和其他新兵一起由于据称偷窃一只录音机而受到讯问。这些新兵被迫进入放置电网的水池,因此受到触电。另外据

报道，一位中尉殴打Manotoa。他在军事医院里住了7天，以便治疗伤口；

- (c) Guido Israel Joyos, 23岁, 于1989年5月23日被捕, 并被指控向颠覆团体泄露机密情报、偷窃两支步枪和逃离部队。据称, 他连续36天被关在一个受到太阳暴晒的金属容器里, 并受到殴打。审判时, 他推翻了在审讯期间所作的口供, 并声称这是酷刑下逼出来的。

70. 在1991年3月26日和5月6日的信件中, 政府重申其愿意同特别报告员进行合作, 并提供了有关1991年2月14日转交的案件的以下资料:

- (a) 关于Silfrido Ilves Camacho、Segundo Chimbay Zhinin、Gonzalo Quintero Mina 和Carlos Alberto Juela Molina的案件, 对于被指控虐待这些人的警察提起了诉讼程序;
- (b) 关于Héctor Mejía、Segundo Cajilema、Segundo Criollo、Nicolás Paguay、Carlos Chicaiza、Segunda Guamacayo、Mariana Ayora、Martha Pérez、Gerardo Tascán、Juan Francisco Roca Ospina、Leonor Estupiñán、Liliana Ortíz、Dora Lilia Coral、Jeanette Estupiñán和Claudia Ruiz Morales的案件, 对于虐待的控诉正在由主管司法当局进行调查;
- (c) 关于 Saulo Cuesta、Cesáreo Chaguay Vargas 和 Manuel Mesías Naiquez的案件, 政府提到这些人似乎参加的刑事审判, 但没有提到对虐待的任何调查;
- (d) 应其亲属的请求, Guido Israel Hoyos Toscano在监禁期间受到红十字会一位医生的探访, 但医生没有发现关于虐待的任何证据; 宪法保障法院宣布它无权审理这一案件, 并命令将这些文件归档;
- (e) 关于Antonio Espín López的案件, 没有关于虐待或无理拘留的任何报告;
- (f) 关于Roberto Manota Manota的案件, 政府表示, 对于参与虐待的人员已经提起法律诉讼。

71. 在1991年10月18日的信件中, 特别报告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关于据称受到酷刑的下列人员的案件的资料:

- (a) José María Cabascango, 系厄瓜多尔土著民族联合会秘书, 据称他和其他土著社团领导人一起于1990年6月11日在因巴布拉省Cajas被军方人员逮捕, 并被带往伊巴拉, 移交给刑事调查部;

- (b) Isaac Rómulo Bustos Bermudez, 据称于1991年2月28日被刑事调查部的人员逮捕, 并在洛斯里奥斯省巴巴奥约警察大楼里被单独囚禁几天。

## 埃及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72. 1991年1月2日, 在报告员就据报道在1990年9月底被捕的Mustafa Mohammad Said Al-Sharqawi和Mohammad Hussein Mohammad Ibrahim Sallam以及据称由于从伊斯兰教皈依基督教而于1990年10月被捕的Hassan Mohammad Isam' Il Mohammad向埃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据说, Mustafa Mohammad Said Al-Sharqawi被关押在abu Za' Abal监狱, 而其他两人据说被拘留在赫利奥波利斯国家安全情报警察拘留中心。据称这些人遭到酷刑, 其中两人在1990年12月16日出庭时身体状况恶劣, 据称是饥饿和连续拷打所致。

73. 1991年2月11日, 特别报告员就于1991年1月23日被捕后一直下落不明的一位医生和出版公司经理Muhammad Abdul Latif Tala' at博士向埃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在逮捕以前, Tala' at博士的公司曾经发表埃及医学协会批评联合部队进攻伊拉克的声明。据报道, Tala' at博士于1989年6月被捕, 并被拘留3个月, 在此期间, 据称他遭到酷刑, 包括电击和性虐待的威胁。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 根据其以往的经历, 他可能遭到人体和心理酷刑或虐待。

74. 1991年2月19日, 特别报告员就Mohamed Mandour医生和Emad Atrees医生问题向埃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Mandour医生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埃及人权组织评议员理事会的成员, 他于1991年2月8日被捕。Atrees医生的被捕日期不得而知, 但据报道, 这两人目前都被关押在称为Lazoghli的国家安全总部。据报道, 根据行政拘留命令逮捕他们以及包括大学学生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其他几位人是与他们反对海湾战争的活动有关的。鉴于过去关于在类似情况下遭到拘留的人据称受到酷刑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 上述人员的安全和人身健全可能处于危险。

75. 1991年3月5日, 特别报告员就1991年2月26日埃及国家安全情报局根据行政拘留命令加以逮捕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Hamdeen Sabahi向埃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他的拘留地点没有报告。在逮捕以前, Sabahi先生于1991年2月24日在开罗大学的一次学生会议上发表演说反对海湾战争。鉴于最近关于在类似情况下遭到

拘留的人据称遭到酷刑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Sabahi先生在受到审讯时可能遭到酷刑。

76. 1991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就29岁的阿拉伯教师和开罗大学的毕业生Mohammad Al-Sayyid Al-Sayyid Higazi向埃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他于1991年8月18日在吉萨Bulag Al-Dakrur被捕,并被带往国家安全情报局Doqqi分部(开罗)。据报道,他曾几次被捕,并被长期拘留,而未经指控或审判。鉴于过去关于在类似情况下被拘留的人据称受到酷刑的报告,特别报告员表示担心,他的安全和人身健全可能受到威胁。

77. 关于后面一起案件,1991年11月19日政府答复说,Mohammad Al-Sayyid Al-Sayyid Higazi先生由于安全原因而于1991年8月18日受到讯问和受到逮捕,但他于1991年9月15日获得释放。1991年9月16日,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根据“组建秘密非法组织”的指控,命令对有关国家安全的第476/91号案件所涉及的人进行临时逮捕。

#### 函件和政府的答复

78. 1990年11月27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埃及政府,转交以下有关指称酷刑的案件的资料:

- (a) Muhammad Ahmed Abu Khoukh于1990年4月被逮捕,并被带往达米埃塔安全监狱。据称他被蒙住眼睛,双手反绑在背后,受到殴打,并不断受到性虐待的威胁。他被拘留3个月,其后他获得释放,而未经任何指控;
- (b) Khaled esh-Sherif,系《真相》周刊的一位新闻工作者(特别报告员曾经就他的情况于1990年9月14日发出紧急呼吁),他于1990年8月19日被逮捕,并被带往吉萨的国家安全中心。随后他被转移到Lazoghli的国家安全情报警察中心,据称他在那里遭到严重酷刑。据称,他在Tora收容监狱短时间拘留以后又在该中心遭到酷刑。据报道,在Tora监狱探访过他的律师证实,他的胸部留下电击的伤疤,手上和腿上留下香烟烫伤的痕迹,由于被吊挂,他的手关节僵硬。另外据报道,Niyaba(国家安全检察官)将这些迹象记录下来,并命令将其案件转交给法医办公室,但不知道是否进行了检查;
- (c) Mustafa Said Al-Sharkawi和Huhammad Hasanin Muhammad与Hasan Muhammand Ishail和Ahmed Mustafa Hamouda一起于1990年9月28日被

逮捕。Al-Sharkawi和Muhammad夫人被带到开罗国家安全总部，据称她们在那里受到酷刑，包括殴打、双手反绑在背后吊挂起来、电击和受到强奸的威胁。据称Al-Sharkawi先生于1990年9月29日和30日和10月2日三次遭到酷刑。

79. 1990年12月27日，埃及政府作出了答复，提交了几份“澄清关于酷刑做法的指控的照会”。有一份照会载有按照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要求提出的资料和澄清。第二份照会载有按照被迫或非自愿失踪工作组要求提出的资料。第三份照会涉及指称的对埃及哥普特人的迫害。第四份文件是内务部就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到的其中一人 Khaled esh-Sherif 写给外交部的一封信的复印件。据说，此人是根据关于他与极端的“圣战”组织的成员勾结在一起的情报被捕的，这些成员已经被定罪。公诉部门决定将他释放，这一决定于1990年9月27日生效。对于他的健康状况，或对于他受到酷刑的详细指控以及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到的其他三人，没有提供详细资料。

80.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埃及政府，转交关于声称1990年期间该国的酷刑现象有所增加的资料。多数指称的酷刑受害者是反对埃及政府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团体的成员。据说，多数指称的酷刑件是在开罗 Lazoghli 国家安全情报中心进行审讯期间发生的，而且据说是由国家安全情报警察的官员施行的。据称的酷刑方法包括使用鞭子、枪托、棍棒和电线严厉殴打；用铁链捆绑起来吊在墙上和天花板上；对生殖器和人体其他敏感部位施行电击；性虐待；以及心理虐待，例如威胁和恫吓，以逼取供词。

81. 所收到的报告表明，有几人被逮捕，并被指控参与暗杀人民议会议长 Rifa'at al-Mahgoub 的事件。他们包括 Mamdouh Ali Youssef、Safwat Abd al-Ghani、Muhammed Ahmad al-Ghani、Azzat Hussein Ali、Abd al Nasser Nouh Ahmad、Assem Ali al Sayyid 'Othman、Adel Ali Musallam、Ahmad Mostafa Zaki、Muhammad Mostafa Zaki、Abu al-Makarim 和 Abd al-Rahman。据报道，国家安全检察官已经注意到所有这十个人身上留下的酷刑迹象。据称，Mamdouh Ali Youssef的脊椎受伤，是被担架抬去受讯问的。

82. 特别报告员还提请该国政府注意据称有人在警察所遭到酷刑的几起案件。据说其中一些案件已经见诸于埃及报纸。这些人是 Hamdy al-Nazeely、Ashraf Abdel Moneim Sharsher、Abdel Hamid Ratib、Salem Ibrahim、Mirvat Abdel Hamid、Ashraf Nassar、Ashraf Mahmoud 和 Sayed Abdel Razzek。以下两人据说由于受到酷刑而死亡：Ibrahim Mahrous Abu Donyia 和 Maher Mohammed

Youssef。

83. 除了上述资料以外，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他所收到的关于 Mohamed Mandour 博士的资料，特别报告员曾于1991年2月19日就他的情况向外交部长发出一份电报，呼吁他确保 Mandour 博士的身心健全的权利得到保护。根据该资料，Mandour 博士于1991年2月23日获得释放。Mandour 博士在 Lazoghli 国家安全总部被拘留期间遭到严重酷刑，包括悬吊、殴打和电击。

84.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埃及政府，其中转交的资料声称，在 Tora 地区监狱，特别是 Tora Istikbal 监狱，酷刑和虐待是讯戒、惩罚和逼取供词的常规方法；犯人家属的探访和信件总是受到拖延和妨碍，据称是为了使酷刑所造成的伤口在犯人见到家人之前治愈。另外据报道，埃及当局一贯对以和平方式展开活动的政治反对派滥用紧急法，尽管他们声称，紧急法仅仅针对恐怖主义活动和武装反对派。其中特别报告了 Afifi Matlar 的案件。此人是一位诗人和阿拉伯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以及埃及作家联合会的成员，他于1991年3月2日被捕，并被带往设在 Lazoghli 的国家安全情报局的开罗总部。在被警察监禁期间，据称他被蒙住双眼和戴上手铐，目的是迫使他公认与 Baathist 政治组织的联系，据称他遭到电击、绑着手腕悬吊以及头部和身体各部位遭到坚硬物体的乱打等酷刑。1991年3月11日，据报道他被转到 Tora Istikbal 监狱，在那里作为埃及人权组织成员的律师首先被阻挡，无法探访他。当埃及人权组织的三位代表最终探访他时，据报道他们注意到他身上遭到酷刑的迹象，包括鼻子和手腕上的血肿以及仍然没有治愈的伤痕。资料还进一步表明，埃及人权组织向公共检察官提交了一份正式控诉，要求释放 Matlar 先生，并惩办对他施行酷刑的人。资料中没有提到，对于上述指控是否进行了调查。

85. 另外提交的资料表明，审理暗杀原议会议长 Rifa'at al-Mahgoub 博士的案件(见以上第81段)的国家安全法院责成其一位成员调查被告就这一案件向公共检察官提出的关于酷刑的指控。根据被告提供的证词，对他们使用的酷刑方法包括对人体敏感部位施行电击，长时间悬吊，使用鞭子和粗木棍殴打，以及拘留和虐待一些被告的妻子。特别是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国家安全警察的成员对被拘留者 Mamdouh Ali Yusuf 的妻子施行酷刑和未遂强奸的资料，他们试图逼迫她揭露她的丈夫参与暗杀 al-Mahgoub 博士的情况。当时她显然已经怀孕，但由于受到酷刑而流产。

86. 1991年10月24日，该国政府就 Afifi Matar 先生的案件向特别报告员通报，由于他为某个外国服务，参与秘密的反对派活动，逮捕证于1991年3月20日签

发。Afifi Matar 先生承认了这一指控并坦白了他的活动的程度,以及他受雇为该外国效劳的情况。为了个人的原因,他拒绝除了他三位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到监狱来探访他。他表示认识到其民族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此法院决定于1991年5月9日将他释放。Afifi Matar 先生或其任何探访者或亲属都没有向司法当局声称他在监狱拘留期间或之后遭到酷刑或虐待。

### 萨尔瓦多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87.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萨尔瓦多政府,转达了他收到的指称1989年11月至1990年10月期间97人遭受酷刑和虐待的资料。

88. 据该资料称,在所指案件中共使用了三种酷刑:一是身体酷刑,如击打身体各部位、闷气和勒绞以至奄奄一息、强迫操练、电击和烧伤;二是身心酷刑,如赤身裸体、不准睡眠、拒绝提供食物、被迫吃腐烂食品、在身体出现生理需要时强行拘押、使用麻醉品、强奸;三是精神酷刑,如恐吓、言语攻击、假处决、隔离监禁、以及被迫听他人遭受酷刑的声音。

89. 另据报告,在军队和国家安全机构中都系统地使用酷刑,以便在审讯中了解情况并在平民之间散布恐惧。据报在拘捕过程中及其后,以及其他场合下,在正式办公地点以外及与拘押无关的事件中均使用了酷刑。由于犯罪人员不经调查、审理和处罚,因此酷刑使用起来更加便利。

90. 在转呈政府的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员名单及其被捕或据称遭受酷刑的日期如下: Cecilio Hernández Ramirez (1989年11月13日); Oscar Saúl Amaya Cruz (1989年11月20日); Felix Portillo Peña (1989年11月21日); Francisco Martín Fuentes (1989年11月22日); Fernando Cartagena Dueñas (1989年11月25日); Mateo David Sánchez Elias (1989年11月29日); José Ernesto Guerra González (1989年12月14日); Isidor Vásquez Alfaro (1989年12月14日); Miguel Angel Pineda Pineda (1989年12月18日); Cándida Rosa Rivera Rugamas (1989年12月29日); Ana Sofía Rivera (1989年12月29日); Carlos Antonio Rivera (1989年12月29日); Pablo Salvador Cárcamo Centeno (1989年12月29日); Pascual José Guevara Menjívar (1990年1月6日); Narciso de Jesús Zavala Medrano (1990年1月14日); Carmen Antonio Chilin (1990年2月10日); Juan Gilberto

Méndez Vásquez (1990年2月10日); Aníbal García Argueta (1990年2月17日); Fernando Gaitán Segovia (1990年2月17日); Manuel Jiménez (1990年2月17日); Elvis Gustavo Lovato Rivera (1990年2月18日); Vitelio Romero (1990年3月2日); Salvador Pineda (1990年3月2日); Juan José René Vásquez (1990年3月6日); Miguel Angel Valencia (1990年3月6日); Jorge Gálvez (1990年3月13日); José Lucio Argueta Flores (1990年3月27日); Olidio Flores Hernández (1990年3月28日); Luis Alonso Zelaya Garcia (1990年3月28日); Flor de María Hernández Rivas (1990年3月30日); Carlos Arturo Huevo (1990年4月13日); Marcos Alberto Huevo Guzmán (1990年4月13日); José Santos Tobar Escobar (1990年5月4日); Lorena Angélica Guzmán (1990年5月17日); Manuel Ramos (1990年5月17日); Flor Esmeralda Tejada (1990年5月17日); Mayra Marlene Ramos (1990年5月17日); Roxana Ramos (1990年5月17日); Mauro Hernández Ramos (1990年5月17日); Eleuterio Blanco (1990年5月17日); Miguel Angel Beltran (1990年5月17日); María Rufina Vásquez (1990年5月17日); Teodora Alicia Lopez (1990年5月17日); Nelson Edgardo López (1990年5月17日); Aquilino Flores Hernández (1990年5月18日); Guillermo Rivas Soriano (1990年5月28日); Fredy Rivas (1990年5月28日); Efraín Ruiz Quintanilla (1989年11月6日); Luis Alonso Argueta (1989年11月10日); Esperanza Garcia Valencia (1989年11月10日); Daila Guadalupe García (1989年11月10日); Jorge Alberto Calderón Fuentes (1989年11月11日); José Mariano Hernández Nolasco (1989年11月13日); Rosa Portillo (1989年11月15日); José Erasmo Montecino (1989年11月22日); Antonio Heriberto Hernández (1989年11月30日); José Dimas Echeverría (1989年12月5日); Carlos Ernesto Morales Carbonell (1989年12月10日); Dolores López Hernández (1989年12月12日); Miguel Hernández Recinos (1989年12月17日); Oscar Armando García Jiménez (1989年12月20日); Héctor Manuel Zapata Alvarez (1990年1月19日); Víctor Manuel de Jesús Guitérrez M. (1990年2月1日); Juan Castro Martínez (1990年2月2日); Luis Antonio Chacón (1990年2月2日); Oscar Antonio Leiva Hernández (1990年2月10日); Juan Javier Córdova Mejía (1990年2月11日); Abel Dubón Chavarría (1990年2月11日); Vicente Sánchez Flores (1990年3月3日); José Antonio Coreas (1990年4月16日); Carlos Enrique Figueroa Escobar (1990年4月17日); Luis Alonso Gómez López (1990年4月20日)



日); Rosa Alfaro (1990年4月26日); Mauricio Gabriel Barrera Ardón (191989年5月1日); María Dolores Rivas Quintanilla (1990年5月14日); Juan Francisco Ruano López (1989年6月9日); Carlos Alfredo Quintanilla Henríquez (1990年6月30日); Oscar Armando Luna Martínez (1990年6月30日); José Oscar Medrano Orellana (1990年7月5日); Carlos Arturo López Ocampo (1990年7月7日); Saturnino de Jesús Mejía (1990年7月9日); José Mauricio Menjívar Menjívar (1990年7月15日); Alfredo Octaviano Andrade (1990年7月16日); Raúl Martínez (1990年7月18日); Ramón Ventura Bonilla (1990年7月21日); Mauricio Girón Salgado (1990年7月21日); María Guadalupe Castro Hernández (1990年7月26日); Gumercindo Rosales Unaña (1990年7月26日); Ever Antonio Vargas Miranda (1990年7月27日); Balvino Vásquez (1990年7月27日); Juan Ramos Flores (1990年8月19日); José Anenias Ramírez Sánchez (1990年8月2日); Herson Alfredo Rivera García (1990年9月9日); José Roldán Tobar Melgar (1990年9月29日); Leocadio Martín Sasi Raón (1990年10月5日); Ana Silvia Rivera García (1990年10月5日); Román Alvarado Alberto (1990年10月10日)。

91. 政府在1991年10月16日的一封信函中的答复指出, José Roldán Tobar Melgar, Vicente Sánchez Flores, Luis Alonso Zelaya García, Aquilino Flores Hernández 和 Fior de María Hernández Rivas 等人系因涉嫌属于恐怖主义团体而被捕。但是他们已被释放,并且在接受人权委员会代表采访时说他们并未曾遭受酷刑。

92. 政府还提到了 José Oscar Medrano Orellana, Carlos Arturo Huevo Guzmán, Esperanza García Valencia Luis Alonso Argueta, David Mateo Sánchez Elias, Fernando Cartagena Dueñas, Rosa Portillo Hernández, José Alberto Calderón Fuentes, Ramón Ventura Bonilla, José Erasmo Montesinos Pineda, Jorge Gálvez, José Mauricio Menjívar, Saturnino de Jesús Mejía 和 Juan Gilberto Méndez 等人的情况。它说,这些人曾经被捕,后来又被释放;但是在释放前未曾接受人权委员会代表的采访。答复中未提及有关虐待的控诉。

93. 在1991年10月18日的一份信函中,特别报告员向萨尔瓦多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有关指称发生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至1991年上半年期间的酷刑案件的资料。据说在所有这些案件中,警察或军队在出于政治原因进行的拘捕中均使用了酷刑。特

别转呈了如下案件：

- (a) Vidal Ernesto Figueroa Henríquez, 1991年3月14日在圣米格尔财政警察局人员逮捕；
- (b) Tomás de Jesús Palacios, 1991年4月3日被捕，并被转交给圣维森特国家警察局；
- (c) Héctor Samuel Ramos Argueta, 1991年3月14日被财政警察局人员逮捕，并转移到圣米格尔的中央收容所；
- (d) Basilio Chicas Majía, 于1991年2月19日被捕并被带往莫拉桑省第4军事分队；
- (e) José Alberto Escobar López, 1991年12月10日被警察逮捕并被送往 Ilobasco 收容所；
- (f) Jose Vidal Barrera Pereira, 1991年3月14日在圣米格尔被财政警察局人员逮捕；
- (g) Jorge Antonio Díaz García, 1991年5月26日在圣萨尔瓦多省Delgado市 San Sebastián 区的 Colonia Santa Marta 被国民警卫队成员逮捕；
- (h) Manuel de Jesús Molina Gómez, 1991年1月15日在圣萨尔瓦多被国家警察局人员逮捕；
- (i) Teófilo Wilfredo Mejía Castro, 松索纳特省阿卡胡特拉人, 1991年7月5日被士兵逮捕；

94. 特别报告员还转呈了有关报告1991年5月10日至6月6日期间来自莫拉桑省 Yamabal、Sensembra 和 Guatajiagua 地区不同社区的大约50人被捕和遭受酷刑的资料。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是圣弗朗西斯科戈特拉的第4军事分队和圣米格尔的第步兵师的人员。特别强调了如下案件：Ambrosio Amaya, 1991年6月5日被捕；Rumaldo Jurado Argueta, 1991年6月5日被捕；及Bernabé Fuentes Hernández, 1991年6月6日被捕。

### 赤道几内亚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95. 1990年11月29日，赤道几内亚政府将一份宣誓声明送达特别报告员，作为

对他1990年7月6日发出的有关全国社会保障院前任国家代表 Juan Eyeme Maye 境况的呼吁(E/CN.4/1991/17, 第67段)的答复。在该声明中, Nguema Maye 先生说他在1990年4月被警方关押期间从未受到虐待, 也未曾遭受酷刑。事实上, 为他提供了各种便利, 他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间接受亲属和朋友的探访。此外, 他从未象呼吁中说的那样被关押在 Bata 监狱。

96. 1991年10月24日, 特别报告员就 Gabino Obiang Ela Abeme 先生据称于1991年8月5日在 Wele-Nzas 省 Anisok 县的 Nfulayong-Esandon 被士兵和摩洛哥警卫队成员逮捕一事向赤道几内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根据收到的情报, 他在被捕后遭受了野蛮的酷刑, 然后才被送到 Bata 监狱。鉴于他年事已高(62岁)且健康状况脆弱, 因此人们对他的身体健全以及他有可能仍在遭受虐待这一事实表示了担忧。

97. 在1991年11月8日的一封信函中, 该国政府指出, Obiang Ela 先生在 Bata 被警方关押了数日是因为他被发现拥有被有关当局划定为非法的宣传物品。尽管这是事实, Obiang Ela 先生已然未经起诉而被释放。

#### 埃塞俄比亚

##### 紧急呼吁

98. 1991年5月1日, 特别报告员就1990年9月至1991年2月间下列人员在 Aamara 或 Keren (Eritrea) 被捕一事向埃塞俄比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Belew Gebre-Medhin, Fituwi Asres, Gebre-Hawariat Keshi Andekial, Kidane Gebray, Russom Fissehatsion, Tsegay Gebr-Tinsae, Tsehay Mogos, Yasin Saleh Ismail, Yemane Seyoum Brei, Al-Amin Mohamed Sheikh Nur, Bakhiet Maibetot, Hassen Osman Djal, Stefanos Wolde-Ghiorgis, Suleiman Abbas (在克伦的埃塞俄比亚正式工人党第一书记) 和 Yasin Mohamed Attay (门萨族酋长)。据称被关押在 Asmara 的囚犯往往被单独监禁在 Mariam Ghimbi 安全监狱里, 并且经常在审讯当中遭受酷刑。

#### 希腊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99. 1991年2月19日, 特别报告员就下列情况向希腊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1991

年1月21日，一名土耳其国民 Halit Yalcin 同另一名土耳其国民 Suleyman Alyar 一起被雅典警察局麻醉品分队警察逮捕；后者于1991年1月29日死于 Flat 医院，据称死亡系由于警方在审讯中严酷殴打所致。鉴于此种情况，人们担心 Yalcin 先生在接受审讯时可能遭受酷刑，而且他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100. 1991年3月15日，希腊政府提供了有关特别报告员呼吁中提到的两个人以及对他们的指控的资料。它说，就 Halit Yalcin 而言，警方未曾收到任何有关虐待的报告。相反，在警方关押期间于1991年2月5日进行的先经宣誓的审讯中，Yalcin 先生根本未曾控诉或者暗示遭受过酷刑。因此，对于他可能在审讯中遭受酷刑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Suleiman Akyar 于1991年1月21日被捕后曾试图袭击一名警察，结果被其他警察制伏并戴上手拷。随后他在狂怒中将头撞在地上。Suleiman Akyar 被关押在麻醉品分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半夜时他突然感觉不舒服，并把情况告知看守他的警察。过后他失去了知觉。他当即被救护车送往红十字医院，在那里接受了紧急救护。之后，他被送往 Kifissia 的 K.A.T 医院(急诊医院)，并在那里住院治疗他与警察冲突时所负的伤。1991年1月25日，他的情况有所好转，得以拆除了人工呼吸装置。虽然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有着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却于2月28日突然恶化，Akyar Suleiman 于次日下午3:00死亡。他的尸体被送往停尸房。尸体检验证实死亡系由肺炎所致。在被警方关押期间，Halit Yalcin 曾见到 Akyar Suleiman，前者称他曾在警察局见到过 Akjyar，他看上去疲惫不堪，身体状况很差，但是没有受伤的迹象。他还强调说，他既没有看见也未曾听说 Akyar 曾在警察局内部或外面遭受警察的酷刑。政府还指出，司法当局业已介入此案，正在进行初步调查。

## 信件

101.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希腊政府，转呈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 (a) Liam de Clair, 爱尔兰公民，因与一伪造案件有关于1990年7月17日被捕，并被带往 Ios 警察局。据称在被警方拘押期间，他曾被人用拳头和棍棒击打，用脚踢，面部、头部和身上均遭殴打，并遭受性攻击的威胁。他的头部被撞在桌子、椅子和档案柜上，以企图迫使他在供状上签字。据消息来源称，他还被关押在警察局外面的一个小屋子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不许找律师，并且被迫在一份他没有完全看懂的、用希腊文写的声明上签字。该情报进一步指出，Liam de

Clair 在 Naxos 医院和 Chios 医院接受了检查，医疗报告上证实了他身上有伤痕。

- (b) 据指称，1990年9月23日凌晨，雅典Z治安警察局的警察在 Emmanouil Kasapakis 住在雅典的家里将他的左手臂打断，并用棍棒击打他的头部。另据报告，在雅典区总医院进行的医疗检查及随后的报告都证实，头部伤口需要缝合，并造成了脑震荡和健忘症，同时也证明了左手上有创伤。根据收到的情报，Emmanouil Kasapakis 已经对Z治安警察局的警方提出控诉，并以严重的身体伤害、危险的身体伤害、威胁及毁坏财产等罪名对有关警察提出起诉。
- (c) 据指称，Kostas Andreadis 在于1990年3月23日因涉嫌参加“自警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而被拘留后曾被施以 falanga (击打脚底板)和电击。据消息来源讲，Thessaloniki 法医科3月28日的一份医务报告证实他的两只脚的拇趾球均有伤痕。

#### 危地马拉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02.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危地马拉政府，转呈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

- (a) Julio Rodríguez 和 Edgar Villatoro, El Peten 省 Sagaxché 市 El Tumbo 和 Buena Vista 的农民，1990年7月15日被捕，据称曾在 Hacienda La Anchura 遭受酷刑。他们的健康因此而受到影响；
- (b) Rosa María López Monzón, 据报告于1990年10月31日被捕，并在危地马拉 第7区 Colonia Bethania 的国家警察局中被三个不明身份的警察施以酷刑。他们用香烟烫伤她身体的许多部位，还威胁说如果她告发他们就杀死她；
- (c) Otto Iván Rodríguez Vanegas, 电气化研究所雇员，1991年4月5日在 Chiquimola 被捕并被送往 Chiquimola 国家警察中心。据报他在那里遭到毒打，被人用香烟烫伤，而且左眼严重受伤；
- (d) 两个年青人，Elías 和 Lucas Florián, 分别为13岁和17岁，他们的尸体于1991年3月4日被人在 Retalhuleu 省的 San Andrés Villaseca

发现，尸体上留有酷刑和勒死的痕迹。

103. 在1991年10月18日写给危地马拉政府的一份信函中，特别报告员转呈了如下资料：一些人在被逮捕和失踪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尸体经常会出现在道路旁或悬崖下边，而且身上或者都有酷刑的痕迹，或者肢体残缺不全。从那些曾被关押在秘密监禁中心而后被释放的人们那里获得的为数不多的证词表明，警方和军方在审讯过程中均经常使用酷刑，如殴打、强奸、用烟头灼伤、电击、窒息、用酸液烧伤、强迫吸入有毒气体，等等。尤其转呈了关于下列案件的资料：

- (a) Sebastián Velásquez Mejía, 1990年10月6日在危地马拉市被几个可能与政府部队有联系的人逮捕。两天后有人在 Avenida dei Ferrocarril 发现他的尸体。法医检查报告表明，他的胸腔和腹腔有四度挫伤，肺部水肿，内脏充血，等等；
- (b) Julio Choalcu Ben, 23岁，1990年12月16日被两个名叫 Andrés Chalcu 和 Vicente Morales 的士兵逮捕，并被带往Sololá 第14号军事基地，在那里被关押数天并遭受酷刑。1990年12月27日他被丢弃在靠近 Escuintla 的公路旁。他被人送到医院，昏迷不醒长达数月；
- (c) Diana Ortiz, 美国人，一个宗教组织的成员，1989年11月2日在安提瓜被几个开警车的人逮捕。据报，除其他情况外，她多次遭受酷刑，被人用烟头灼伤，并遭到强奸；
- (d) Faustino Palma, Gonzalo Gómez Castro 和 Celedonio Pérez, 1991年3月27日被捕并在 Izabal 省 Los Amates 的军事分队遭受酷刑。该案被报告给人权检察官，他已查明情况属实，并向 Puerto Barrios 的军事检查官提起对一名军队指挥官的控诉；
- (e) Francisco Castillo García, Ezequiel Trujillo Hernández 和 Carlos Geovanni Rosales Chávez, 最近在危地马拉市被警方逮捕，并被带往第三陆军总军营，在那里被关押两小时，并遭到毒打。其后他们被送往刑事调查署，继续遭受酷刑，尤其是被人用头罩窒息殆毙，被人殴打并用酸液烧伤双手。

104.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还向该国政府转呈了有关所谓“街头儿童”经常遭受治安部队人员，特别是警方的虐待的资料。例如，1991年7月31日，有人在危地马拉市第3区的一个垃圾筒里发现了一名六、七岁儿童的尸体，他曾遭受严重的酷刑；他的双眼被挖掉，头部遭受重击，以致无法辨认出他的容貌。特别报告员还转呈了有关 Edwin Esteban Rodríguez 的案件。这名街头儿童15岁，因偷窃

太阳镜而被警方逮捕。依照危地马拉的法律，Edwin Rodríguez 理应被送往未成年人法庭，然而相反，他却被带到 Mixco 区的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并遭受酷刑。显然，他身体各部位，特别是头部遭到殴打，胸部、背部以及睾丸均被烟头灼伤，之后他被丢弃在路边的一条沟里。

105. 在1991年12月5日的一封信中，政府就有关Sebastián Velásquez Mejía 和 Diana Ortiz 的案件做出答复。关于前一个案子，政府指出，El Queche 省 Chunima Canton 的两名前民防巡警已被逮捕，现正以殴打和谋杀的罪名对其审判。关于第二个案子，Sacatepéquez 初审刑事法庭正在进行调查，目前调查尚处于保密阶段。

## 海 地

### 紧急呼吁

106. 1991年11月20日，特别报告员就下列人员问题向海地政府发出紧急呼吁：André Augustin; Wilson Bien-Aimé; Béatrice César; Edwin Cesar; Ronand Armstron Charlot; Daniel Delisle; Louis Donald; Berthelemy Francois; Gaspard Fritzner; Béatrice Fortuna; Frantz Fortuna; Marjorie Gard; Gerald Gilles; Ginette Grégoire; Patrick Isidore; Roland Jean; Chenet Jean-Baptiste; Beus Jean-Francois; Opem Jean-Julien; Wesley Jean-Julien; Elfine Jean Jumel; Marie-Claude Jospech; Ronald Léon; Edieu Louissaint; Evans Motellus; Stanley Montour; Léon Ronald; Béatrice Rosilbe; Bellande Sincère; Hans Termilus; Rodrigue Thermilus; Frantz Thermilus; Jean-Baptiste Yves。根据收到的情报，1991年11月12日，一群士兵突然冲进海地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太子港科学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中，并将上述人员逮捕。他们被装上卡车并带往国家监狱和反黑帮警备队。据收到的消息说，他们遭受了酷刑；在逮捕发生的当天，住在附近的人听到了从大楼里传出的尖叫声。

107. 1991年12月10日，特别报告员就 Jean-Mario Paul 先生一事向海地政府发出紧急呼吁。Paul 先生是安的列斯电台派驻 Petit Goave 地区的记者，据报他于1991年11月9日在太子港被捕。据称，被捕后他被转移到 Petit Gôave，并遭到毒打。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 Paul 先生的健康状况以及他有可能继续遭到虐待

一事表示担忧。据说对他的指控是在1991年9月30日的一次游行示威过程中放火焚烧了一家法院和一处警察岗亭。Paul 先生指出，他当时只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现场。

## 信件

108.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海地政府，转呈了有关在海地继续发生酷刑和虐待事件以及监禁中因酷刑致死的案件的资料。消息来源指出，所施酷刑之一叫作“djak”，即将受害者双手捆绑，用一根棍子插在其双腿之下、双臂之上，并猛力击打其身体。逮捕往往是为了一些很轻微的罪行，并且时常导致酷刑，造成严重的身体和精神损伤，甚至造成死亡。据说下列人员在1991年3月至4月间曾遭受酷刑和虐待：

- (a) Philistin Auguste, 农民, 54岁, 1991年3月4日在 Obléon 被一支部队逮捕, 据称逮捕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逃犯Lucien Auguste的父亲。Philistin Auguste 被带往 Kenscoff 军事基地, 据报他在那里被施以“djak”酷刑。他于当天被释放, 但医疗检查报告提到他的腰背部和臀部有伤痕, 左脚踝肿大, 腓骨骨折;
- (b) Lucien Auguste, 24岁, 失业, Philistin Auguste 之子, 和Joseph Nixon, 23岁, 失业。两人于1991年3月4日被捕。据报Lucien Auguste 被施以“djak”酷刑。两人的脚底板和肋骨均因酷刑而受伤。他们被送上太子港民事法庭, 随后被带到太子港国家监狱。Lucien Auguste 于1991年6月间被释放, 但 Joseph Nixon 仍被关押在太子港国家监狱, 而且得不到任何医治。

## 洪都拉斯

### 紧急呼吁

109. 1991年6月24日，特别报告员就下述事宜向洪都拉斯政府发出紧急呼吁：Santos Danilos Ramos 先生和 Santos Dagoberto Franco 先生于1991年6月11日被国家警察署人员逮捕，据报告他们被指控参加了1991年5月3日在Atlántida 省Agua Caliente 发生的大屠杀。据说他们被关押在 Atlántida 省



的 Tela 监狱期间，曾被施以酷刑，以强迫他们承认对他们的指控。

## 信件

110. 1991年2月4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洪都拉斯政府，转告下述据报发生在1990年的酷刑案件：

- (a) Angel Arturo Escobar Lobo, 1990年2月4日在 Dulce Nombre de Culmi 市被 Catacamas 的国家警察署人员逮捕；
- (b) Rogelio Acosta, 1990年3月25日在 Yoro 省 El Progreso 被驻扎在当地的士兵逮捕；
- (c) Medardo Márquez Argueta, 领土部队现役下士军官，1990年3月3日因被指控与萨尔瓦多游击队勾结而遭逮捕。他被单独监禁在领土部队位于 La Paz 省 Marcala 市 Los Llanos de San Antonio 的总部的地下室监狱中；
- (d) Francisco Reyes Bonilla, 被警方逮捕，据说在国家警察署遭受酷刑；
- (e) Francisco Lagos Holman, 被警方逮捕，据说遭受了五天的酷刑。

111.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洪都拉斯政府，转呈了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据称 Angel Maria Bonilla Donaires, Victor Manuel Ramirez 和 Leonidas Ramirez 于1991年2月被捕并被公安部队人员施加酷刑。

112.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洪都拉斯政府，转呈了有关发生多起有人被非法逮捕以及在军事驻地接受审讯并遭受酷刑的案件的资料。经常采用的酷刑方法包括长时间给犯人戴上手拷和蒙住眼睛，不提供食物和饮水，击打脚底和身体其他部位，有绳子捆住手腕和脚腕吊起，窒息，使用电击，以及制造心理压力，例如威胁逮捕家庭成员并对他们施以酷刑。在有些情况下还威胁受害者，使之不致告发所遭受的酷刑。据说酷刑不仅限于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对卷入土地争执的农民或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们同样使用了酷刑。此外，还采取各种措施，以防在受害者身上留下任何遭受酷刑的痕迹，或确保实施酷刑者在事后不会被辨认出来。尤其向政府转告了下列案件：

- (a) Marcos Reinero Castro, Eduardo Salguero, Gilberto Calderón, Oscar Gómez, José Santos Flores, Servando Galeas Banegas 和 Osmán Flores, 1991年1月18日和24日在 Yoro 省 Sulaco 市被公安

部队成员逮捕；

- (b) Manuel Corrales Alvarez, Carlos Martín, Eugenio Cruz Chavarría, José Eduardo Hernández, Efrain Bonilla 和 Darío Martínez Figueroa, 农民, 1990年12月14日在 Olancho 省 Pisijire 市被一群公安部队警察逮捕；
- (c) Liliana Esperanza López, 1991年1月31日被捕, 并被带往国家警察署；
- (d) Ramón Bartolo Espinol Amador, 1990年10月16日被捕, 并被带往 Tegucigalpa 市的国家警察署；
- (e) Manuel Castillo Reyes, 1990年4月10日在 Lempira 省 Cololaca 市的 El Higuito 被特别部队小分队成员逮捕, 并被带往位于 Copan 省 Cucuyagua 的驻地；
- (f) Osmar Eugenio Urquía, 1990年11月12日被国家警察署和公安部队的警察逮捕, 并被送往位于 Intibuca 省 Esperanza 市的国家警察署。
- (g) Maria Antonia Ramos de Linares, 1990年5月24日在 Santa Rose de Copan 被国家警察署逮捕。

113. 特别报告员还转呈了据称因在监禁中遭受酷刑而死亡的下列人士的案件：

- (a) Oscar Armando Ponce Morales 中士, 驻扎在 Colon 省 Silin 市的第十五步兵排的一名士兵, 1990年11月13日在该步兵排营地遭受酷刑后死亡；
- (b) Eduardo Ramón Salgado, 1990年3月2日在 Yoro 省 Santa Barbara 市被公安部队逮捕；
- (c) Victoriano Castillo Euceda, 1990年9月2日在 Choluteca 和 Tegucigalpa 之间的狭长地带被来自 Choluteca 的国家警察署的警察逮捕；
- (d) Riccy Mabel Martínez, 1990年7月13日有人在悬崖下面发现了她的尸体, 在她身上有被殴打和强奸的痕迹, 有人怀疑此事系武装部队的两名士兵所为。

## 印 度

### 信 件

114.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印度政府，转呈有关下列案件的资料：Ram Swaroop 先生，40岁，Narela Delhi 人，1991年1月28日因与一桩据称发生在他受雇的德里电气公司中的盗窃案件有牵连而遭逮捕。他被带往 R.K. Purum 警察局，据说在那里，他受到副警官 Jog Raj 和 Jartar Singh 的审讯。1991年1月31日，Swaroop 先生被送往 Safdarjung 医院，不久他便死在那里。据报，警方声称死亡系肺结核突发所致，他在四年前曾为此病接受过治疗。但是他的亲属在晚些时候见到了他的尸体以后称，尸体上带有明显的遭受严重酷刑的痕迹。未曾有报告说是否进行了尸体解剖以及是否对死亡情形进行了调查，也未看到有关尸体解剖及调查结果的报告。据消息来源讲，事件发生后，有两名未公开姓名的警察被停职。

## 印度尼西亚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15. 1991年4月29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印度尼西亚政府，转呈以下资料：据称1990年在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东帝汶、伊里安查亚和亚齐等据说反叛或分裂主义运动相当活跃的省份，发生了酷刑案件。据报告，所提到有受害者包括学生活动分子、反政府团体成员，以及普通刑事犯。据指称，酷刑不时导致死亡，而且是由各地方警察当局以及国家军队人员所为。在东帝汶，据称反政府活动分子在被单独监禁在保安部队的秘密拘留所或拘押中心时经常遭受酷刑和虐待。提到的酷刑或虐待方式包括殴打、用烟头烫、电击、用刀片割，以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据报告，在东帝汶发生了如下的酷刑案件：

- (a) Abilio Mesquita, 学生, 23岁, 1990年10月29日在帝力被捕;
- (b) Constancio Concei Pinto, 26岁, 帝力 San José 中学的一名教师, 1991年1月25日被捕;
- (c) Justina Moniz, 25岁, 1989年11月在 Same 附近被捕;
- (d) Bai Meta, 48岁, 1985年8月2日在 Bibileo 附近被捕;

- (e) Donaciano R. Costa Gomes, Francisco Maria Sousa, Clementino Faria, Guilherme Pereira, Antonio Pereira Lopes, Lourenco Pereira 和这些人都是帝力的学生, 1989年11月4日被军事人员从主教的住所中带走; 据称他们被拘留并遭受酷刑, 包括被电击, 后来于1990年2月6日被释放;
- (f) Agostinho Pereira Martins, 学生, 21岁, 1990年1月17日在帝力被拘留;
- (g) Paulo Rossi, 23岁, 学生, Paulo Monteiro Babo, Ermera 小学教师, 两人于1990年1月17日被逮捕;
- (h) Sergio Fontura Guterres, 1990年10月16日在帝力被拘留;
- (i) Domingos Pereira, 23岁, 学生, 1990年10月17日在 Atsaba 被拘留;
- (j) Jose Francisco Magali, 14岁, 帝力“保罗六世”学校学生, 1990年11月8日被拘留;
- (k) Belchior Pereira, 帝力“保罗六世”学校学生, 1990年11月8日被拘留;
- (l) José Antonio Galucho, 31岁, 公务员, 1990年11月13日在帝力被捕;
- (m) Cipriano Amaral, 35岁, Atsabe 的一名教师, 1990年12月7日在 Hatas 被捕;
- (n) Adao Da Purificacao, 45岁, Maliana 的公务员, 和他的弟弟 Carlito Da Purificacao, 30岁, 1990年12月10日在 Leolima 被逮捕;
- (o) Acacio de Araujo, 39岁, 公务员, 1990年12月13日在 Ritabou 被捕;
- (p) Olandino Guterres, 30岁, 警察, 1990年12月17日在 Ritabou 被逮捕;

116. 特别报告员还提请政府注意以下几人的案件: Hendrik 先生, Bogor 市(西爪哇省)Pakuan 大学的学生; Edi Murtono 先生, Pancasila 大学(雅加达)的学生; Sandra Iskandar 夫人, Sekolah Teknik Tinggi Nasional(雅加达)的学生。据报告, 这三人于1990年10月7日在发生在西爪哇 Majabengka 的一次农民游行示威中被印度尼西亚空军士兵逮捕, 据指称他们后来遭受了酷刑。据称 Hendrik 先生由于在押期间受伤一直未愈, 因而住进了 Majabengka 的地方医院。

117. 在1991年9月27日的一封信函中，印尼政府转达了有关上述一些案件的资料。信中特别指出，Laurenco Pereira, José Manuel da Silva, Agostinho Pereira Martins, Cipriano Amaral, Sergio Fontura Guterres 和 Olandino Guterres 等人既从未遭到拘留，更没有受到酷刑。至于 Abilio Mesquita, Constancio Concei Pinto, Francisco Maria, Clementino Maria, Guilherma Pereira, Antonio Pereira Lopez, Domingus Pereira, José Francisco Magili, Adao da Purificacao 和 Acacio de Araujo 等人，政府指出，他们确曾因为参加了各种非法活动而遭逮捕和审问，但所有这些人事后均已释放。最后，关于 Bai Beta, Donaciano Costa Gómez 和 José Antonio Galucho 等人的情况，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Bai Beta 已于1990年3月31日返回他家所在的村庄，Donaciano Costa 已被遣返葡萄牙，而 José Antonio Gulucho 则因犯罪活动和洗钱罪名于1990年11月13日被逮捕，并被判处两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118. 1990年12月20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致函特别报告员，对他于1990年7月20日就几位部长和前总理默赫迪·巴扎尔甘的几位同事的处境所发出的紧急呼吁（见E/CN.4/1991/17，第87段）做出了答复。政府通知特别报告员，呼吁中提到的一些人已于1990年12月10日被释放。被释放的人有 Reza Sadr, Ezatollah Sahabi, Farhad Behbahani, Abbas Ghaem Al Sabahi, Mohmoud Naimpoor, Nour Ali Tabandeh 和 Hossein Shah Hosseini。另外申明，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38条规定，任何酷刑或虐待均为法律所严格禁止。

119. 1991年1月23日，特别报告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呈了他收到的有关 Abdolali Bazargan 和 Mohammed Tavassoli Hojati 案件的进一步资料。他曾在1990年7月20日的一份电报中连同其他人一道提到过这两个人。根据这份资料，Abodolali Bazargan 已被从 Evin 监狱转移到德黑兰的一所拘押中心，以便进一步审讯，据称目的在于强迫他在电视上公开坦白。另据报告，自从1990年6月被捕以来，他只接受了一次家属的探访，并且在他被拘押的最初日子里，他曾经遭受毒打。关于 Mohammed Tavassoli Hojati，据报告他一直受到压力做类似的坦白，而且自从被捕以来，他从未接受过任何探访。特别报告员提到

了伊朗政府1990年12月20日给他的信(见前一段)中所说的情况。据这封信讲,在他电报里提到的人中,有七人已经被释放,其他犯人的身心健康权利也受到了保障。但是,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 R. Galindo Pohl 先生在他的临时报告(A/45/697)中指出,在他1990年10月13日访问 Evin 监狱时,他并未获准采访前面提到的那两名犯人。鉴于这一额外的资料,以及人们对这两名犯人的处境再一次表示的担忧,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伊朗政府确保这些人的身心健康权利得到保护,并且在拘押期间受到人道的待遇。

120. 1991年9月11日,特别报告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呈了他收到的有关 Ali Ardalan (85岁), Abdolali Bazargan 和 Habidollah Davaran(在他1990年7月20日的电报中亦曾提及)三人的进一步情况报告。据说,在此前的几个月里,这三人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有人担心,除非立即提供适当的医疗,否则他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

121. 1991年11月1日,伊朗政府通知人权委员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代表说, Ali Ardalan 先生已被送往医院并接受了必要的医疗检查。目前他正在自己的住所中休养。

## 信件

122.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伊朗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有关 Massoud Afravi 先生遭到逮捕和酷刑的情报。此案的细节已在上文第24段中详细介绍。

123.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伊朗政府,转呈了他收到的如下情报: Elyas Kohan 先生,据说于1991年2月25日被捕,并被带往 Evin 监狱,在那里他被蒙住眼睛,锁在一间单人牢房里。有几次,他被带到酷刑室,被人用硬塑料棒击打头部、脸部和身体其他部位,包括脚趾和手指甲。结果,他的上颌被打折。他于1991年5月23日被释放,释放前他被警告,有关酷刑一事不得向任何当局告发,也不得告知任何人。

124. 在同一封信中,特别报告员还转呈了有关 Nezameddin Movahed 先生健康情况的资料。Movahed 先生74岁,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据消息来源称,他眼睛和心脏均有问题,而且有一条腿已明显丧失功能。

## 伊拉克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125. 1991年3月28日特别报告员向伊拉克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涉及到下述一些据报道于1991年3月20日遭到拘留的人员:大阿亚图拉Abul Qassem Al-Kho'i; Sayyid Mohammad Reza Mousavi Al-Khalkhali, 63岁; Sayyid Ja'far Babrul Ulcom, 56岁; Sayyid Izzaddin Bahrul Uloom, 约55岁; Sayyid Muhammad Taghi Al-Kho'i, 32岁; Sayyid Muhyaddin Al-Ghuraif; Sayyid Muhammad Ridha Al-Kharsan; Sayyid Muhammad Al-Sabzwari; Sayyid Muhammad Ridha Al-Sa'idd; Sayyid Muhammad Saleh; 和Abd Al-Rasul Al-Kharsan 他还通知政府,大阿亚图拉的10名亲属:他的女儿、儿子、儿媳和7名3至11岁的孙儿孙女也于同日遭到拘留。据报道,上述这些人是在伊拉克政府军武装袭击大阿亚图拉在纳杰夫的住所时遭到拘留的。大阿亚图拉Abul Qassem Al-Kho'i被直升飞机运往巴格达,出现在巴格达的电视上。还有报道称,大阿亚图拉患有心脏病,正被监禁在纳杰夫,以上所述的其他一些人则据说被关押在巴格达的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126. 政府于1991年4月19日的答复驳斥上述指控为“毫无根据”并且还作了下述声明:

“伊拉克人民和当局对杰出的宗教教长十分尊重,绝不会使他们遭受任何形式的监禁或伤害。阿亚图拉Al-Kho'i在电视上露面以及在纳杰夫接受记者采访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特别报告员照会中所载的资料错误的性质”。

## 以色列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127. 1991年6月6日以色列政府致函特别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1990年向该政府转呈的3个指称酷刑案件的资料:

- (a) 'Abd Al-Raiuf Ghabin (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0段): 来信阐明,经当局调查之后,关于3个星期不准他睡觉的指控,已经查明不符合事实。政府还说,在Ghabin为延长他的监禁期上法庭时并未提出任

何有关虐待的声称，而且在调查期间，他撤回了他原先的大部分指控。但是，他仍然坚持，在对他进行审讯期间，审讯官曾经挤压他的生殖器，这一指控遭到审讯官的坚决否认。Ghabin同意就一声称进行测试器检查，而检查结果是无可辩驳的：这一指控也被查明是毫无根据的。调查的结论是，并没有任何违背公认的审讯程序的作法。

- (b) Ahmed Kabaha(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1段): 来信说,1990年10月11日当Kabaha与一名法官见面,听取延长其监禁期的法院命令时,他向法官展示了他胸口烟头的烙伤,他称这是审讯官给他灼伤的。虽然法官对Kabaha的声称是否属实表示怀疑,但是,他还是下令进行医疗检查,并且要求将检查结果记录在案。两天之后,即1990年11月13日,Kabaha向警察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宣称1990年11月9日,他向监狱守卫要来一支香烟,在自己的囚室中,将香烟点着并将烟头灼烫自己的胸口,直至能看出烙伤。同时,Kabaha还就他本人的诬陷指控表示了懊悔。
- (c) Rami Muslah(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1段): 来信称,检查当局(同时也是聆听 Muslah 证词的当局)查明虐待的指控毫无根据。由于 Muslah 是一名未成年人,审讯官特别注意遵照有关此类审讯的规则和规章。至于 Muslah 所谓审讯官用手枪对准他的脑袋并威胁枪毙他的声称,也被查明是无稽之谈。审讯规章具体规定禁止在审讯地区有任何武器的存在。根据加沙监狱的记录, Muslah 在一抵达监狱时,就接受一名医务官员的检查。在他开始被监禁时,他告诉医务官员他曾经因胸口疼痛住院。随后,他曾经受到一名医生若干次的检查,并得到适当的治疗。 Muslah 承认,过去两年来他患有气喘病并且一直不断地接受治疗,包括住院治疗。此外,他说,他对于在加沙监狱受到的医务治疗感到满意。在 Muslah 受审讯期间,他还接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名代表的若干次探访。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28. 以色列政府于1991年6月6日致函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下述有关若干酷刑指控的案件情况资料,这些案件分别由1990年6月6日和1990年10月15日的信件转呈该政府的:



- (a) 关于 Murad Muhammad Isa Jadallah 的案件(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3(b)段),答复称,警方公众投诉部门对Jadallah及其家属提出的虐待指控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并且由国家检查厅进行了审查。根据调查结果,Jadallah曾于1989年10月29日由Russian Compound监狱的医生进行了检查。1989年11月2日他的家人聘请的一名医生也对他进行了检查。上述两名医生发现在Jadallah的身上有一处青紫块,一块在他的前额,另一块在他的左大腿。医疗检查报告的结果并不能证实控诉的严重程度并且与Jadallah声称他曾经通身遭到木棍殴打的指称相矛盾,因为用木棒通身殴打应当造成其他一些明显的创伤。虽然国家检查厅愿意提出刑事诉讼程序,追查造成Jadallah两处青紫块的人或一些人员的责任,但是有关这一案件的旁证迄今为止还不能提出这样的起诉。Jadallah的一些声称也被查明缺乏可信性。例如,除了以上所诉的医疗检查结果之外,他声称他曾经遭受7名审讯官同时审讯的说法,也是极不可能的。此外,由于若干名警察在各个阶段参与了这一案子的工作,很难将Jadallah身上的两处青紫块归罪于任何具体某个人。不幸的是,如果不这样追究,就不可能提起刑事诉讼。当局对于未成年人的控诉是尤为敏感的,特别是有医疗证明证实这一控诉的某些方面。因此,虽然未对逮捕或审讯Jadallah的任何一名警察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的控诉档案仍有待于进一步审查。
- (b) 至于Walid Aub-Surur和“和平斗士”团体的案件(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4段),答复称,1990年4月17日有人从Aida难民营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士兵们进入难民营,逮捕了其中一个投掷石块者Mustafa Akal,并随后前往Walid Abu-Surur的住房,对于他参与这一事件进行了讯问,并查问了投掷石块者们的身份。为了避免在难民营中引起动乱,士兵们要求Abu-Surur跟他们走。他拒绝了,并曾一度抓住其中一名士兵的上装。这名士兵为了挣脱他,用步枪枪托击打了Abu-Surur。根据答复,这是士兵们打他的唯一一次情况,尽管他仍然挣扎,力图抵制士兵们将他带上吉普车。这些士兵以前从未遇见过Mustafa Akal或者Walid Abu-Surur,而且也从未听说过“和平斗士”的团体。这些士兵只是针对上述投掷石块的事件作出反应。
- (c) 关于Riad Shehabi的案件(见E/CN.4/1991/17号文件,第95段),答复称,以色列警察的公共申诉股对他的申诉进行了彻底的调查,随后国

家检查厅也进行了调查。由于这一调查的结果,1991年3月21日根据刑法第380节,以造成身体伤害的攻击罪名对上士Rami Chefetz提出了刑事起诉。政府还说,这一案件将由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审理。

129.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向以色列政府发出了一封信件,转呈了有关巴勒斯坦人因在被占领领土起义而遭受酷刑的指控案件情况。据说,犯罪者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员以及总安全局的警探。以下所报道的是一些指控酷刑的详细案件:

- (a) Amal 'Auda Qabna, 17岁, 原住Jericho, 于1990年5月8日被捕, 据称他的头部遭到执行逮捕的警察殴打, 据说, 她由于遭受殴打而头疼一再发作。
- (b) Farah Yunis, 19岁, 原住Rafah难民营, 于1991年8月24日在家中被捕。据报道, 在军方司令部, Farah遭到士兵们实施的酷刑, 这些士兵殴打他、挤压他的生殖器并造成他窒息。据称, 他曾经精神崩溃并产生幻觉, 而且企图自杀至少一次。
- (c) Rana Abu Kishek, 16岁, 原住Tulkarem, 1990年9月22日因企图刺杀一名士兵遭到逮捕。据报道, 她遍身遭到严酷的毒打, 并且根据联合国的一名医生, 她患有精神创伤后的抑郁症。
- (d) Amal Abu-Lehye, 25岁, 原住Bany-Suheila, 据称于1990年12月21日在她的家中遭到三名士兵和两名总安全局的官员实施的酷刑。她胸部遭到严重的殴打、被迫脱光衣服、并受到强奸的威胁和性骚扰。
- (e) Mazneh Abu-Hakma, 22岁, El Bireh的一名学生, 于1990年10月28日被捕。在她被拘留的头两个星期期间, 据称她被强迫坐在一张椅子上双手反绑在背后, 并在她的头上套上一条麻袋。据称, 不准她睡觉, 有时甚至不给吃东西和不准移动。
- (f) Zafer Farid Attawil 和 Ala Salah Warrad 都是14岁, 原住耶路撒冷, 在一个具体日期不清楚的日子遭到逮捕, 并且于1990年11月18日延长了他们的监禁期。在他们监禁期间, 据称, 他们俩都受到士兵们的殴打, 而且据报道, Warrad由于所遭受的殴打, 被送入以色列医院。

130. 政府于1991年5月28日的信件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以色列监狱条件的一份总报告。

## 意大利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31. 1991年1月25日,意大利政府呈送了下述资料,作为对特别报告员1989年10月2日信件(见E/CN.4/1990/17号文件,第75段)的答复,阐述了据说于1988年在意大利的囚犯受到虐待的若干案件。

132. 至于据报道于1988年5月在米兰发生的案件,米兰公共检查官对于被司法警察逮捕的一些人在逮捕期间或就在逮捕之后受到的伤害进行调查。这项调查调查了每一个声称他曾经遭到殴打或受到伤害的囚犯案件,大部分情况下,在医疗检查中发现的受伤处都与囚犯本人在他们被逮捕时采取的暴力或拒捕行动相关。在有些情况下,监狱报告所附的医疗证明指出缺乏客观的内容以证实这些所谓曾经遭受上述暴力的人员作出的陈述。对于受害者所申诉的暴力行动的案件或者对一些客观上更为严重的案件,作出了初步调查的准备阶段。除了进行初步调查外,还要求对若干因严重的暴力行为和袭击行为,对若干警察和宪兵进行候审拘押。在一个案件中,一名警察已经被判处9个月的缓期监禁。其他一些案子仍在审查之中。

133. 在Kader Fall的案件中,调查披露,1988年4月16日晚,他在Civitanova Marche警察所遭到一名警察的殴打。对这名警察曾经提出过刑事诉讼,但是Macerata地方预审法官于1988年12月20日将他无罪释放,因为事实看来并未构成一项罪行:被告殴打Fall先生并不是为了迫使他作任何事情,而只是对Fall先生的挑衅行为,作出的反应。

134. 就Domenico Garzon的案子而言,他在预审监押期间逃跑,并且窃走了属于San Bonifacio宪兵的武器。当他被卫兵抓住时,他开始徒手搏斗,被带回警察所时则疯狂地抗拒。随后,他被监禁在维罗纳。他向维罗纳的公共检查官提出申诉,声称他在这一事件中遭到虐待,后来公共检查官请求下令撤销1989年1月17日的诉讼程序。

135.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意大利政府发出了一封信件,涉及据报道在1990年12月15日搜查Salerno的Fuorni监狱时发生的事件。根据所收到的资料,搜查是由那不勒斯区域狱警办公厅的150名获警进行的。狱警们带着面罩并携带警棍,进入囚室,强迫囚犯们脱去衣服,作俯卧撑。然后囚犯们遭到拳打脚踢并被迫一个个地通过狱警们站成的两行列队,这些狱警们用棍棒抽打他们。消息来源坚持认为,有些囚犯还遭受性攻击,而且有些年轻的囚犯被迫抽打年老囚犯的耳光并向他

们的脸上吐沫。根据这一消息来源,这一搜查的背后原因是怀疑这些囚犯手中掌握武器准备用于反叛,但是同一消息来源说,在搜查期间并未发现火器,而且囚犯们也未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在这事件之后,监狱医务室发出了100多份受伤的医疗证明。根据医务工作人员,这些伤口需要3至5天才能愈合。据报导有四或五个囚犯被转送到医院。其中一名囚犯就此问题写信给一家私人电台说,在搜查中受伤的囚犯包括一名囚犯失去一个眼睛,另一名囚犯耳膜被击穿,还有一名囚犯手骨折断。约在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一些激进党党员探访了这个监狱,使某些囚犯得到提出了申诉,说他们背部和胸肋剧烈地疼痛,和尽管他们要求拍摄X光,但一直没有照射。根据资料来源,已经开始了司法和行政调查,以便查清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

## 约 旦

### 紧急呼吁

136. 1991年6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约旦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谈及了Muhammad Jaber Hasan Mut'ab,24岁,于1991年4月30日因被怀疑与某一非法的巴勒斯坦团体有联系而被捕。据报道,在他被捕一个星期之后,他被押往住安曼的情报局总部,根据紧急状态立法条例,他在那里被单独监禁,但不予起诉。上述紧急条例允许不予起诉或审讯,无限期地关押被拘留者。据报道,自Muhammad Mut'ab被捕以来,一直没有律师探访他。据称,在情报局总部关押期间,他遭受到殴打,颈部受伤。

## 肯尼亚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137. 1991年2月4日肯尼亚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Koigi Wa Wamwere先生和若干同案被告者的进一步情况。特别报告员曾于1990年10月16日和23日为上述这些人发出了紧急呼吁,并且收到政府1990年10月28日的第一次答复(E/CN.4/1991/17号文件,第100至102段)。根据政府随后提供的资料,总检查长正在调查被控叛国罪的Koigi Wa Wamwere以及他的6名同案被告提出的指控,即他们遭到监狱当局的骚扰并且承受非人道和有辱人格的状况。辩护律师和副检查官Etgang先生在内罗毕的一家法院确认,他们同意以行政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138. 1991年3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肯尼亚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转呈了有关Gitobu Imanyara,37岁,律师和《内罗毕法律月刊》编辑,的资料。Gitobu Imanyara于1991年3月1日被警察逮捕,并被押往无人知晓的目的地。1991年3月5日他被指控煽动暴乱和挑起部落仇恨。根据资料来源,有人认为Imanyara先生被关押在国家安全情报局内罗毕省的总部,叫做“Ngayo House”。根据近年来政治犯在那里遭受酷刑的指控,人们担心,Imanyara先生很有可能遭受酷刑。

139. 1991年3月18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Gitobu Imanyara先生确实已经被捕,并被指控煽动暴乱和挑起部落仇恨。同时还说,Imanyara先生的律师并未提出遭受酷刑的的诉讼,而且在申请保释时,他曾经几次出庭,并没有任何遭受酷刑的迹象。可以确认,他的身心健全权利一直得到维护。他的妻子和家庭近亲,以及律师经常对他进行探访;因此,对于酷刑的指控或担心是毫无根据的。

### 科威特

#### 紧急呼吁

140. 1991年8月1日特别报告员向科威特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涉及到Nazmi Salim Khurshid医生,46岁,一名持有黎巴嫩旅行文件的巴勒斯坦人。Khurshid医生于1991年3月10日在他的工作地点Al-Ardiyyah与其他几名巴勒斯坦医生一起被捕。起先,他在Al-Ardiyyah警察所被关押了3天,然后,于或约在3月13日被转至国家治安监狱。据报道,Khurshid医生的状况极为严重,据称这是在他被捕之后受到科威特保安部队残酷殴打的结果:据说,他陷入昏迷状态,接近死亡,并且左腿瘫痪。根据消息来源,Khurshid医生被关押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点,既不起诉也不审判;自从他被捕之后,他的家人一直未见到他,而且也不知道他是否得到任何医疗照顾。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41.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向科威特政府发出了一封信,转呈了有关资料,根据这一资料,有些居住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国籍的国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后裔,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一直遭到迫害、逮捕和酷刑,以报复他们据说在科威特被占领期间支持伊拉克部队。据称,科威特常规武装部队和武装的科威特平民都应当为这

种行为负责。还有人进一步指称称巴勒斯坦人后裔在一所未具体指明的医院第18号楼,遭到酷刑和杀害。根据一家外国新闻社,1991年3月13日,19岁的Salah Abdel Rahim,声称,他在Al-Areidiyeh学校遭到科威特武装人员施加的酷刑;在同一天,21岁的Mahmud Hussein确认,他在Al-Jahra学校遭到科威特武装人员用电棍殴打。其他各个新闻社和报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件。

142. 政府于1991年5月29日的答复驳斥了上述指称,声称这是一些“令人怀疑的消息来源”提供的情况,并且还称在科威特解放后的初期,科威特只出现少数这些支持和与伊拉克部队狼狈为奸的人被虐待的个别案件,而且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伊拉克情报部门在他们撤离之前安插在科威特以便煽动暴乱的“活人引信”制造的事件。无论如何,即使发生这种事件,也是人们对与伊拉克侵略军狼狈为奸的人们作出的自然反应。尽管只要他未遭到任何起诉,科威特政府并不阻止任何人离境,一些外国人社区仍然留在科威特并没有离开,这些事实表明,科威特的安全状况是可以保证的,而且科威特的外国居民享有极好的生活条件。

143.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科威特政府发出了一封信,转呈了有关下述案件的资料:

- (a) Mahmoud Diyab Abdalla, 35岁, 以及其堂兄Omar Abdalla, 据称于1991年3月17日因被控在科威特非法居住而遭到逮捕。他们被押往科威特城西边一个地区的某个拘留所, 在那里他们遭到严酷殴打。特别是Omar Abdalla头部遭到钉有铁钉的木棍打击。他们所受的伤使他们需要进入al-Farwaniyya医院治疗。
- (b) Bessam Mahmoud Selaiman, 19岁, 据报道于1991年3月15日在 al-Edailiyya的一个加油站排队时被捕。5名军人将他带入附近一个帐篷, 并对他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殴打, 用上面裹有硬塑料的木棍抽打他的头部、背部和双腿; 同时还迫使他吞下滚烫的调料, 并用香烟头烧他的背和左胳膊。据报道, 后来他被押往Kadhema俱乐部的军队设施, 在那里他再次遭到殴打并且遭到假枪毙。
- (c) Na'el Mustafa Hassan Shershir, 18岁, 于1991年3月2日至17日被关押在Khaitan警察所。在他被关押的头5天内, 据报道, 他曾遭到残酷的殴打, 曾经遭到3英尺厚的木棍抽打他的背部、胸部、腿部和头部。尽管他伤痕累累, 但在警察所并未受到任何治疗。
- (d) Jemal Na'im Abdel Rahim, 28岁, 于1991年3月17日在Hawalli他的家中被一群士兵逮捕, 几天后被释放。在关押期间, 据报道他遭到木棍和

塑料管的抽打并且被通电的电线电击。

- (e) 据报道, Beshir Ibrahim al-Khatib 于1991年3月10日至16日被关押在al-Jaberiyya警察所, 他在那里遭到金属管殴打和点燃的烟头、蜡烛以及热铁棒烙灼。
- (f) 据报道, Yasser Ashour Yasseen于1991年3月10日至14日被关押在al-Nugra警察所, 他在那里经常遭到金属管和塑料管以及步枪枪托的殴打。
- (g) Iyad Selim Sa'id, 18岁, 据报道于1991年3月中旬被关押在 al-Jaberiyya警察所, 在那里他遭到木棍和步枪枪托抽打他的背部、脸部和左耳; 他因此失去左耳的听力。
- (h) Olayyan Saleh Issa, 42岁, 据报道于1991年3月8日至14日被关押在 Sabah al-Salem警察所, 他经常遭到棍棒和包塑料的铁管殴打, 并且遭到枪毙的威胁。

144. 科威特政府于1991年11月19日作出了答复, 称1991年10月18日转呈的这些案件是在科威特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发生的, 而且由于这是一些个别的案件, 政府难于证实这些事实或获得可靠的资料。这些事件发生在在占领军撤离之后的困难时期, 当时科威特政府正在竭尽全力恢复秩序和保证居民的安全。这些事件无论如何都不能用来推测科威特侵犯人权的状况。

###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 信件

145. 1991年2月14日, 特别报告员致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 转呈了有关埃及国民Ibrahim Abdel Aziz Elweza的资料。他在利比亚被捕并于1989年4月17日至6月19日期间被拘留。在这段期间, 据称他遭到严厉的殴打以致严重受伤, 包括骨折。随后的医疗报告表明, 肘骨和头盖骨出现骨折。同时还有遍体鳞伤的报告。后来Abdel Aziz先生被允许离开利比亚。

## 马拉维

### 紧急呼吁

146. 1991年11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1991年5月被捕的 Kumwenda、Christopher Mwenelupembe 和 John Nyenga 向马拉维政府发送了一份紧急呼吁。Kumwenda 是一名狱警，他在被发现将流亡的马拉维自由运动领袖 Orton Chirwa 的信件偷偷带出 Zomba 中央监狱时遭到逮捕。和 Christopher Mwenelupembe 和 John Nyenga 显然是 Orton Chirwa 的支持者，据称曾收到这些信件，并将这些信件偷偷带到邻近的坦桑尼亚。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以上三人可能有一段时间被关押在利隆圭 Kanengo 监狱的地下囚室中，而且人们担心他们可能已经遭受酷刑。所收到的资料还表明，在这些信件被查获之后，Orton Chirwa 在他的囚室中连续两天带着手铐脚镣，并且被迫蹲在地上，手铐和脚镣反锁在膝盖后面的一条铁棍上；据报导，由于这种惩罚，他的身体状况极差。

## 马来西亚

### 紧急呼吁

147. 1991年11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 Aaron Cohen Shelton 向马来西亚政府发送一份紧急呼吁。Shelton 是一名新西兰公民，24岁。据报导，他于1991年9月1日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且根据马来西亚的《危险毒品法》，下令对他鞭打六次。还有报道说，1991年10月29日，吉隆坡的最高法院维持高级法院的判决，不免除对 Shelton 先生鞭打六次。人们担心，鞭打势在必行。

## 毛里塔尼亚

### 紧急呼吁

148. 1990年12月21日特别报告员向毛里塔尼亚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转呈了有关下述一些人的资料：Sy Abdoulaye Maliker、Ly Moussa、Diallo、Kane Hamedine、Kane Amadou Racine、Dia Aliou、Sarr Lbrahima、Ba Moctar、



Thierno Yacoub Ba、DiengDioulde、Oumar Djol 和 Gaye Saidou。据称上述这些只是属于 Hal-Pulaar 民族集团几百人中间的个别一些人，他们于1990年11月中旬被捕以来，不予起诉，一直关押在第六军区司令部，即 J'reida 兵营。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许多被关押者曾受到酷刑，并且据称，其中15人因酷刑致死，包括海军军官 Gaye Saidou 先生。还有指称说，前罗索--毛里塔尼亚省省长 Thierno Yacoub Ba 先生于1990年12月5日被捕时遭到警察的痛殴，未受到任何医疗照顾，并且被押往无人所知的目的地。

149. 1991年4月9日特别报告员向毛里塔尼亚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转呈有关下述一些个人的资料：Almani Chouaibou Diagana 中尉、Moussa Gueye 副官、Adama N'Diaye、Cheikhna Tandia 中尉和 Siguino Traore 中尉。据称，上述这些个人以及 Hal-Pulaar 民族社区的其他一些成员，平民以及军人，都不予审理，被关押在努瓦克肖特和努瓦迪布的兵营里，条件极为严峻，并且得不到医疗照顾。据说，努瓦克肖特附近的 J'reida 兵营监禁的条件尤为恶劣。据说，Moussa Gueye 副官在遭受酷刑之后肋骨折断，情况极为严重。关押在这些兵营中的其他一些囚徒，包括 Chouaibou Diagana 中尉，据称也遭到严酷的酷刑。根据资料来源，从1990年11月到1991年1月期间，在 J'reida 兵营中有30名被监禁者因遭受酷刑死亡。出于上述这些考虑，人们担心，上述这些人以及被关押在努瓦克肖特和努瓦迪布区军营里的其他一些人身心健全可能会有危险。

## 信件

150.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毛里塔尼亚政府，转呈了下述资料：在1990年年底被捕的约200名政治犯，死于酷刑、虐待和令人诅咒的监禁条件。据说，这些政治犯在军方监狱和警察所遭到酷刑。其中许多人受到“美洲虎”的刑罚，这种刑罚是将受刑者倒悬并抽打他的脚掌。还有指控称，其他一些人通身受到灼烫或电流电击他们的生殖器。据以前的一些被监禁者说，有些囚犯身上和脸上有伤疤。在该国家的北部，据说酷刑已经造成 Aleg 和 Akjoujt 监狱中60名士兵的死亡。据称，有些囚徒被活活烧死。

## 墨西哥

### 信件和政府答复

151. 墨西哥政府于1990年12月18日在答复特别报告员1990年6月6日关于 Zócimo Centeno Hernández、Wilebaldo Centeno、Gonzalo Ibarra 和 Quintil Quintero 指控实施酷刑和虐待的信件(E/CN.4/1991/17, 第110和111段)时,向特别报告员转呈了墨西哥国家人权委员会就涉及这些人的刑事案件提出的建议。关于 Zócimo Centeno Hernández 的案件,委员会指出,他未得到机会由律师为他进行辩护,而且他供认他被指控的那些罪行,可能是由于他遭受到身体和心理上的酷刑。但是,特别报告员未收到有关资料,表明主管当局遵照委员会的建议,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以期确定有罪的当事方。在上述其他三个案件中,委员会并未具体地就这些人据称遭受的酷刑和虐待提出建议。

152. 政府于1991年1月30日对特别报告员1990年12月15日的信件(E/CN.4/1991/17, 第113段)作出了答复,并说对被监禁者实施酷刑和虐待并不是墨西哥经常性的作法;相反,任何有关违反这一专题的现行法律的控诉,都是主管当局进行调查和刑事诉讼的理由。具体地就 Armando Prado Mena 的案件而言,政府报告说,奇瓦瓦州的三名司法警官因杀人和滥用权力罪受到正式起诉。关于 Ubaldo Santillán Aguilar 的案件,政府说,两名司法警官因严重的杀人和滥用权力而受到审判。最后,关于 Edgardo Canseco Ruiz、Octavio Rendón Pérez、Irma Veronica Guerra Guerrero 和 Manuel Huerta López 等案件,政府报告说,正在进行调查;在后面两个案件中,联邦司法警察的一些成员已被暂时停职。

153. 特别报告员于1991年4月17日致函墨西哥政府,转呈了所收到的以下资料:全国以及几乎所有的警察局(特别是联邦司法警察及其反毒品司)和武装部队都施行酷刑。据称采用的酷刑手段从殴打、死亡威胁和其他一些心理上的恐吓,直至不留任何痕迹的相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据称,酷刑是用于恐吓或惩罚政治上的反对派,也是获取招供和向囚徒或其家人榨取钱财的手段。特别提到以下案件:

(a) Rubén Oropeza Hurtado, 39岁,北下加利福尼亚州,蒂华纳 La mesa 国家监狱中的囚徒。1990年6月蒂华纳联邦司法警官们没有任何逮捕状将他拘留,并对他实施了酷刑。根据医生,酷刑致使他的横隔膜破裂,从而使他不得不于1990年7月14日接受紧急手术;

(b) 1990年12月联邦警官在奇瓦瓦的 Ciudad Juárez 逮捕了 Juan José

González Ordoñez, 并对他实施了酷刑, 以逼迫他在一份供述上签字, 承认他为了盗窃财产杀了三个人;

- (c) 1990年12月26日19岁的 Juvencio Dante Morales 在被市政警官拘留并遭到税务警察以走私罪起诉之后死亡。最初应其家人的要求进行的非正式尸体解剖表明, 尸体上有许多殴打的痕迹, 其中有5处被认为是致命的。但是, 国家检查厅有关部门编写的正式医学报告, 则并未提及这一事实。第一次解剖检查证实, Morales 先生曾遭到酷刑, 4名海关警官遭到逮捕。其中3人随后被释放, 而有1人因酷刑和诱使自杀被起诉。未收到审判是否结束或结果如何的资料;
- (d) 还收到有关联邦司法警察虐待米却肯州 Aguililla 镇许多居民的资料。特别是, 据报告1990年5月5日约100名村民被监禁,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镇理事会主席 Salomón Mendoza Barajas 为此事前往警察所抗议时, 他自己也遭到拘留, 而后, 他遭到各种苦酷刑, 并被指控杀人和持有武器和毒品。Carlos Valencia Morfín 和 Magdaleno Vera 也因同一事件遭到拘留, 随后受到各种酷刑, 诸如殴打、用塑料口袋闷至近乎窒息、近乎溺死、和用含有红辣椒的矿泉水喷进鼻子。
- (e) Angel Chávez Sánchez 及其儿子 Alberto Chávez Barroso 于1990年11月13日在切图马尔市遭到逮捕, 并且遭受了20天的各种酷刑, 以逼迫他们承认参与了一次绑架案件。随后法医专家查明了受伤的伤疤和伤痕;
- (f) Marcial Rojas Lázaro, 秘鲁国民, 于1989年11月15日被国家司法警官在下加利福尼亚州蒂华纳逮捕, 并遭受酷刑, 其中包括殴打、电击和用含有红辣椒的矿泉水喷进鼻子。
- (g) Julio César Márquez Valenzuela, 于1989年9月4日在塔巴斯科州的 Villahermosa 与 Jesús Manuel Martínez Ruiz 同时逮捕, 后者在逮捕之后不久就死亡。Márquez Valenzuela 先生随后获释, 他于10月13日再次被捕, 并被押往塔巴斯科州。据称, 他在塔巴斯科遭到酷刑并被指控盗窃和杀人。人们认为, 第二次逮捕是由于 Valenzuela 先生申诉, 他在第一次被拘留期间遭到酷刑并称酷刑造成了 Martínez Ruiz 先生的死亡。这一案件提交给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审理。政府向该委员会通报了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一些建议。根据全国人权委员会,

政府检查厅指控若干名司法警察成员滥用权力和杀人，其中两人已被逮捕，但是一审法庭并未维持对他们的指控。委员会建议，所有卷入的警官应当停职，并且开始新的审判，但是这些官员仍保有他们的职务。

154. 1991年8月6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上述案件的如下详细资料，包括墨西哥全国人权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 (a) Rubén Oropeza Hurtado 于1990年3月29日因危害健康罪被捕。随后红十字会医生的一份报告透露，他遭受到酷刑，因此造成他于1990年10月死亡。在这方面，墨西哥人权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建议书，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停止联邦司法警官 Rafael Becerrill Zendejas 和 Alfonso Treviño Peña 的职务；提出解除这些警官职务的程序；将停止和解职的证明书副本送交全国委员会；着手从事初步调查并对这些人员提出起诉；完成刑事诉讼程序，并将司法裁定的一份副本送交全国委员会。共和国检查官于1990年9月1日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提出就 Oropeza 先生受到酷刑的指控案件进行调查。同时，下达了暂时停止司法警官 Rafael Becerrill 和 Alfonso Treviño Peña 职务的指令，并将该案交给共和国检查厅内部管理局处理。
- (b) Juan José González Ordoñez, Angel Chávez Sánchez 和 Alberto Chávez Barroso。全国人权委员会正在对上述这些案件进行调查。
- (c) Juvencio Dante Morales。已经查明他曾经遭受酷刑。1991年1月4日挖出了这位年青人的尸体；但是，迄今为止全国委员会并没有有关对因被指控虐待和促使自杀负有责任而被捕的一名移民局官员提起诉讼的进一步详情。
- (d) Salomón Mendoza Barajas, Magdaleno Vera García 和 Carlos Valencia Morfín。这些人员均得到释放，并且撤消了他们的案件，因为已经查明，这些人的权利遭到了侵犯。
- (e) Marcial Rojas Lázaro。全国委员会对这一申诉进行了调查并且建议：应当对 Rojas Lázaro 先生遭到逮捕以及受到 Enrique Cortéz Bonilla, José Erasmo Iglesias Serafín, Mario Coronado Estrada, José Armando Orozco, Enrique Quiñones Ortega 和 José Carlos Cecaña Vázquez 等司法警官讯问的情况进行调查；一旦

查明这些司法警官负有责任，应当停他们的职，并提起刑事诉讼；而一旦裁决他们有罪，应当通报全国所有的警察机构，以免他们加入其中的任何一个机构；1991年3月13日该州的州长同意上述建议。

(f) Julio Cesar Márquez Valenzuela。全国委员会获悉，与这一案子有牵连的司法警官被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并受到起诉。Marquez Valenzuela 先生目前因普通罪受到关押，而他的人权在被关押的最近这一阶段未受到侵犯。但是，全国委员会将继续注意这一审理；

(g) Alejandro Delgado García。全国委员会建议，对应为 Delgado García 先生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一些人员进行初步调查，而且应当向全国委员会通报调查的进展情况以及主管当局所采取的行动。

155. 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18日的信件向墨西哥政府转呈了下述资料：酷刑受害者主要来自最贫困的人口阶层，并且既包括由于政治原因或者由于土地所有权争端被逮捕的人，也包括人权活动家、被怀疑进行毒品走私的人和普通罪犯。还有人指称，妇女和儿童也遭到酷刑。也有一些报告表明，负责调查一项具体罪行的警察经常性的作法是：逮捕被怀疑参与政治和刑事活动的个别人员，甚至在街上抓人然后施以酷刑迫使他们交待罪行，以便作为在法庭中的供述。偶然，酷刑也发生在一些非官方地点，诸如旅馆、停车场和人烟稀少的乡村地区。

156. 报告还表明，最常用的酷刑手段是所有各种类型的殴打，特别是殴打人体最为敏感的部位，诸如耳朵；用塑料袋闷至近乎窒息或将头部摁入肮脏的水中；电击；烟头烙烫；将人悬吊和心理酷刑。据报道，在大部分案件中，司法补救办法毫无收效，而且这些企图利用司法补救办法的受害者或亲属们往往遭到迫害和威胁。特别报告员转呈了下述一些具体案件：

(a) Pablo Torres Hernández, Enrique Itahua, Juan González Hernández 和 Hermenegildo Torres Cruz 于1991年8月5日被捕并且被关入墨西哥城的北部收容所，他们在那里遭到酷刑。此外，上述最后一个人在被捕时被枪打伤，并且不得不送入 Balbuena 医院；

(b) Aboud Sattar, 33岁，于1991年6月14日在圣路易斯波托西州被司法警察逮捕。在他被关入圣路易斯波托西州中央监狱之前，他曾遭到严刑酷打；特别是在他的直肠内插入了一根条棍，造成严重受伤；

(c) Anastasio Salinas, 40岁，于1991年7月31日在塔毛利帕斯州 Reynosa 城他家中被一伙人逮捕，这伙人用钝器殴打他的腹部。他被押往联邦司法警察所，在那里单独监禁了两天，并且在死亡威胁之下，被迫签

署了一份交待书，声称他曾拥有毒品。

### 摩洛哥

#### 紧急呼吁

157. 1991年1月17日特别报告员向摩洛哥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转呈了有关自1973年以来被关押在 Tazmamart 监狱的 Mohamed Raiss 的情况资料。根据所收到的资料，Raiss 先生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除非进行紧急手术，他很有可能会全身瘫痪。同一消息来源对 Tazmamart 监狱的条件也深表关注。在1973年8月事件之后，被转押入 Tazmamart 监狱的约60名左右的囚徒中，据称有30名由于虐待和营养不良死亡。

#### 信件和政府答复

158. 1991年6月17日摩洛哥政府对特别报告员1990年11月17日的信件(E/CN.4/1991/17号文件，见第115段)作出了答复。特别报告员的信件涉及到若干囚徒据称于1989年遭到酷刑后死亡的案件。政府转呈了下述资料：

- (a) Abdeljalil Yakouti 由于在公开场合公然酗酒而被捕，在瓦尔扎扎特警察总部用自己的衬衫上吊自尽，这已经由法医鉴定证实。瓦尔扎扎特的地方预审官已经发动了初步调查；
- (b) Abderrahim Ben Khalifa。这个人 是 Benkhalifa Abderrahim Ben Hdia, 32岁的摩洛哥人，生于 Skhour Rhamna 的 Donar Jbara。1989年8月25日，Laaroussi M' Bark (Mokadem) 和 Astif Hammad (Cheikh) 与 Benkhalifa Abderrahim Ben Hdia 因债务问题引起争吵，他们俩殴打了他。他被送入 Marrakesh 医院，在那里他因伤重死亡。尸体解剖表明，死亡是由于他遭到的打击引起脑溢血造成的。这两名政府机构的代表受到起诉，分别被 Marrakesh 的法院判处15年和5年监禁；
- (c) Larbi Charrt 由于扰乱和平在 Dar Bel Amri 被王家宪兵逮捕。根据法医，Sidi Slimane 乡村医院的主治大夫进行的尸体解剖，死亡是吊缢窒息造成的。由拉巴特卫生部 Boukili Hassan 医生进行的第

二次验尸也得出了死亡是由于吊缢造成的结论。在 Kenitra 地方预审官的主持下，已经开始了初步调查。

159. 政府还向特别报告员呈送了有关摩洛哥监狱目前情况的照会，阐明了监狱行政管理部门为改善拘押条件作出的努力。照会内容如下：

“作为它们根据法律承担的职责的一部分，司法部和内政部定期向其各部门颁发各种指示，目的在于保证尊重和执行法律。滥用权力和故意违犯法律的行为（在审讯期间非法的暴力行为或虐待人的行为），可使违法者遭到纪律制裁以及受到主管法院按照《刑法》第231条提出的刑事诉讼。该条刑法规定了对故意的暴力行为，特别是治安部队成员的暴力行为的惩罚。对政府机构的代表以及国家保安局和王家宪兵官员和成员们滥用权力或渎职进行的惩罚，表明当局根本没有默许侵犯个人权力的情况。司法当局毫不犹豫地采取严厉的行动，惩罚应当为违反法律的作法负责的人。”

160. 1991年8月23日政府在答复特别报告员1988年4月28日的信件（见E/CN.4/1989/15号文件，第64段）时向他通报囚犯 Mechrouhi Dahbi 和 Hamdani Najib 已经获释。

161.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摩洛哥政府转呈了下述资料：仍然有一些酷刑和虐待案件发生。据称，所采用的酷刑手法名目繁多，特别是“falaqa”酷刑，即抽打脚掌；“飞机”酷刑，即将受害者双手和双脚捆在背后悬吊在一根铁棍上，和“鸚鵡”酷刑，即将受害者双手和双脚捆住悬吊在一根铁棍上，但头朝下。其中特别提到了 Abdellatif Morjane 的案件。据称，他于1991年4月18日被监禁在 Ghibla 监狱，在被称为“71人伊斯兰团体”的一群被拘留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之后，遭到狱警的殴打，因为，据说 Morjane 先生属于这一团体。根据消息来源，据称应当为此负责的一名狱警--他的名字已经转呈政府--与其他的一些狱警应当对 Morjane 先生所遭受的酷刑负责。据报道，Morjane 先生头骨创伤，右手臂肿胀，右半身全部血肿。然后，他被关入单独监禁囚室并且9个小时不予任何医疗照顾。据说，由于其亲属以及其他一些囚徒施加压力和通过检察总长的干预，Morjane 先生被转移出单独监禁的囚室。

## 緬甸

### 緊急呼喚及政府答復

162. 1990年12月21日,緬甸政府致函特別報告員,對1990年9月25日及1990年10月10日的兩次緊急呼喚(E/CN.4/1991/17,第121和122段)作出答復,緊急呼喚涉及反對黨民族民主聯盟和新社會民主黨的13名領導人。緬政府提供了關於拘留他們所根據的法律條款及對他們提出的指控的細節。其中有些人已經審問並被判刑。其他人正等待受審。信中未提及酷刑指控,也未就他們目前狀況或健康情況提供任何消息。

163. 1991年3月13日,緬甸政府向特別報告員提供了有關對U Maung Maung指控的細節;特別報告員曾就U Maung Maung案於1990年10月19日發出緊急呼喚(見E/CN.4/1991/17,第123段)。緬政府斷言他在拘留期間沒有遭到酷刑或虐待。

### 信件及政府答復

164. 1991年1月28日,緬甸政府致函特別報告員,答復其關於酷刑行為指控和轉達Zaw Min、Myo Myint和U Soe Myint等案件的1990年8月10日信件(見E/CN.4/1991/17,第125段)。緬甸政府向特別報告員提供了有關上述三人的罪名、審問及判刑情況的細節,並肯定地說他們在獄中服刑期間,沒有遭到任何形式的酷刑或虐待。緬甸政府的信還特別提請注意幾項有關緬甸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特別是《警察法》第43(f)條,規定凡對被拘留者施加酷刑者一律處以監禁並罰款;《證據法》第24條規定若被告之供詞被法庭認為是在誘供、威脅或作出與被告罪名有關的承諾的情況下作出的,刑事訴訟中對這類供詞不予接受。緬甸政府說那些聲稱反政府的政治活躍份子在拘留期間受到酷刑和虐待的報告是“毫無根據”的。所有囚犯都享有諸如親屬定期探視、看病治療等權利。

## 尼日爾

### 信件

165. 1991年4月17日,特別報告員致函尼日爾政府,轉告有關一些個人的情況,



其中包括Abdoulhatif Mohamed, Tidekelt公司人事部门负责人; Mohamed Ahmoudon, 塔瓦省阿克巴中学的教师及Taheer Abdoulmoumire, 塔瓦中学的学生。这三个人据称于1990年5月8日被捕, 并在塔瓦的兵营遭到酷刑。他们是被关在塔瓦兵营的380名图阿雷格族人中的几名。过去也曾有过关于该兵营发生酷刑案件的报告。后来, 据说上述三人及其他被拘留者一道被转移到尼亚美的摩托旅。

## 尼日利亚

### 紧急呼吁及政府答复

166. 1991年6月28日, 特别报告员就1991年6月7日及7日前后数十名学生及若干律师和记者被拘留事向尼日利亚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信中列举了下列名字和有关细节: Mallam Mahmud Abdul Amin, 贝宁大学学生会主席; Edokplor Ighodalo、Rafael Rafindadi及Christian Omasoke, 贝宁大学的学生; Aiyegbus Rufus和Oyedele Oyekola(伊洛林大学); Koyode Ogundamisi(乔斯大学); Bamidele Aturu和Kola Odetola(奥贝凡未·阿沃洛沃大学); Bamidele Opeyemi和Bola Aidi Tajudeen(拉各斯法学院); Bunmi Olusona和Biodun Ogunyemi(伊巴丹大学); Biodun Ajihoye和Olaitan Oyerinde(拉各斯大学); Yinka Orokoto, 拉各斯的一位律师; Biodun Aremu, 国家人口委员会的雇员; 1991年5月29日《卫报》关闭后被捕的该报的六名雇员: Bayo Oguntimehin(编辑); Taiwo Akerele、Tunde Sulaimon和Ben Akparanta(均为记者); Bolaji Ogunye和Dam Enume(助手)。据报道, 上述人员及在普遍的学生游行中被拘留的其他人被单独监禁在国家安全局的若干个拘留中心, 对他们既没有宣布罪名, 也不进行审讯, 而且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接触。据说, 这类拘留中心的条件恶劣, 被拘留者得不到足够的食品和医疗。另据指控, 有几个学生受到酷刑折磨, 以迫使他们在供状上签字。这些供状暗示记者、律师及人权活跃份子与最近发生的骚乱有牵连。

167. 1991年12月11日, 尼日利亚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被捕的学生和记者经法庭审讯后已被释放。在被警察短期拘禁期间, 没有对他们中任何人以强迫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的方式让他们向警方招供, 没有任何人遭到酷刑, 或被剥夺与其律师接触的权利。这些人已全部被释放, 他们的案子已了结。

## 挪 威

### 信件及政府答复

168.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挪威政府告知有关Hassan Salem案的情况。Hassan Salem,34岁,是在奥斯陆大学上学的巴勒斯坦学生。他在1991年1月26日参加反对海湾战争的公开游行后,遭到四、五名警察的毒打。据消息来源称,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把他推倒在地上,把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其中一个警察狠狠踢了他的腿。紧接着,Hassan Salem被扔到了警车上,三、四个警察在他身上踩。消息来源还说,到了Gronlandsipiret的奥斯陆警察局后,他被扔在地上,双手仍被铐着。然后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对他进行毒打,踢他的胸口,把他在地板上拖来拖去。据说,他被放出来后,因为胫骨骨折,不得不动手术。

169. 1991年12月13日,挪威政府就上述Hassan Salem于1月26日在奥斯陆中心被拘捕事件作出答复。拘捕他的警察抓他时是抓的他的双臂。Salem试图逃跑时,才把他按在地上的。后来确认他的右腿骨折。Salem先生后来向警方告发了那个警察。一个负责处理警方或检察当局触犯刑法行为的独立的委员会对此控告进行了调查。该委员会的结论是该警察对 Salem先生使用不必要的暴力触犯了《刑法典》第237条。该委员会的结论还认为参与拘捕的其他警察无罪,并建议对那个警察处以5,000挪威克朗的罚款。检察当局同意这一建议。由于该警察拒付罚款,此案被提交给奥斯陆市法院。在1991年10月9日的判决书中,市法院宣告该警察无罪。法院判决书称:

“尚无确凿证据证明 Salem 先生的腿骨骨折系被拒收的传票所述之人的‘暴力行为’所致。本法庭认为Salem先生腿伤发生在所指之人将其按倒在地之后,故宣判此人无罪。”

## 巴基斯坦

### 紧急呼吁

170. 1991年3月12日,特别报告员就人民学生联合会活跃份子Rahila Tiwana和Shehla Raza事向巴基斯坦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这两个人因涉嫌非法携带武器被关押在卡拉奇的警察局。Rahila Tiwana于1990年12月24日被捕,并被带到审讯所,

据说她在那里受到毒打和虐待。Shehla Raza于1990年12月27日被捕。据说她在被关押期间遭到酷刑折磨和恐吓。1990年12月31日,信德省高级法院下令将她释放,但是警方于1991年1月5日将她再次逮捕。

## 信件

171.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巴基斯坦政府,转告有关情况,即最近数人遭到酷刑折磨,以迫使他们作出不利于已下台的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人的供词,包括前总理和她的丈夫。对Zahid Saeed、Atif Manzoor(别名s/oManzoor Hussain)和Najam - Ul- Hasan等三人的口供书,特别引起特别报告员的关注。据称,Zahid Saeed于1990年12月23日深夜24日凌晨在卡拉奇被瑟达警察局逮捕,随后被刑事调查局的人带走。几天后,他的妻子见到他时,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双手、双腿伤痕累累,缠着绷带。据称,Saeed对妻子说,他遭到酷刑折磨,被迫在各种不利于他本人及巴基斯坦人民党和人民学生联合会领导人的供状上签名。Atif Manzoor, 别名s/o Manzoor Husain于1990年4月11日在卡拉奇被刑事调查局的警察逮捕,后来被转移到卡拉奇的中央监狱。1990年10月2日,他又被带回刑事调查局的警察所。据说,他在那里遭到毒打和酷刑折磨。其他被拘留的人据说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如Ali, 别名s/o Attar Khan, Naim-Ul Hasan, 别名Babar Jamalis/o Ghulam(于1990年6月11日被捕), Noor Nabi Abbasi等。据消息来源称,被指控的酷刑的目的是为了套取不利于Arif Ali Zardari先生(贝纳齐尔·布托女士的丈夫)及其他反对党领导人的供词。

172.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巴基斯坦政府,转告以下情况:据称对涉嫌犯有刑事或政治罪的被拘留者施加酷刑的现象普遍存在。据报告,被拘留者常常被单独监禁好几天,并且在被单独监禁期间受到恐吓和虐待。酷刑手段包括:把犯人的脚腕捆住悬吊起来;抽打犯人的脚心、脚腕、膝盖和头部;用粗木棒在犯人的腿上滚压;对犯人进行电刑;用香烟头烙烫犯人的身体;揪掉犯人的头发;以处决威胁犯人;以伤害亲属吓唬犯人;不给犯人食品,不让犯人睡觉;强奸犯人。

173. 信中特别提及Atif Iqbal Bokhari, (18岁)一案。他于1989年5月12日在旁遮普省的卡苏尔被当地警方逮捕。在拘留期间,他被头朝下吊起来,被人用木棒抽打双腿;还被按在地上,用滚筒重重地在赤裸的臀部和大腿上来回碾。经过反复几次这样的折磨,他被折磨得失去知觉,两天昏迷不醒。

174. 在同一信件中,特别报告员还转告了下列情况。据指控,被警方拘留的妇

女常常遭到某些特定的酷刑折磨，特别是强奸。据称，1990年8月，Bushra Bibi和Anwai在旁遮普省的谢赫布尔监狱被狱吏强奸。医生检查结果证明该指控属实。

175. 此信件转告的情况还包括下列酷刑致死案：

- (a) Abdo1 Khaliq Mehar, 于1990年11月5日在信德省卡拉奇的Bachal村被纽敦警察局逮捕。他被拘留数小时，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折磨。由于多处内伤和外伤，他于1990年11月30日死于卡拉奇平民医院；
- (b) Haroon Siddique, 25岁，于1990年8月5日在旁遮普省的拉合尔被捕，送到讷万果德警察局，据称，他在那里受到酷刑折磨。8月15日，他被几个警察送回家，显然处于昏迷不醒状态。三天后，他在医院死去；
- (c) Bhag Masih, 58岁，于1990年3月10日在拉合尔的古尔贝格被捕，带到警察局。当他的亲属赶到时，他已经躺在警察局门外的草地上，毫无知觉。几个小时之后，他便死在公用事业医院。

## 秘 鲁

### 信件及政府答复

176.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转告秘鲁政府，转告有关下列据称发生在1990年的酷刑案例情况：

- (a) Fidel Intusca Fernández, 阿亚库乔的圣胡安—德鲁卡纳斯的Utec矿的司机，于1990年8月6日被蒙着面罩的武装士兵逮捕，带到普基奥的军事基地，据称在那里遭到严重的酷刑折磨。几天后，他设法逃了出来，告诉新闻界他在拘留期间被悬吊起来，被按在水里憋得他几乎失去知觉；后背和脖子被烫；他被人拳打脚踢还被以处死相威胁；
- (b) Ramón Lozano Panduro, 33岁，农民，1990年8月28日被圣马丁部的治安部队人员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他被带到Madre Mía军营，八天之后被放出来。据指控，在被拘留期间，他遭到酷刑折磨，其中包括松开捆绑关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对他拳打脚踢，在他身上踩踏。还曾企图把他吊起来。由于遭到这般折磨，Lozano先生至今浑身疼痛，肾部和头部时常作痛；
- (c) Rosaria María Carrasco López, 21岁，于1990年8月2日去钦博特的技术警察局取一份证明时被捕。她被捕的原因是从阿普里马克省阿班凯

发来一张逮捕令，以恐怖主义罪名逮捕一个叫María Carrasco López的人。她被汽车拉到2,137公里之外的阿班凯，历时52天。据指控，一路上，没有给她足够的食品和衣服。据称，在库斯科的技术警察总部--好几个地方都有同名同姓并有犯罪前科的人，库斯科便是其中之一--警察对她拳打脚踢，把她推倒在地上，逼她招供。从那以后，Carasco López小姐头盖骨深处和背部间歇性作痛，目前她正在进行体检；

- (d) Bernabé Baldeón García、 Jesús Badeón Zapata和Santos Baldeón Palacios。据指控 1990年9月25日，在阿亚库乔 Vilcashuamán 省的 Puccapaccora, Accomarca军营的士兵强迫村民交出他们的财产，然后命令上述三人跟他们走。这三个人被带到独立区的 Pacchahuallhua 市，在那里他们遭到酷刑折磨。 Baldeón García 先生和另外七人据称遭酷刑后死去。据说下列人员也遭到酷刑折磨，然后被释放：Pacchahuallhua 市的市长 Fernando Baldeón; Feliciano Urquizo, Francisco Carhuaz, Juan Urquizo Flores, Marciano Urquizo, Apolinario Gómez, Apolinario Díaz和Benigno Urquizo;
- (e) César Sakamoto Sánchez, 1990年11月1日在圣马丁塔拉波托的 Tarapoto 机场被武装部队人士逮捕，带到 Mariscal Caceres de Morales军营。据称,Sakamoto Sánchez先生受到严重的酷刑折磨，包括抽打脊椎骨。

177. 1991年11月4日，秘鲁政府就其中某些案件提供了如下情况：

- (a) Intusca Fernandez, Fidel。有人将他的绑架归罪于陆军人员，而实际上是圣胡安--德鲁卡纳斯矿的人干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曾参与59件爆破器材盗窃案的行为，作此案的是从事颠覆活动的犯罪份子。
- (b) Lozano Panduro, Ramón。目前尚未得到有关该公民被捕的任何背景情况。从国防部查寻系统上只查到一个叫Segundo Abraham Lozano Panduro的人，而他的具体情况与Ramón Lozano Panduro不相符。
- (c) Carrasco Lopez, Rosaria María。根据Paurimac监管教养法院的要求，由圣--钦博特的省警察厅总部的人于1990年8月2日以恐怖主义罪名将其逮捕。对此案的行政纪律调查结果确认此案纪律责任承担者为警察局长Angel Villa Sánchez和其他几个人，他们玩忽职守，未能认真履行职责；
- (d) Sakamoto Sanchez, César, 1990年11月14日，他由反恐怖主义司处置。

调查结果表明他是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MRTA)组织的成员,是圣马丁部的MRTA东北纵队的成员。自1990年12月5日起Sakanoto Sanchez的名字出现在Misuel Castro Castro监狱囚犯名单上,罪名是恐怖主义。

178.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秘鲁政府,转告有关下列酷刑指控的情况:

- (a) Juan Apolinario González, 工会领导人,于1991年3月10日在利马的帕拉蒙加被治安警察逮捕。他被带往治安警察总部,据指控,他在那里遭到毒打和酷刑折磨,包括把头按在水里、电刑等。3月11日,他被带到技术警察总部,在那里进行了官方体检,随后被释放。3月14日,他向巴兰卡的省检察院和人权及保卫人民检察院提出酷刑指控;
- (b) Juan Arnaldo Salomé Aduato, 22岁,手艺人,住在万卡约的萨帕扬加于1991年4月24日被四个农民打扮的全付武装的人逮捕。他被带到“12月9日”军营,双手、双脚被绑起来,全身捆作一团;他被按入水中,逼他供认是“Sendero Luminoso”组织的成员。6月11日,也就是Salomé Aduato先生设法逃出军营后的一天,据称四个农民打扮的武装人员搜了他的家,殴打他的两个弟弟,11岁的V́ctor Luis和17岁的Rodolfo Alberto。

179. 1991年12月9日,秘鲁政府就Juan Apolinario González一案报告说,尚不能证明他遭到帕拉蒙加治安警察的酷刑折磨。

### 菲律宾

#### 紧急呼吁及政府答复

180. 1990年12月28日,菲律宾政府致函特别报告员,答复特别报告员1989年9月12日信中(E/CN.4/17,第127段)。在该信中,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列有25名拘留者的名单,这些人被怀疑是新人民军成员。据指控这些人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折磨。随信附来的还有一份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关于此案的报告,提供了调查此案的具体情况。该报告确认仍在拘留中的25名被拘留者中的21名声称受到酷刑,并作了如下补充:

“人权委员会立即派快速反应小组(QRT)对被拘留者进行探视,但是由

于没有该委员会主席的书面授权，该小组未被获准探视这些被拘留者。因此，1989年7月31日，根据一项特别任务令，该委员会的法律援助和咨询处派官员去 Bagong Diwa 拘留营对这25人进行体检。同去的还有 Annabel Sumayao医生带领的医疗行动组的人员。这些官员建议应立即将这些被拘留者的案件委托给他们的律师，以保护他们的权利。……该委员会的快速反应小组前往 Bagong Diwa拘留营取供状，并由该委员会首席法医进行体检。快速反应小组被告知被拘留者已经将他们的供词交给了被拘留者特别工作组。另外，该委员会的Reynante Bases医生报告说，在他检查的16名被拘留者中，医疗行动小组调查所说的内伤、扭伤和肌肉痛等临床表现均已消失；只有另外三人仍有明显的内伤症状。1989年8月25日，法律援助和咨询处为被拘留者在供状上签字事来到 Bicutan，他们被一位叫 Jorge Gaduang 的律师告知说需先与处理此案的其他律师协商之后才能让这些被拘留者在供状上签字。被拘留者迄今仍拒绝签字。此间，已有四人被释放，他们是：Virgilio Tesoro, Luther Candido, Edgardo Duce, Arnel Castillo。由于被拘留者不予合作，妨碍了对本案的调查。就调查角度来说，本案可被视为已经结案，现在本案已提交给委员会作决定。”

181. 1991年3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菲律宾政府发出紧急呼吁，涉及Mannel Capitulo, 25岁, Almar Lusong, 28岁, Antonio Hondor, 26岁。这三个人于1991年2月8日在安赫莱斯市的邦板市场被军方人员逮捕。据信他们被单独监禁在安赫莱斯市圣克里斯托的Belen Homesite的第702步兵营军营。据说，起初当地军方不承认拘禁了这三个人；后来，1991年2月13日，承认有此事，但是他们的亲属被告知还不能与他们见面，因为他们正在受审讯。人们表示担忧他们可能遭到酷刑审讯。

### 信件及政府答复

182. 1990年12月8日，菲律宾政府致函特别报告员，答复特别报告员1990年6月6日信件（见E/CN.4/1991/17，第134-138段）。随信附来的有两份菲律宾人权委员会的案例报告，提供了有关11名被拘留者（上述报告第135段提及）中的10名的情况。据指控这11名被拘留者在1989年3月至5月期间遭到酷刑折磨。

(a) 关于 Honorio Ayroso、Stanley Marvin Pengson、Marcelito Clemente和 Eduardo Bagtas, 案例报告说：

“据报告，Ayroso等人在1989年3月至5月期间遭到毒打和其他形式的

酷刑折磨。根据这份报告,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通过其特别调查员立即前往黎刹省监狱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人,除了Eduardo Bagtas,已不再被拘留了。”

Eduardo Bagtas,曾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目前“马卡带的检察官正审理他的另一个案子,该案正在初步侦查中。他在这两个案子中均得到免费法律协助小组的一位名叫Marinas的律师的帮助。当事人否认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或虐待。对审理Ayroso、Marvin和Clemente等刑事案的马尼拉市帕西格地区初审法庭第152分庭进行了调查,记录表明他们均因没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确实有罪而被宣告无罪。鉴于调查结果表明应有的法律程序均得到妥善的遵守,建议该案了结。”

- (b) 关于Wilfredopoli、Stereon Pasion、Claudio Suangco、Greronaga Malibi、Edgardo Mamuntug 和 Pedro Calilang等人的案件,报告中说,根据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这些人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折磨。前四人的案子已彻底或暂时撤消,四人均被释放。对有关他们的酷刑指控,还需进一步调查,菲律宾人权委员会调查员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后 will 立即提出最新报告。

183.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菲律宾政府,转告菲政府根据有关消息,近几个月来,无数菲公民在被菲律宾治安部队拘留期间遭到酷刑。据说,受害者一般都说是新人民军(NPA)的同情者,据说要对被指控施加酷刑负责的大部分是军方人员。报告列举了下列具体案例:

- (a) Vigilio Jacob,工会组织者,于1990年11月10日被纳沃塔斯警方被捕,据指控在拘留期间受到酷刑折磨。一个医疗行动小组被派往纳沃塔斯市监狱,对 Jacob 进行检查。据指控,该医疗小组的成员 Ireneo Baguden 医生,30岁; Eliseo Constantino先生,心理医生,23岁; Gina Viuanueva小姐,护士,23岁,在监狱期间被蒙住双眼、带上手铐,看守人员对他们态度十分恶劣;
- (b) Vincente Ladlad,据称是新人民军教育部的负责人,于1990年8月14日被捕,据指控在审讯期间,受到严重的酷刑折磨。

184. 据报告,在伊莎贝拉区发生多起酷刑案,据说是以一个中尉为首的一伙儿士兵干的,已将这个中尉的姓名转告了菲政府。报告列举了下列人员的案例: Culas Collada,1990年6月11日被拘留; Ben Duarte,1990年6月13日被拘留; Junior Manili,1990年6月15日被拘留; Juanito Oliva、Bonifacio Pascua 和 Bernaldo



Bitamog, 于1990年6月16日被拘留。

185. 据报告,下面一例所指控的酷刑导致死亡。Jaime Melad, (伊莎贝拉区) Brgy Namnama 的农民,60岁,于1990年10月17日和他的两个儿子Edgar 及 Dominado 一起被捕。据报告,这三个人在1990年10月21日被带往菲陆军第41步兵营前,受到了酷刑折磨。那天,Jaime 被带到圣维森特的Brgy,在那里,他遭到毒打,据说,后来被军官杀害。尽管死因无法确定,但据说,他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特别是在胸部、臀部、后背和头部。

### 葡萄牙

#### 信 件

186.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致函葡萄牙政府,转告如下指控:阿尔科恩特里的Vale de Judeus 监狱关押条件为恶劣且有使用酷刑现象。据消息来源称,1990年有15人死在狱中,他们是在何种情况下死亡的尚不清楚。转告给葡萄牙政府的有下列案件:

- (a) Manuel Tavares Mendonca, 来自佛得角的囚犯,据指控,在1991年4月受到各种酷刑折磨,包括殴打、用烟头烫,捆住双手和双脚并在生殖器上拴上石头吊起来;
- (b) 据指控,5名德国囚犯, Manfred Reffel、Günther Radtke、Udo Mayer、Erich Klein 和 Werner Egner, 在拘留中均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下,其中一人,Günther Radtke, 1990年3月遭到殴打后,后遗症至今没有消失。

187. 提请葡政府注意的还有其他两例虐待案:

- (a) Isidro Albuquerque Rodrigues, 距里斯本很近的阿马多拉镇的一名金属加工工人, 于1990年6月26日被法警第四大队的人逮捕,带到塞图巴尔的驻地。一路上,据指控,法警殴打Rodrigues,到了驻地后,第四大队一伙儿法警,约有10至12人,把他从晚上六点审问到清晨三点。审问中,对他拳打脚踢,并用一根金属的淋浴管打他。他的耳朵和下巴被打,好几颗牙脱落。根据消息来源,1990年10月,Rodrigues先生向塞图巴尔区检察官提出正式起诉,要求查明打他的法警第四大队的那些人,并对他们进行刑事起诉;

- (b) Marcelino Baessa, 来自佛得角, 于1990年8月10日被全国共和国卫队的一伙儿人带到阿尔马达堡的驻地进行审问。一到驻地, 一伙儿官兵便对他拳打脚踢。还用高压水龙头冲他。转天, 在阿尔马达的法院出庭后被释放。8月12日, 他在阿尔马达地区接受医疗, 处理外伤和青肿部位。据消息来源称, Baessa 先生于1990年8月22日向阿尔马达地方检察官正式提出起诉, 要求对此事件的情况进行调查, 指控全国共和国卫队官兵对此事负有责任。据消息来源, Rodrigues 先生及Baessa先生起诉结果如何, 尚不清楚。

### 大韩民国

#### 信件及政府答复

188. 1991年8月6日, 特别报告员致函大韩民国政府, 转告如下指控: 不管是因为从事反国家活动还是涉嫌犯有刑事罪而被拘留的囚犯, 在过去几个月中都遭到酷刑折磨和虐待。据指控, 虐待主要包括殴打和长时间不让睡觉。报告的大部分案子都涉及社会主义工人联盟成员, 他们于1990年9月、10月被捕。其余涉及全国统一独立小组的成员, 他们于1990年12月被捕。报告载有下列个案:

- (a) Lee Song-Su, 27岁, 曾是Sung Kyun-Kwan 大学的学生, 因被怀疑是社工盟的成员而被捕。1990年10月23日, 据报告, 他告诉律师说, 他因拒绝回答问题而遭到审讯人员的殴打;
- (b) Hyu Jung-Dok, 27岁, 社工盟成员嫌疑份子, 于1990年11月1日告诉律师说, 连续三个晚上不许他合眼, 被捕不久就被剥光衣服打了一顿;
- (c) Park Ki-Pyong, 被指控是社工盟负责人, 于1991年3月被捕, 也称他遭到殴打, 在审讯期间连续几夜不让睡觉。
- (d) 自称遭到虐待的社工盟其他成员有: Chang O-Yong、Chon In-Hyun、Kim Ok-Hyun 和Chong Mi-Hwa。

189. 1990年12月宣布大约有30名全国统一独立小组成员被捕。据好几个被拘留者的家人说, 他们的儿子被脱光衣服用木棒打, 被逼跪在地上, 被人用脚踢、踩。声称遭到殴打、踢踹、连续几天不许睡觉的该小组成员有: Kim Yo-Sop, 翰林大学的研究生; Choi Won - Guk, 原来是学生; Kim Gi-Su, Kyung-hee大学学生; Kim Dong-Kyu, 24岁, 学生, Hun Jung - Sook, 24岁, Kyung-hee大学女研究生。

190. 1990年10月,在一场大规模的“打击犯罪战争”中,数千名刑事罪嫌疑犯被捕。1990年10月21日,一家地方报纸报道说,据指控,至少有8名刑事罪嫌疑犯,包括Kong Pying-Chin, 20岁,遭到警方审讯人员的殴打。

191. 大韩民国政府在1991年11月14日信件中就上述案子提供了如下情况:

- (a) Lee Song-Su先生。在1990年10月16日与他的律师和母亲会面时,他说他没有受到酷刑。尽管Lee先生后来又声称在调查期间受到酷刑,但是他的关于受到酷刑的申诉在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均被驳回;
- (b) Hyun Jung-Dok先生。Hyun先生被捕后行使了保持沉默权,十天没有开口。后来,面对各种证据,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1990年10月6日,在拘留所他对他的母亲说他从来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
- (c) Park Ki-Pyong先生。不仅在审讯过程中而且在调查时,他都自动承认了他的那些构成违犯国家安全法的行为。另外,法院驳回了关于宣称他受到虐待的申诉。
- (d) Chang O-Yong、Chon In-Hyun、Kim Ok-Hyun、Cong Mi-Hwa。与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及的指控相反,他们所有的人在法庭上都声明在审问过程中没有受到酷刑。特别是,Chang女士,她被判刑一年,但被缓刑释放;
- (e) Kim Yo-Sop、Choi Won-Guk、Kim Ki-Su、Kim Dong-Kyu、Hun Jung-Sook。据说他们在法庭上声称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但是法庭驳回了他们的指控。他们的案子正待最高法院审理,除了Hun女士,她被判刑一年,但被缓刑释放;
- (f) Kong Pyong-Chin。1990年10月18日,Kong先生被警方以敲诈罪逮捕。在警察局受审期间,面对三个警察的所有证词,Kong先生仍拒不承认对他的指控,不交待同伙儿的下落。为了逼供,审讯人员强迫Kong先生跪在地上。尽管上述虐待行为并不严重,警官纪律委员会仍对他们以及他们的两名上级警官给予警告处分。1991年2月,Kong先生被判刑10个月,缓期两年执行。

## 罗马尼亚

### 信件及政府答复

192.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致函罗马尼亚政府,该函涉及Ioan Gug先生,奥拉迪亚居民,他于1990年12月19日参加和平示威游行后,在奥拉迪亚的Piata Republicii电车站被捕。据得到的消息称,他刚一被捕,腹部即被打;到了警察局后,被扔在地上被几个警察打了好几顿,直到他失去知觉。他苏醒过来后,被转移到另一个警察局,又遭到几个警察的殴打。据报告,他被迫招供后获释。根据消息来源,两天后,由Judetul Bihor Localitatea Oradea Unitatea医院提供的诊断证明书说他遭到殴打,需进行两至三天的医疗。

193. 在1991年12月4日收到的信中,罗马尼亚政府答复说Ioan Gug先生从未被捕过。罗政府说,1990年12月19日,比霍尔民主同盟经批准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游行,游行于晚上7点结束。后来,有几个参加游行的人来到市中心的市长办公楼前,造成交通堵塞,引起许多市民的公愤。警方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游行离开那里,并要求一些带头儿的人,包括Ioan Gug先生去警察局总部查明身份。Ioan Gug先生被处以罚款500列伊——这是一种民事惩罚。Ioan Gug先生接着将他的案子交到奥拉迪亚军事检察官,并提交了一份诊断证明书,证明书写道他遭到殴打,须进行两、三天的医疗。听了Gug先生的陈述后,军事检察官发现他不能提供任何情况或证据以查明是哪些人打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军事检察官为进行调查作了努力,但是由于Gug先生已出国尚未返回,此案于是结案。

## 卢旺达

### 紧急呼吁

194. 1991年3月5日特别报告员向卢旺达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转交了有关下列人士的材料: Emmanuel Havugimana, Justin Kanamugire, Laurent Karugarama 和 Ezekiel Ngoboka,他们都是据报告关押在Gisenyi监狱的Tutsi族人,当局怀疑他们与Tutsi族叛乱团体“卢旺达爱国阵线”有联系。Emanuel Havugimana是卢旺克里学院的教师,他和Justin Kanamugire据称于1991年1月30日在卢旺克里诊所被士兵抓捕。Laurant Karugarama 和 Ezekiel Ngoboka是中非

再生大学的学生, 据称1991年2月3日在校园里被捕。他们都受到卢旺达治安力量成员的殴打和虐待。据报告Ezekiel Ngoboka 脸部被刀砍伤, 腿部也受伤。Laurent Karugarama据称被打得遍体鳞伤。四个人自从被捕后, 不准会见亲属, 也得不到治疗, 监狱条件极端恶劣。鉴于这些情况, 特别报告员对于这些人的健康和人身完整表示了担心。

### 信件与政府答复

195.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向卢旺达政府发信, 转交了有关 Alfred Chafubire先生死在拘留所中的材料。根据收到的材料, Chafubire先生是圣公会的牧师, 是Kibungo 首府 Gahini 中学校长。他于1990年12月6日被捕并被转移到 Rwamagana的拘留中心, 于当日死亡。据称第二天有人看见过他的尸体, 根据这些目击者的说法, 他的肢体肿胀, 显示出残暴酷刑的痕迹, 是酷刑导致他死亡。同样的来源报告说, 当局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对死因进行调查和确认。Chafubire 先生属于 Tutsi族, 这位提供材料的人士说, Tutsi族是以乌干达为基地的叛乱运动的主要力量, 叛乱力量于1990年10月向东北地区发动了进攻。据说最近许多人因被怀疑同情叛乱运动而被逮捕, 据报告被捕者中许多人遭到殴打和虐待。在国家安全法院审判的13人中, 好几个人告诉法庭, 治安力量的成员对他们殴打和虐待, 进行逼供。然而, 根据该来源的报告, 对这些指控, 法院没予考虑。

196. 1991年5月20日, 政府转来一份1991年3月20日司法部公布的第 1488/05号审前记录, 涉及“对拘留案件的调查和对受指控但受到不正当拘留的人的释放”。

### 沙特阿拉伯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197.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沙特阿拉伯政府, 转交了一些材料, 材料称在前几个月沙特阿拉伯官员制造了多起酷刑和虐待事件。受害者据说大部分是也门公民或也门裔人, 他们是1990年逮捕的数百名也门公民的一部分。据称逮捕和拘留过程中使用了酷刑, 包括严厉拷打, “法拉卡”(打击脚底), 剥夺睡眠, 侵入水中, 电击。特别报告了两个具体案件, 一个受害人是Amin Shenad al -Shawafi, 另一

个受害人是Sad Abdo Abraham al-Shami。

198. 1991年2月28日政府答复说，这些指控是“完全捏造的，毫无根据”并说：

“住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也门公民受到沙特阿拉伯和人民的善待……，然而……沙特阿拉伯政府先前曾给予也门公民一些豁免，使他们免受适用于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外国人的一些规章和条例，但这些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被取消了。这些行动不是针对也门人民的，而是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国家期间也门政府不负责任的反应的表现。”

### 塞内加尔

### 信件

199.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塞内加尔政府，转交了一些材料，材料说1990年下半年在该国南部Casamance地区，残暴虐待的案件增多了。在多处案件中据称被关押者在狱中受酷刑而死。大多数受害者被疑为称作“卡萨曼斯民主力量运动”的成员或同情者，或被怀疑向他们提供了武器和食品。然而在某些案件中，“运动”成员的近亲也被逮捕，受到酷刑。转交了下列因酷刑而死亡的案件：

- (a) Assoua Diabone, 30岁, 农民, Oussouye人, 1990年7月被捕。据称受了酷刑, 被转到Ziguinchor医院, 后又转到达喀尔的监狱。他死在那里, 显然是因酷刑受伤而死;
- (b) Ganguilo Djibalène, 农民, 30岁, Oussouye人, 于1990年7月被捕。据称, 他受过酷刑, 被转送到Ziguinchor医院医治后送进达喀尔监狱, 而死在监狱, 显然是受伤后医治无效致死;
- (c) Sékou Mary, 别名Agnocoune, 58岁, 农民, Kabiline人, 1990年10月23日他在Brikama被冈比亚警察逮捕, 当时他和另外九名塞内加尔人躲在那里。冈比亚警察将他交给塞内加尔当局。据报告他受到Diouloulou的警察酷刑虐待后死亡;
- (d) Younouss Djiba, 27岁, 农民, Ziguinchor省Kaguitte人, Ampa Dakar, Oussouye省Yotou人。两人都被怀疑是“卡萨曼斯民主力量运动”的成员, 1990年10月被治安人员逮捕。据报告他们被驻扎在Kaguitte兵营的武装部队的成员活活打死。

200. 报告的其他酷刑案件涉及下列受害人:

- (a) Binta Niassy, 33岁, 1990年6月24日在Kabiline 被捕。士兵们原为寻找他的丈夫, Tata Sudio, 但他不在家。据报告士兵们殴打已怀身孕的Niassy夫人, 强迫她躺在军车地板上, 好几个士兵抽打她, 另有几个士兵用脚踩她。她没有受到指控, 被释放了, 但随即发生流产;
- (b) Laminé Sané, 30岁, Sédhiou省Diafar-Douma 人, Fatoma Diatta, Bignona省Tendouck人, 1990年6月, 在发生一起伤害到10人的手榴弹攻击事件之后, 他们在Bignona被警察逮捕。据目击者说, 他们在Bignona警察派出所被脱光衣服绑在柱子上, 派出所对面就是县长住宅。据报告他们整整一天被绑在烈日之下, 任凭过路者观看, 治安人员用香烟烫他们的皮肤;
- (c) Louis Sadio, 75岁, Lamine Ladio, 70岁, 以及Bignona省Tendouck县Kartiak村的另一些村民, 据称他们于1990年7月13日被军人和警察逮捕, 他们遭到抽打和枪托猛击;
- (d) Atome Manel Diatta, 55岁, Viviane Sagna, 以及 Oussouye 省Colobane地区的另外七名妇女1990年7月被搜找“卡萨曼斯民主力量运动”成员的军人逮捕。这些妇女被转到达喀尔的蒂昂街警察派出所, 不让吃喝长达一星期。

#### 新加坡

#### 信件

201.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新加坡政府, 转交了有关棍罚的材料, 据称这是对某些犯罪行为必须实行的惩罚形式, 例如企图谋杀、武装枪劫、强奸、贩运毒品、破坏财产、非法移民。具体转交了Qwek Kee Chong一案。1987年他被判定犯有武装枪劫等四项罪, 被判处10年徒刑; 他还被命令按四项罪名各打12棍。1988年4月8日他在樟宜监狱一连被打了48棍。据犯人家属说, 棍罚之后, 不得不把Qwek送进樟宜监狱医院治疗。

## 南 非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202. 1991年2月25日特别报告员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事涉 Thamsanga Jack, 35岁, 1991年2月6日他在离国几年之后返回, 在东伦敦机场被捕。据报告, 他被关在不为人知的拘留地点, 法律根据是1982年《国内治安法》第29条。该条准许警察为审讯目的将人隔离关押。过去曾有报告说按照第29条被拘留的人受到了酷刑和虐待, 两个人曾在关押中死亡, 有鉴于此, 特别报告员表示了如下担心: Jack先生很可能在关押期间受到酷刑。

203. 1991年6月12日特别报告员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 事涉 Friedrich W. Brenner, 该人是澳大利亚公民, 1987年被判定犯有杀人罪, 现被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男囚监狱, 服25年徒刑。据报告Brenner先生1986年6月21日在一次事件中受到枪击, 这次事件导致他受审判, 被判刑。据消息来源说, 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尤其是据说他的左肺已经丧失功能, 左臂瘫痪, 视力严重受损, 可能是由于内出血造成的血凝块引起。据称Brenner先生没有得到充分的医疗, 特别报告员对他人身是否完整表示了严重关切。

204. 1991年8月8日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Brenner先生的下列材料:

“一位神经科专家对Brenner先生进行了检查, 报告如下:

他有高血压, 不时心搏过速;

脑电图记录正常;

失去的记忆已逐渐恢复;

左臂知觉降低, 源于枪击事件和脑部受伤。现在状况稳定, 不需要特别治疗;

对于Brenner先生的双视问题, 除了用棱镜镜片外, 很难说有更好的办法。

Brenner先生也经过了一位眼外科医生的检查, 这位医生报告, 眼肌能动性测验完全正常。比勒陀利亚监狱的主管最近确认, Brenner先生收到了一副新眼镜, 并且正在服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监狱当局还保证, 对Brenner先生的身体状况定期检查, 任何时候只要有必要就会给他治疗。”



## 信件

205.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南非政府转交了材料，该材料指称南非警察于1991年7月23日在Caltonville 外的Khutsong 镇逮捕了Frans Mahuma, Thomas Mavundla, Thomas Monene 和Elliot Rampau。未曾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几天后他们获释了。他们获释后即向自己的律师书面陈明情况，在陈辞中他们说，他们在受审讯期间遭受了酷刑为的是逼他们承认某些罪名。四个人都说，他们被迫躺在警察所的一个房间的地板上，双手反绑，两腿也被用绳子绑在一起。三个人头上被压了袋子。四个人都分别指称，警察在他们绑着的手腕中间插上铁棍，或把铁棍插在两腿之间，用电线绑住他们的手指，脚踝骨或腰部。对他们施行电击，直到他们同意在供词上签字。

## 西班牙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206. 1991年1月16日西班牙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全国高等法院对Henri Parot所犯罪行作出的判决的副本(E/CN.4/1991/17, 第152-153段)。根据判决书，Parot先生关于他在受审讯期间受到酷刑和虐待的指控和他向检查他的法医所述的情况矛盾，也与体检报告不符。

207.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向西班牙政府写信转交了他收到的材料，材料称，在民防队和全国警察1990年11月18日和19日在Basque省和Navarre采取的行动中，有34人被捕。其中一些人已经获释，称他们在受关押期间遭到殴打和虐待。Arrate Lejarza和她的妹妹Estibalitz据称被拘留在Basauri。一位法医对他进行了检查，说她们都有酷刑伤痕。Jesús María Salterain曾被关在阿巴迪尼奥，一位法医也对他进行了检查，据报告在他身体各处发现受电击的伤痕。Salterain先生目前被关在马德里的Carabanchel监狱。

## 斯里兰卡

### 紧急呼吁

208. 1991年5月22日特别报告员向斯里兰卡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事涉Ariamalar Gnanakone，据报告他1991年5月9日在科伦坡被刑事调查局逮捕。根据材料来源，她从1991年5月9日至15日被关在科伦坡警察总部，她在那里受到严重虐待。根据一位监狱医生的建议，Gnanakone女士5月15日被转到科伦坡总医院，但48小时后她又被带到Welikada还押监狱。她在那里不停地受到拷问。

209. 1991年10月15日特别报告员向斯里兰卡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涉及被关在科伦坡Welikanda监狱医院的S.C.Fernando大夫。Fernando大夫自1987年8月以来多次被隔离关押，不对他进行审判，也不说出他有何具体罪名。据称他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酷虐待，特别报告员担心他的身体和精神完整可能受到危害。

## 苏丹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210. 1990年12月20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涉在喀土穆被捕的三位知名的苏丹南方政治家。他们分别是：Peter Cirrilo，1986至1989年任Equatoria省省长；Eliaba James Suruv，人民进步党主席；Samuel Arrew Boll，苏丹南方政治联盟主席，前副总理。据说三人都被隔离拘留，但没有被控以任何罪名。另外据报告，Peter Cirrilo遭到严厉酷刑。

211. 1991年2月18日政府作了答复，说特别报告员收到的材料

“完全不符合事实，在南方政治家与国家元首会见之后，上述人等并没有受到有关当局逮捕。上述各人更没有受到酷刑，也没有剥夺他们到医院接受治疗或与家人团聚的权利”。

212. 1991年4月23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事涉Moses Macar教授，他45岁，Juba大学教授；和Richard Hassan Kalam Sakit教授，外科医生，该大学医学院院长。两人于1991年3月底在喀土穆被捕，据说是因怀疑他们与反对派团体即苏丹人民解放军有联系。据报告两人都被隔离关押在喀土穆的秘密拘留所，对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根据消息来源，1989年11月后逮捕的60多人在

被关在喀土穆的秘密拘留所期间遭受到“革命保卫部”成员的酷刑。

213. 1991年5月7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Moses Macar教授和Richard Hassan Kalam Saket 大夫是1991年5月1日释放的299名政治犯中的两人。

214. 1991年6月7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涉Mansour Atta，据说是关押在苏丹港的政治犯。特别报告员对他的人身完整甚至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表示担心，因为有报告指称，他的兄弟Gafar Atta于1991年5月19日死在同一监狱，据说是因受酷刑而死。

215. 1991年10月24日苏丹政府就Gafar Atta一案答复说，他在苏丹港被捕受审讯，随后被释放。但10天以后死于伤寒，有诊断报告为证。至于Mansour Atta，在全国未曾逮捕过叫这个名字的人。

216. 1991年9月23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涉Adam Mohamed Adam 和 Hussein Abdul Karim。据说苏丹中部Sinnar最高法院在判定他们犯有从商店偷窃面粉和糖的罪行之后，判处他们截掉右手之刑。据说这是根据《沙里亚伊斯兰法》制定的新刑法于1991年3月生效以后判处的第一批截肢刑罚，此判决曾提交喀土穆最高法院审核。

217. 1991年10月8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涉Haroun Abdel-karim，据报告Northern Darfur 州Al-Kasher高等刑事法院在判定他犯有武装抢劫罪之后，判处他交叉截肢刑罚(截右手和左脚)。另据报告说这是第三次根据新刑法判处截肢刑罚。判决仍有可能提交喀土穆最高法院审核。

218. 1991年11月25日政府就Haroun Abdel-karim案答复说，此人被一刑事法院指控并判定犯有与武装抢劫有关的严重罪行。然而判决还没有得到高等法院的确认。政府还说，与武装抢劫相关的犯罪具有极大破坏性，在苏丹全国造成很大的生命损失，Darfur州的情况尤其严重。

219. 1991年11月4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事涉下列各人：

- (a) Muawia Jaffar, 1991年10月14日在喀土穆被“革命保卫部”官员逮捕，据说他在这之前曾不让保安部门官员进入他们无权进入的机场一处地方。据称他遭到毒打，被扔在喀土穆的一个小巷里；
- (b) Zein Al-Abdin Al-Tayib Osman, 21岁，一个无业的大学毕业生，据报告1991年10月初在蓝尼罗河省Sennar镇被捕，怀疑他散发了反政府传单。据称在 Sennar 的审讯中心他受到毒打和电击，后被转移到 Sennar 的医院里，据说他在那里被看守着。
- (c) Adnan Zahir Surur, Anwar Abbas 和 Amar Abdel Khalig, 据称1991

年8月在喀土穆被捕，从那时以来一直隔离关押在一个秘密拘留所，既不提出指控，也不审判。Adnan Zahir Surur 据说以前曾两次被捕。鉴于先前的报告曾说，在类似情况下被拘留的人在关在秘密拘留所期间受到“革命保卫部”成员施加的酷刑，所以特别报告员对于上述三人可能受到酷刑表示担心。

## 信件

220.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向苏丹政府写信转交了材料，材料称有300多名政治犯仍被关押在秘密监狱中的单人牢房里，这些监狱被人们叫作“鬼房”。另有报告说，关在Shalla监狱的好几个人急需治疗。消息来源提供了下列名字：Abdelmoneim Salman, 65岁，教师，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胆囊疾病；Samir Girgis, 60岁，Al Tayeb Gedeiri, 律师；Ahmed Abdel Mula, 药剂师；Al Tayeb Gediri, 律师；Galal Al Din Al Sayed, 律师；Usheiri Mahmoud, 大学助教；Hamuda Fatah al Rahman, 医生；Farouq Koudoda, 大学助教；Khery Abdel Rahman, 工程师；Siddiq Al Ziaei, 记者；Al Sheik Al Khider, 公务员；Naguib Nagem El Din, 医生；Ali al Mahxxi Al Sakhi, 劳工；Kamel Abdel Rahman Sheik, 劳工；Mahgoub Osman Moh Khier, 记者；Kamal Al Gezouli, 被关在苏丹港监狱的律师。

221. 下列被拘留者据称遭受了酷刑，他们的拘留地点不详：Mohammed Omar Mirghani, 62岁，苏丹铁路公司前经理；Mokhtar Abdullah, 工会积极分子；Yussef Hussein 前记者，1990年1月11日被捕；Abedel Moneim Ahmed, 经济学家；Nagi Eldayeb, 药剂师；Yacoub Mohamed Ahmed；Hassan al Imam, 据称在苏丹保安部门所在地被折磨致死。

## 泰 国

### 信件和政府答复

222.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给泰国政府写信转交了材料，材料说，有七名来自缅甸的寻求避难者在曼谷的Suan Phlun 移民拘留中心遭到泰国警察的毒打和虐待。他们的名字是：Myo Min Oo别名，Aung Naing Oo, 25岁；Aung Win, 19岁；Maung Maung Lwin；Win Aung 24岁，Aung Htun, 29岁；Aung Naing Oo, 21

岁；Win Thein, 26岁。据报告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寻求避难者曾在拘留中心进行示威，抗议移民局警察官员和犯人中的“积极分子”殴打和脚踢寻求避难者。据称殴打时用了警棍和手枪把子。据称受伤最严重的是Myo Min Oo别名Aung Naing Oo, Aung Win 和Win Aung, 他们抱怨骨头可能被打断和其他伤害，但没有得到治疗。

223. 1991年6月18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泰国皇家警察局对上述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调查显示的情况是：被拘留在曼谷Suan Plu移民拘留中心的缅甸非法移民引起了骚乱，为了制止骚乱，防止没有参加骚乱的附近其他非法移民的安全，移民官员试图将缅甸来的非法移民和其他非法移民分开。在这个过程中缅甸非法移民予以抵抗，并攻击移民官员，但官方还是最后制止了骚乱。官方确认，上述缅甸移民没有一人受到官员毒打，后来这些移民得到一次探访，并会见了一个联合国组织的代表。

## 多 哥

### 信 件

224.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给多哥写信转交了材料，材料说多哥治安力量为镇压1990年10月和11月发生在该国各城市的工人和学生示威活动使用了暴力。有一个叫作Komi Frederic Guenou的技师，21岁，据称他于1990年11月26日遭到一名士兵的毒打，该士兵还将他的右手砍掉。

## 突尼斯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225. 1991年5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突尼斯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交了有关Noureddin Bhiri 的材料。这个人 是律师，据报告于1991年2月20日被捕，但没有逮捕证，从那时以后他一直 被警察关押着。消息来源指出，警方不许他的家人和律师看望他。鉴于收到的许多报告说人被警察关押时都会受到酷刑，特别报告员担心Bhiri先生也可能受到酷刑。

226. 1991年12月16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没有向Nourredine Bhiri先生发

出逮捕证，他完全自由。

227. 1991年4月9日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交了关于Mohammed Moncef Al Triqi 和Abdelaziz Al Buzouadi 的资料，他们都是未经准许的伊斯兰团体Hizb Al-Nahda 的成员。前者于1991年2月17日被捕，后者于1991年2月23日被捕。被捕之后，据说都被警察关押在不为人知的拘留中心并与外界隔绝。据称，从1990年9月以来，有数百名Hizb Al-Nahda 成员或同情者被拘留，那些被关押超过法定期限者据称在拘留期间受过酷刑和虐待。有鉴于此，特别报告员担心这两人也可能受到酷刑和虐待。

228. 1991年12月16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Triki先生和Bouzouadi先生现没有被警察隔离关押。他们分别于1991年6月27日和1991年7月27日被合法逮捕，并分别于1991年7月1日和1991年8月6日提交军事法庭审判。Triki先生是因散布谣言、扰乱和平、参加未经准许的秘密组织而被捕。他因举行一次未经准许的会议而被判处一年零三个月的徒刑。Bouzouadi先生的案件正在审查之中。他被控以如下罪名：叛国罪，非法获取国防机密情报，企图破坏国内安全，盗窃官方文件，煽动士兵加入秘密非法组织。

229. 1991年4月26日特别报告员向突尼斯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交了关于Ajmi Lourimi的材料，他是教师，非官方党团Hizb al-Nahda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于1991年4月5日被捕，被隔离关押在突尼斯内务部。根据被关在同一个地方后被释放的一个人，Lourimi先生在遭受酷刑之后身体状况非常严重。根据这个消息来源，在突尼斯内务部受拘留的人诉说受到酷刑、毒打、电击以及被称作“烤鸡”的酷刑。

230. 1991年12月16日，对于此案，政府说，Ajmi Lourimi先生1991年4月25日被捕，1991年5月4日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在突尼斯人权联盟的成员1991年7月18日访问他时，他当面否认关于他受到虐待的谣传。

231. 1991年11月2日特别报告员向突尼斯政府发出紧急呼吁，转交了材料，材料称Jamal Barakat1991年10月初被警察逮捕，至今仍被关押，但不予起诉。逮捕他是为了迫使其正受警察通缉的兄弟Faisal Barakat自首，他兄弟25岁。根据收到的材料，Faisal Barakat 于1991年10月8日至10日期间被捕，被警察隔离关押。1991年10月17日，他的家人接获突尼斯当局的通知，说他因事故死亡。鉴于有许多报告提到警察对被关押者施以酷刑，特别报告员担心，Faisal Barakat 先生之死可能是遭受酷刑的结果，另外还担心Jamal Barakat先生也可能受到酷刑。

232. 1991年12月16日突尼斯政府就此案件告知特别报告员，Jamal

Barakat 先生现没有被拘留，没有受到起诉，治安部门对他一无所知。关于Faisal Barakat先生，Grombalia 公诉人办公室发起的司法调查显示，他从来没有被捕，他在Grabi公路(在Menzel Bouzelfa地区)边上走时遇车祸死亡。事故发生后他被送到Nabeul医院，因伤不治而死。Nabeul大学医院两名医生接法院命令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查，检查报告说，受害人尸体没有任何污辱人格或非人道待遇的痕迹。

### 信件和政府的答复

233.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给突尼斯政府转交了材料，材料涉及据报告自1987年11月Zine El-Abidine Ben Ali 就任总统以后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被拘留者的权利，其内容包括限制警察关押时间，批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然而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许多酷刑和虐待案件的报告。过去三年里这些案件发生在全国各地。所报告的所有案件几乎都发生在人们被警察关押期间，不许被拘留者的律师或家人探访。据称受到酷刑或虐待的被拘留者大部分是非官方政治团体的成员，如Hizb Al-Nahda(即复兴党)，突尼斯工人共产党以及人民联合党。最常提到的酷刑方法有下列几种：“烤鸡”-- 双手放在膝盖下面绑住，用绳子和铁棍吊起来，用铁棍或塑料管抽打(falaga)--用装有饰钮的木棒抽打脚底，用香烟烫，电击身体敏感部位，用大头棒抽打全身，脚踢，拳打。

234. 下列是一些据报告在过去三年里受过酷刑或虐待的人：

- (a) Sayyed Ben Burawi Ferjani, Lufti Zaitoun, Mohsin Habouria 和 Taoufik Mejri; 四人都属于1987年11月被捕的大约150名前军官或警官;
- (b) Salih Abderrahmane El-Abidi, 1988年1月被捕, 1990年2月14日再次被捕。据说于同日写的体检证明确认, 他身体各处有伤;
- (c) Jamal Abdel Nasir El-Sayari, 1988年10月14日被捕。据说1988年10月27日写的体检证明证实了他的酷刑指控;
- (d) Abdel Kadir Ben Omer Bouazizi, 1988年10月18日被捕;
- (e) Moncefo Matalla, Moulidi Abassi, Mohamed Al-Tahir Hamouda, Mabrouk Abdeljaouad 和Noureddine Brahimi, 五人都是Al-Nahda党的党员, 1989年6月被拘留。据说1989年6月24日写的体检证明证实了他们的酷刑指控;

- (f) Imed Ben Ahmed Amdouni, 1989年7月18日被捕。据说他于当日遭受毒打后被送进医院。据称有一份日期为8月17日的医生证明证实了他的指控。
- (g) Ibrahim Rejichi, 1989年8月19日在Monastir被捕。据称他受到警察毒打。1989年8月30日写的一份医生证明确认他患有失眠和焦虑症;
- (h) Fathi Ali Hachad, 1989年9月6日被捕。据称他受到各种形式的酷刑, 包括性骚扰;
- (i) Murtada Labidi, 被指控参加了突尼斯工人共产党, 1989年9月16日被捕。据称在审判他时法庭承认警察使用了酷刑对他及和他一起受审判的人逼供, 但当局显然没有对有关酷刑的指控进行调查;
- (j) Mohammed Mezzi, 1989年12月26日被捕;
- (k) Raouf Gritli, Tarek Sallami 和Nazir Ouni, 在参加拥护al-Nahda党的示威后在突尼斯被捕, 但被捕日期不详。1990年3月18日签发的医生证明确认了他们关于酷刑的指控;
- (l) Hedi Ben Allala Bejami, 1990年4月9日在Ilam被捕。据说他受到各种酷刑, 其中有性攻击, 电击, 往嘴里塞粪。医生证明证实了他的指控;
- (m) Raouf Mthlouti, 11岁, 1990年6月以偷窃罪名而被捕。据报告他在Ariana 警察派出所遭到毒打, 医生证明证实了他的指控;
- (n) Monji Jouini, 1990年12月19日被捕。根据后来获释的其他犯人, 他受到毒打和酷刑, 结果他现在多处受伤, 他的脚趾也被打断。

235. 1991年5月30日突尼斯政府就促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问题向特别报告员发来数份文件。来自内务部的一份文件是关于禁止酷刑, 来自教育和科学研究部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在学校课程中开设的若干科目。文件中还有一份1991年1月7日颁布的关于人权的基本自由高级委员会的法令的文本以及1987年11月26日颁布的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某些条款的法律的文本。然而, 对于特别报告员在信中提到的具体案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236.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写信突尼斯政府, 转交了他又收到的、指称又发生一些酷刑和虐待案件的材料。有一些案件是在拘留期间受酷刑而死亡的案件。死者是被拘留的非法伊斯兰组织Hizb al-Nahda的成员。据报告, 被警察看押期间最可能受到酷刑, 并且无法和律师或家人取得联系。下列是据报告在1991年4月至6月期间受到酷刑或虐待的一些人:



- (a) Abdelaziz Ben Hamuda Mahuashi: 他于1991年4月21日被捕, 他的家人到1991年4月30日才接到通知, 并且是他已死亡的通知。根据国防部, 他心脏病发作, 但根据Habib Thameur军事医院的人讲, 他到医院后已经死亡。没有向其家人提供死亡证明, 尸检报告或其他医学报告, 说明死因;
- (b) Abdel Raouf Laaribi: 他于1991年5月3日被捕, 被看押在内务部内, 直到他于1991年5月26日或27日死亡。根据突尼斯当局, 他死于心脏病, 但他的家人并没有收到任何医学报告。家人被命令立即将尸体掩埋, 这样就避免了解剖检查, 因而也就不会确定死因。根据消息来源, Laaribi在被看押期间受到酷刑, 酷刑之后死亡。

237. 1991年12月16日, 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Abderraouf Laaribi先生没有被警察逮捕和拘留。现已开始进行司法调查, 以确定他的死因。

238. 1991年10月18日, 特别报告员致函突尼斯政府, 转交了所收到的关于据称被保安部队官员逮捕、后又遭受酷刑的al-Nahda 伊斯兰运动成员 Al-Ajami al-Wureimi、Sadiq Shouru、Abdul Majid al-Zar 和 Ali Sneitir 的材料。Al-Ajami al-Wureimi 是 al-Nahda 伊斯兰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 据报他因遭受酷刑而患了精神病。

239. 在拘留中死亡的另一名成员 Fathi Khiari先生的案件也已提交该国政府的注意。Khiari先生33岁, 生前是邮局部门的公职官员。他于1991年7月16日被警察逮捕, 当时警察没有出示逮捕证。他的家属和律师都没有得到任何有关他的法律地位或下落的信息材料。1991年8月5日, 他们得悉 Khiari 先生已死。更为严重的是, 官方不许他们去检查尸体, 也没向他们发出医疗证明或验尸报告。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人指称他在警察局拘留期间受到虐待, 担心 Khiari 先生可能死于酷刑。

240. 1991年12月16日, 政府说, 有关Sadok Chourou先生、Ali Sneitir先生和Abdelmajid El-Zar先生的案件正在调查之中。他们分别于1991年6月29日、1991年6月18日和1991年7月10日被逮捕, 并于1991年7月8日、1991年6月28日和1991年7月18日被送交军事法庭。Sadok Chourou 先生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罪名是损害国家内部安全, 盗窃官方文件, 煽动士兵参加非法组织。有关 F.Khiari 先生的案件, 现有资料证明他已死亡。现已开始进行司法调查, 以确定他的死因。

241. 在1991年12月16日的上述信中, 突尼斯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 已采取和执行了各种措施, 目的在于:

- (a) 规定警察拘留和审判前拘留的限期。1991年11月26日通过第87-70号法令，规定警察拘留不得超过4天，如政府公诉人提出书面授权，可延长同等时间，如属绝对必要，还可延长两天（《刑事程序法》第12条）。此外，司法警察官员须在警察拘留人的地点备有特别登记簿，留出适当空白，以记录被拘留者的身份，说明拘留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和时间。同样，被拘留者或他的长辈、后辈、兄弟姐妹或配偶中的一人可在警察拘留结束后要求对被拘留者进行医疗检查。报告必须由被拘留者签署，其中也应提及这一要求。审判前拘留必须根据预审法官的命令执行，期限不可超过6个月，不过预审法官必须在4天内对任何保释请求作出答复；
- (b) 防止任何种类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刑法典第101条和105条规定，任何公职人员或同等类别的官员，在执行公务时，如为了取得供词而对任何人（被告、证人或专家）使用或命令使用暴力，可判5年监禁并罚款。突尼斯政府特别确保这些条款得到遵守。如果收到有关违反司法规定的指控，将立即进行调查，并给予必要的处罚。

242. 突尼斯政府还告知特别报告员，一个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委员会已经成立，它的调查证实在突尼斯没有任何人被单独监禁。委员会发现了一些由个人的非法行为造成的过分情况，这与政府的政策相违背；委员会报告说，已开始了司法调查，并对责任者采取了惩治措施。而且，突尼斯人权联合会的一个代表团在收到有关囚犯遭受虐待的指控后探望了这些囚犯，发现这些谣传是没有根据的。

## 土耳其

### 紧急呼吁和政府的答复

243. 1991年，特别报告员代表据报被逮捕、担心有可能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人士向土耳其政府总共发出了14份紧急呼吁书。这些人的名字以及政府作出的相应答复记述如下。发出紧急呼吁书的日期在名字的后面用括号列出。

- (a) Mehmet Sen, Abdulkadir Erdem, Yahya Deniz, Ali Atsay, Murat Atsay, Neymetullah Simsek, Cahit Aktay, Hamdullah Aktay, Hamit Alay, Mehmet Alay, Eyp Demir, Sinan Ayebe, Ali Atay, Fethi Yukler, Orhan Orug, Mizgin Onen, Demiran Onen and

Osman Karakas(所有人都是马尔丁省附近的 Derik 镇人)and Mahmut Aktas, Mehmet Salih Aplu, Mehmet Salih Dar and Berzam Aplu (是迪亚巴克尔省附近的 Darbest 村人)(1991年1月17日)。

(一) 这些人据报都是在1991年初被逮捕的。据报逮捕是在 Derik 村另一居民 Yakup Aktas 1990年11月在拘留中死亡以后。Yakup Aktas 死前曾被拘留,后被带到马尔丁省宪队总部。1990年12月25日的验尸据报证实死者的头部和肩部有大部位的割伤和擦伤。Yakup Aktas 的哥哥和弟弟 -- 他们的名字不详 -- 也于1991年11月在 Derik 村被拘留。

(二) 关于这些案件,政府于1991年2月8日的答复说, Yakup Aktas 的死因正在调查, 他的兄弟都没有被拘留。关于Derbest 村的居民, 答复证实, 没有这样的村庄存在。特别报告员信中提到的这一村庄居民名字也都没有出现在有关当局的被拘留者登记簿上。信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人没有在任何时候被监禁、或被拘留、或被释放。

(b) Ibrahim Bingol, Cavidan Kocaacar, Metin Gunaydin and Mehmet Tuzcu (1991年3月6日)。

(一) 这些人据报是1991年2月17日或这一天前后在安卡拉被拘留, 拘留后带到安卡拉警察局政治处。另据报道,1991年1月16日一名名叫 Birtan Altunbas 的医科学生在安卡拉警察总部上述政治处被单独拘留6天后死在医院里, 据同被监禁的人说, Altunbas 先生在拘留中受到了严重酷刑。

(二) 1991年6月26日, 政府就对上述人员的指控和对他们提起的法律诉讼情况通报特别报告员。关于 Ibrahim Bingol先生和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先生遭受酷刑的控诉, 政府说, 对此正在调查。关于 Birtan Altunbas 先生的案件, 政府说, 他进行绝食, 由于缺乏营养肺部充水, 造成心脏机能不全, 最后死在医院中。

(c) Ahmad Seyid Ahmad, Daryus Lorestani, Manije Manhacar Saliyani, Nader Hodapanani, Abbas Rustami Gomi, Hamid Hamidyan, Mahdi Javadi Nojad, Seyid Monnirirad, Bijan Barzinner and Samad Masadban (1991年3月18日)。

- (一) 他们据说都是伊朗的政治难民，于1991年3月2日左右被警察政治处拘留，带到安卡拉警察总部。
  - (二) 1991年4月15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这些人因被指控建立犯罪组织而被拘留。他们在安卡拉国家保安法院检查处受到审讯，审讯后，大部分人于1991年3月14日被释放。检查官对其中4人(Ahmadi 先生、Galamin 先生、Berzinmer 先生和 Kardestami 先生提起公诉。据证实，信中提到的所有人没有受到虐待。答复中附有法医发出的医疗报告附本(用土耳其文撰写)。
- (d) Cemal Kahraman 博士(人权联合会 Nusaybin 分部主席); Mecit Akgun, (记者兼人权联合会成员); Suleyman Balan, (人权联合会成员); Mehmet Baycal (人权联合会成员); Abdulhamit Aslan, (人权联合会成员); Muhittin Anter, (人权联合会成员, Nusaybin 市政会成员) Sukru Ekmen, (马尔丁市政会成员); Aydin Dogan 和 Mehmet Ornan (1991年3月27日)。
- (一) 上述人士是1991年3月17日因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被拘留的，在该事件中 库尔德工人党的5名成员在Omerli 镇附近的冲突中被枪杀后草率掩埋。据报上述人员被带到执行紧急立法的马尔丁省宪兵团总部。
  - (二) 1991年6月3日，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经过正当的审讯和调查后，Mecit Akgun 和 Suleyman Balan 被逮捕，其他人获释。调查表明，他们在拘留期间没有遭到任何形式的非法待遇，调查结果可由医疗报告证实。而且，有关人士在拘留期间没有人要求会见律师。
- (e) Zeynep Aldogan (1991年4月5日)。
- (一) 以上这 名女学生据报于1991年3月20日在学生游行期间在安卡拉被拘留，后被带到安卡拉警察总部政治处。另据报道，她曾于1988年7月被拘留，并遭到了虐待。1988年8月11日法医医疗研究院发出的一份报告据说证实她的指控。
  - (二) 1991年5月27日，政府答复说，她因参加非法的分裂主义宣传会议而被拘留，后于1991年3月29日获释。她在拘留期间没有要求会见亲属或律师。医疗报告证实，她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非法待遇。

(f) Devrim Sezen, Murat Ozturk 和 Ulker Karayel (1991年5月13日) 是学生, 于1991年5月1日因参加劳动节的活动在伊斯坦布尔被拘留。前两人据报道被带到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政治处, 第三人 Ulker Karayel 在伊斯坦布尔 Kadikoy 地区被拘留。

(g) Omer Ozer, Resit Altin, Faik Yilmaz, Mehmet Silik, Celal Cicek, Ibrahim Guclu, Ahmet Ozhan, Bedri Erdem, Ismail Esmeray, Nezim Ozkan, Nuriye Erdem (12岁)、Sedika Bestas (13岁)、Ismail Olcay Aran, Fidan Yabaneri (1991年5月23日)。

(一) 上述前10人是锡尔特省附近Payamli村的村民。关于他们的案件, 据称他们于1991年4月5月夜间被迫在村宪兵所以东的壕沟里蹲伏几小时, 目的是在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可能进攻时用来作人体盾牌。Nuriye Erdem 和 Sedika Bestas 是同一个村庄的人, 他们于1991年4月30日以来一直被关在锡尔特宪兵队。Ismail Olcay 和 Fidan Yabaneri 是迪亚巴克尔大学的学生, 他们在1991年5月1日被拘留。法庭审讯后, 他们没有获释, 但地方当局否认他们仍在拘留中。有人认为, 他们被带回警察拘留所是要对他们作进一步调查。

(二) 政府在1991年10月1日的信中就Ismail Olcay和 Fidan Yabaneri 的案件答复说, 这些人因1991年5月1日参加在迪亚巴克尔举行的非法游行、反抗警察而被逮捕拘留。他们已于1991年5月7日在迪亚巴克尔被有关检查处释放。有关他们在审讯后又被带回警察局拘留所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关于 Omer Ozer, Resit Altan, Faik Yilmaz, Mehmet Silik, Celal Cicek, Ibrahim Güçlü, Ahmet Ozhan, Bedri Erdem, Ismail Esmeray 和 Nazin Ozkhan 的案件, 政府说, 有关这些人遭受虐待以及被用来当作抵御恐怖主义可能进攻的人体盾牌的指控,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最后, 关于 Siddika Bestas 和 Nuriye Erdem 的案件, 政府说, 他们的出生日期分别是1973年是1975年。他们曾一度参加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 在返回村庄时被逮捕。审讯后, 他们被带到法庭, 法庭裁定应对他们进行逮捕。有关这些人的医疗报告证实, 他们没有受到虐待。

(h) Barbara Anna Kistler (1991年6月4日) 为瑞士公民, 据报她于1991

年5月20日在伊斯坦布尔被拘留，后被带到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第一政治处。1991年6月27日土耳其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通报了拘留该人士的情况。除其他外，还证实，Barbara Anna Kistler 在拘留期间，瑞士总领事和她的律师探望了她。在拘留期结束时，伊斯坦布尔法医部的专家给她进行了身体检查，证实她没有受到任何的虐待。此外，信件所附瑞士报纸1991年5月31日的一篇文章称，Kistler 小姐告诉前去监狱探望她的瑞士副领事，她自10天前被拘留以来没有受到虐待。

(i) Cavidan Kocaacar, Murat Demir, Bedii Yarayici, Deniz Teztel, Tulay Avci, Fatma Ocalan, Hatice Suna, Ummet Suna, Necmi Suna and Lutfi Topal (1991年6月26日)。

(一) 据报，Lsmail Selon 将军1991年5月23日在安卡拉被暗杀后，上述人士以及若干不知名者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警察行动中被拘留，后被带到安卡拉警察局。Murat Demir 是位律师，是Halkin Hukuk Burosu 法律行动成员；Cavidan Kocaacar 是囚犯亲属团结协会前主席（有关该人，特别报告员曾于1991年3月6日发送一份紧急呼吁书，并于1991年6月26日收到答复（见以上第243(b)段））。这两人于1991年6月13日在警察搜剿该法律行动时被拘留。据报道，当局6月19日带到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指称是Dev Sol 非法组织成员、涉嫌参与该组织武装活动的几个被拘留者中有这两人。自1980年军事政变以来报道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所有审判的记者 Deniz Teztel 也于1991年6月14日在伊斯坦布尔被拘留。另据报道，律师要求探望上述三名被拘留者的申请书被检查官拒绝。

(二) 政府在1991年10月1日的信函中通报特别报告员，Ummet Suna、Hatice Suna(Sahin)、Fatma Ocalan 和 Tulay Avci 女士于1991年6月4日被拘留，Necmi Suna 于1991年6月7日被拘留，Lüftü Topal 于1991年6月10日被拘留，Bedii Yarayici 于1991年6月12日被拘留，Murat Demir 和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于1991年6月13日被拘留，Deniz Teztel 于1991年6月15日被拘留。Fatma Ocalan 和 Tulay Avci 于1991年6月11日获释。Luftu Topal、Ummet Suna、Hatice Suna (Sahin)、Murat Demir、Bedii Yarayici、Deniz Teztel 和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被送交安卡拉州保安法院。对他们的指控如下：

Lüftü Topal： 为“Devrimci sol”非法组织成员，向该组织运送炸药弹药； 向该组织领导人提供暗杀 Temel Cingöz将军所使用的手枪之一； 为筹划暗杀 Ismail Selen将军搜集资料；

Ummet Suna： 介绍 Cingöz 将军暗杀凶手之一 Adnan Temiz 参加“Devrimci sol”非法组织，帮助 Adnan Temiz 准备暗杀 Cingöz 使用的手枪之一；

Necmi Suna： 提供暗杀 Cingöz 将军使用的手枪之一；

Murat Demir、 Bedii Yarayici、 Deniz Teztel、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为“Devrimci sol”非法组织通风报信，是该组织成员；

Hatice Suna(Sahin)： 是“Devrimci sol”非法组织的成员。

政府补充说， 1991年6月28日， 法庭因缺乏证据决定释放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但将其他人拘留。据证实， 有关人士在警察拘留期间没有受到虐待。安卡拉检查处将有关 Habibe Cavidan Kocaacar 遭受酷刑的指控的档案转交在安卡拉警察局。 检查处正在调查有关 Bedii Yarayici、 Tulay Avci、 Hatice Suna、 Nemci Suna、 Murat Demir、 Deniz Teztel、 Fatma Ocalan、 Ummet Suna 和 Lüftü Topal 遭受酷刑的指控。

(j) Selahattin Cengiz (13岁)、 Halil Bardu 和 Sukru Kil (1991年7月5日)

(一) 上述人士据报于1991年6月23日在 Pervari 附近的 ErKent 村被宪兵拘留， 后被带到 Doganca 宪兵队。以后， 他们又被转移到 Pervari 宪兵总部。

(二) 1991年10月1日， 土耳其政府通报特别报告员， 这些人因帮助恐怖主义组织、 窝藏该组织成员于1991年6月24日被拘留。他们被送交锡尔特检察处， 检察处于1991年7月1日决定将他们释放。他们在拘留期间没有要求会见律师。医疗报告证实， 他们在此期间没有受到虐待。Selahattin 的身份证表明他生于1972年。

- (k) Sevgi Erdogan、Cavidan Kocaacar、Fatma Patlar、Aliye Kaskir、Fatma Gulden Sesen 和 Nilufer Alcan (1991年6月23日)。所有这6名妇女据报于1991年6月14日在一次警察活动中被逮捕，后被关在伊斯坦布尔 Ozgur-Der (权利和自由协会) 办事处，又被带到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Cavidan Kocaacar 曾在1991年2月被拘留24天，在1991年6月13日被拘留15天。(她是1991年3月6日至6月26日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及的几个人之一)。
- (l) Teufik Ozer (1991年8月23日)。
- (一) Ozer 先生是人权协会成员和人民劳动党主席，他于1991年8月14日在该镇被逮捕。据称，他遭到警察的毒打，之后被开车送到锡尔特警察总部政治处。另据报道，几位旁观者目击了这场毒打，而且说警察还威胁要杀他。
- (二) 1991年11月14日，政府通报特别报告员，Tevfik Ozer 先生是根据锡尔特省警察局的命令被拘留的，又根据该省警察法庭的裁决被送进监狱。迪亚巴克尔省保安法庭检察处进行了调查之后，于1991年9月4日对他提起公诉，诉讼目前还在进行中。根据卫生部门医疗检查后所拟具的报告，Ozer 先生被带到锡尔特省检察处时身上没有遭到殴打或被使用暴力的痕迹。
- (m) Mustafa Dalgic、Mehmet Oral，人民劳动党负责人；Fatos Yener，人民劳动党 Iskenderun 分部执行委员；Erdogan Yener；Farak Soylemez，人民劳动党 Iskenderun 分部执行委员；Huseyin Gokalp，社会党 Iskenderun 分部主席；Elif Reyhan；Nevruz Aydar；Teyibet Aydar (1991年9月17日)。
- (一) 1991年9月2日，约40名送葬参加库尔德工人党的一名积极份子葬礼被拘留者，这9个人据报是其中一部分，逮捕后被送到土耳其南部锡尔特省 Isken-derun 的警察总部。
- (二) 土耳其政府1991年11月11日去信通报特别报告员，因为葬礼变成非法的集会，有37人被逮捕，其中包括 Mehmet Oral，Farak Soylemez 和 Elif Reyhan，全部被送交马拉蒂亚省治安法庭。Mustafa Dalgic 没有被拘留。根据马尔蒂亚省保健医院拟具的报告，被拘留者受医疗检查，没有发现被拷打的迹象。
- (n) Hüsegün Toraman (1991年11月5日)，于1991年10月27日在伊斯坦布



尔被拘留，据说被单独关在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来源进一步报告说，警察在这之前大约6个月拘留了 Hüsegin Toraman 的父亲 Ali Reza Toraman 先生，对他施以酷刑，直至他同意将警察带往他儿子所在的地点，据说警察官员在 Hüsegin Toraman 躲藏期间对他的住宅进行了一贯监视。

244. 1990年12月14日，土耳其政府致函特别报告员，答复其1990年11月28日关于1990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被拘留的几个人的紧急呼吁书(见E/CN.4/1991/17第186段)。土耳其政府告知特别报告员，他信中提到的几个人因被指控参加非法武装组织，违反了结社开会法。其中两人的律师提出了一项投诉，声称尽管他得到检察官许可，仍被拒绝与当事人见面。他将根据上述投诉对有关官员提出适当的法律诉讼。有几人已获释放。关于这些人在拘留期间遭受酷刑的指控，信中有以下说明：

“伊斯坦布尔警察官对关于以下人员遭受虐待的指控进行了调查：Imam Fidan、Nazan Celiker、Mustafa Eser、Ibrahim Sahin、Iman Dögüs、Ali Dögüs、Nurten Demir、Ali Tasösü、Mithat Zafer、Nihat Ozcan、Zeynep Polat 和 Sengül Mert。伊斯坦布尔法医部于1990年11月29日发出有关上述人士的医疗报告，调查目前尚未结束，在调查过程中这报告会等到必要的审议。”

245. 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见以上第23段)，特别报告员还代表 Yavuz Binbay 先生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书。

### 信件和政府答复

246. 1991年4月17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土耳其政府，转送所收到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因涉嫌参与分裂主义组织活动而在土耳其东南部省份被拘留的人士获释后指控说，他们在拘留期间遭受了严重的酷刑。其他地区因涉嫌参与非法左翼报纸或组织活动的人士获释后也提出了同样的指控。酷刑的方法包括殴打、悬吊、电击、夹睾丸、喷高压水、强迫喝盐水和断食断水。报告的案件涉及下列人员：

- (a) 1990年6月和7月在迪亚巴克尔和席尔瓦拘留的 Osman Aytar、Ismail Aydin、Hayrettin Bozkurt、Mehmet Sirin Ay、Isa bozkurt、Abdurrahman Yavas、Salih Yalcin 和 Hanifi Turan;
- (b) 1990年9月21日和22日在一次保安部队行动中与大约其他30人在 Bismil 和该城附近拘留的两名妇女，Mensure Avsar 和 Songul Avsar;

(c) 罪犯亲属团结联合会成员 Fatma Tokay 和安卡拉 Gazi 大学学生 Yasarselcuk。1991年1月24日在一次警察行动中,3人在安卡拉 Tavir 杂志社被拘留,其中有此两人。

247. 另据报告,有几名未成年人被指控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以及参与其活动而被拘留,并遭到酷刑,他们的名字是: Mesut Ozal, (13岁); Rahim Eye, (15岁); Lokman Ozal, Muatafa Bulak, Ilhan Uzun 和 Abdurrahman Tas, (都是16岁); Recep Orhan 和 Hasan Dayan(17岁)。

248. 此外,据报由于受到酷刑,有几名被拘留者在拘留中死亡,或在获释后立即死亡。他们的名字和情况如下:

- (a) Idris Can 1990年12月16日被捕后,被带到伊斯坦布尔 Anadoluhi-sari 警察所,12月20日被关进监狱,抵达后不久死亡;
- (b) Tefvik Timur 1991年1月5日被逮捕,指控他与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他的尸体于1991年1月14日被送交其亲属;
- (c) Birtan Altunbas 于1991年1月9日在安卡拉被逮捕,他的尸体于1991年1月16日被转交给他的亲属(1991年3月6日的紧急呼吁书中和1991年6月26日的政府答复中均提到了这一案件)(见以上第243段(b)小段);
- (d) Haydar Basbugur 因偷盗香烟被逮捕,后被带到安卡拉 Anafartalar 警察局,他被捕两天后,他的尸体被移交给他的家属。警察告诉家属他是自杀身亡;
- (e) Kusim Aras 于1990年12月被捕,1991年2月初获释,获释后三天死亡。根据医疗检查,他的死因是一个月前他尚在拘留中就发生的脑出血;
- (f) Leyhan Sari 因脊骨断裂必须住院。脊骨断裂据称是拘留中遭受酷刑所致。没有其他细节。

249. 1991年6月20日和10月1日,土耳其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对上述有些人提供指控的材料,材料的细节如下:

- (a) Ismail Aydin、 Mehmet Sirin Ay、 Isa Bozkurt、 Abdurrahman Yaras、 Hanefi Turin、 Songiil Aver、 Fatan Tokey 和 Yasar Selçuk: 医疗报告证实,这些人中没有在拘留中受到虐待;
- (b) Salih Yalcin 和 Mensure Avsar: 从来没有拘留过这个名字的人;
- (c) Mesut Ozal、 Rahim Eye、 Lokman Ozal、 Mustafa Bulak、 Ilhan Uzun Abdurrahman Tas、 Recep Orhan 和 Hasan Dayan; Rahim Eye 的

名未出现在有关记录中。这些人都不是15岁以下，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人受到任何形式的非法待遇。Mesut Ozal 和 Lokman Ozal 没有被提出公诉。有关Mustafa Burak、AbdolvahipEge、Hasan Dayan、Recep Orhan、Ilhan Uzun 和 Abdurrahim Tas 的案件已被撤销。

- (d) M. Teufik Timurtas: 他因与非法恐怖主义集团合作于1991年1月4日被拘留，1991年1月14日，他诉说呼吸困难，被带到医院后因心脏跳动停止而死。验尸表明他的肺部结构有缺损。法医处已在进行更详细的医疗调查，Sirnak 的检察官也在对这一案件进行正式调查；
- (e) Birtan Altubas: 这一案件正在调查中；
- (f) Ihsan Basbug: 对两名警察提起的公诉尚未结案。
- (g) Kasim Aras: 他获释后一周死亡，由于Aras先生的哥哥在他死前一天提出控诉，检查官已开始对有关酷刑的指控进行调查。法医处也开始医疗调查，以确定死因；
- (h) Ceyhan Suri 记录未提及这一案件。要继续调查还需要较准确的材料；
- (i) Sman Aytar 和 Hayrettin Bozkurt: 迪亚巴克尔主管法院于1990年5月31日判定他们无罪，他们控诉遭受虐待后，迪亚巴克尔检察院指示对有关人员开始进行初步调查，正在找投诉人，以取他们的证词；
- (j) Idris Can: 对有关警官的调查已经结束，调查材料已送交伊斯坦布尔检察院。

250. 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18日去信向土耳其政府转交了有关资料，根据这些资料，酷刑仍然是土耳其警察讯问犯人的惯用方法。1991年4月新颁布的《反恐怖法》特别规定，有关保安警官参与酷刑事件的任何案件，未经纪律委员会批准，不得提交法庭或进行调查。这一法律给予警察新的保护，让他们不会因酷刑指控被诉。使用的酷刑形式包括：殴打、剥光衣服、电击、“法拉卡”敲打脚掌、夹生殖器、试图强奸、强奸、将短棒硬塞入阴道或肛门、不准睡觉、不给东西吃、不给水喝、在地上拖曳、套上车胎毒打、强迫在湿地上睡觉、强迫听他人受刑、叫人向犯人口中吐痰，不允许使用厕所、拔头发、烧灼、污辱、威胁。特别转交了以下案件：

- (a) Izzet Gümüüşü 和 Tamer Tanrikulu 于1991年2月18日被捕，在警察拘留期间，转入迪亚巴克尔E类监狱之前，据称遭受严重酷刑，后来便中带血；
- (b) Saycan Yalcin、Mehmet Guvel、Muhittin Civelek、Ayse Sultan-

Yazici 和 Sedat Erözsoy 被控参加非法组织 Devrimcisol (左翼革命组织) 于1991年1月4日被拘留, 在警察拘留期间, 据称他们遭受严重酷刑, 包括殴打、用高压冷水喷撒、抽打脚掌、绑手腕悬吊、电击手指和生殖器;

- (c) Sedat Esmer 是中学学生, 据报, 他于1991年4月底被捕, 后被带到迪亚巴克尔防暴警察总部。他在拘留期间受到电击、被高压冷水喷射, 绑手腕悬吊、被拧睾丸;
- (d) Cengiz Gezili 18岁, 据报被控参加库尔德工人党而于1991年6月在加济安泰普的 Akbudak 村被捕。据称在被拘留的10天内遭受酷刑, 包括被电击;
- (e) Hüsnü Kizilkaya (12岁)、Meryem Oral (13岁)和Munenver Oral 都是马尔丁省萨武尔区Pinarder 村人。据报因被控参加库尔德工人党被带到萨武尔区宪兵总部, 在那里受到酷刑和性虐待;
- (f) Islam Aysoy、Ismet Aysoy和Ilham Aysoy据报在库尔德工人党在 Blifis和 Güroymar发起进攻之后, 于1991年5月11日被捕, 据称在宪兵部受到酷刑, 并被强迫吃狗尿。

251. 特别报告员还向土耳其政府转交了所收到的有关 Cemal Kahraman 医生、Mecit Akgün、Süleyman Balan、Mehmet Baysal、Abdülhamit Aslan、Muhittin Anter、Sükrü Ekmen、Aydin Dogan、Mehmet Orhan(特别报告员为此已于1991年3月27日向土耳其外交部发出一封电报, 1991年6月3日得答复)和 Mehmet Yagiz 案件的材料。根据后来的材料, 被拘留者于1991年4月12日送交马尔丁检查长, 其中5人(Cemal Kahraman 医生, Mecit Akgün, Süleyman Balan, Mehmet Baysal Mehmet Yagiz)提出在拘留期间遭受严重酷刑的正式投诉。刑法包括将双手绑起悬吊, 电击和殴打。另据报道, 尽管他们身上留有明显酷刑痕迹, 但医疗检查没有把他们的伤痕记入文件。

252. 特别报告员还向土耳其政府转交了有关 Barbura Anna Kisler 案的资料(特别报告员为此于1991年6月4日向土耳其外交部发出电报, 土耳其政府于1991年6月27日给予答复)以及她对律师所作的陈述。根据后来的资料, Kistler女士被拘留后, 被蒙上眼带到伊斯坦布尔警察总部的政治处。她被连续审讯和拷打达40个小时。酷刑包括被剥光衣服吊在横梁上、用电击她的胸部、乳房和颈部、电击间歇期间用冷水喷淋、被迫坐在椅子上被人在头部后面猛击。短时停顿后, 又继续施刑。她说, 她的伤部后来被涂上特别药水使伤口较快愈合。她没有收到国家法医学院发

出的医疗证明，但在警察拘留所探望她的律师注意到她外部和脸部的伤痕。

253. 关于 Sait Seyit Ahmad 的案件(特别报告员曾于1991年3月18日致函土耳其外交部，该国政府于1991年4月15日给予答复)，根据收到的进一步资料，他在拘留期间遭到毒打。据称他被带到警察总部政治处时已失去知觉，苏醒后发现赤裸身体，被人用高压冷水喷射。

254. 1991年11月8日，土耳其政府就特别报告员1991年4月18日转交的一些案件提供了以下材料：

- (a) Izzet Gümüşcü 和 Tamer Tanri Kulu 为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宣传、向人勒索而被逮捕，被送交迪亚巴克州保安法庭。Tamer Tanrikulu 在初步调查后获释。根据医疗报告，这些人没有受到虐待；
- (b) Sedat E smer 因犯有为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宣传罪而被拘留，他在迪亚巴克省保安法庭审判后于1991年6月12日被判无罪。根据他拘留期间的医疗报告，Sadat Esmer 身体上没有发现任何毒打和使用暴力的痕迹；
- (c) Hüsne Kizilkaya、Meryen Oral 和 Münevver Oral 因设法参加在山区的库尔德工人党部队于1991年5月9日被拘留，在提取他们的供词后，于1991年5月20日获释。迪亚巴克省保安法庭的调查正在进行，医疗报告证实这些人的身体上没有发现任何被毒打或使用暴力的痕迹；
- (d) Ismail Aksoy、Ismet Aksoy 和 İlhan Aksoy：有关这3人在比特利斯拘留期间受虐待和试图使他们吃狗尿的指控，主管法庭1991年5月31日宣布对此事无管辖权，已将档案转交比特利斯省，然后根据省方了解的结果，有可能对此事进行正式调查；
- (e) Cemal Kahraman、Mehmet Baysal、Abdülhamit Aslan、Muhittin Anter、Sükrü Eren、Aydin Dogan、Mehmet Sirin Orhan、Macit Akgün 和 Süleyman Balan 因以下行为在 Nusaybin 被捕后转送马尔丁拘留：参与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收容、窝藏、为该组织作宣传。1991年4月12日，Cemal Kahraman、Mehmet Baysal、Mecit Akgün 和 Süleyman Balan 被关进监狱，其他人则获释。迪亚巴克省保安法庭在继续对该案件进行调查。在被指控的问题中，Mehmet Baysal、Süleyman Balan、Mehmet Yagiz、Ahmet Yigit 和 Harun Bozkurt 在马尔丁治安法院作证时说，他们在审讯时遭到酷刑和虐

待，为此提出控诉。经调查后，档案已交给马尔丁省政府，复审时还有可能进一步调查。Cemal Kahraman和Malit Akgün没有提出受刑或受虐待的控诉和证词；

(f) Barbara Kistler: 在拘留期间见到瑞士总领事和她的律师，拘留结束后，伊斯坦布尔法医组织于1990年6月3日发表医疗报告，证实在她身上没有发现毒打或使用暴力的痕迹。她没有向司法当局诉说有人威胁阻止她讲出狱中的经受；

(g) Sait Seyit Ahmet: 根据已获得的资料，此人已被挪威接受为难民。

### 乌干达

#### 紧急呼吁

255. 1991年5月23日，特别报告员向乌干达政府发出了一份紧急呼吁，有关三名国民议员：Omara Atubo、Irene Apiu Julu 和 Zachary Olum，据报道被拘留，并有可能遭受酷刑。他们是乌干达北部 Lira、Gulu 和 Kitgum 地区的长者和社区首领，于1991年5月8日在坎帕拉总统法院被控叛国罪。他们是三月底以来在该国北部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中据称同数百人一起被捕，随后未经起诉和审判被军方关押。Omara Atubo、Zachary Olum、Irene Apiu Julu 和其他15个人，包括乌干达前驻伦敦高级专员 Andrew Adimola 和一名政治家 Tiberio Atwoma Okeny，一道出庭。据说 Omara Atubo、Zachary Olum 和 Irene Apiu Julu 身上带有在军方拘留期间遭受殴打和虐待的痕迹。有人指称，其他一些被拘留者也遭到殴打和虐待，并不给食物。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256. 1991年1月22日，特别报告员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发出一份紧急呼吁，举出据报道于1990年10月24日在卡拉巴赫 Martakert 地区 Kajavan 村被捕的下列亚美尼亚人：A·Sarkisian、N·Danielian、L·Gasparian、V·Kocharian、A·Babayan、A·Danielian、S·Stepanian、M·Sanian 和 V·

Gabrielian。据称这些人是在隶属内政部部队进行的一次行动中被捕，未经起诉被关押在阿塞拜疆 Shushi 监狱。有人进一步指称他们受到酷刑，包括强奸和殴打，据称是为了逼供。据报道他们的处境很严重，有人表示担心他们可能再次受刑。

257. 1991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有关这事件的详细资料。这事件导致24名亚美尼亚族公民被拘留，随后其中15人获释。进一步报告说，已对A·A·Sarkisian、V·S·Kocharian、S·S·Stepanian、A·V·Danielian等人（一共9人）提起刑事诉讼。作为预防措施，这几个人全被拘留，这种预防措施没有理由改变。被告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调查不公或采用非法调查手段的申诉。

### 信件

258.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发出信函，转交资料称：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犯人受酷刑的做法仍在继续。资料来源引用了下列4名亚美尼亚医生的证词摘录：Valerie Khachaturian，44岁，阿塞拜疆卡拉巴赫人；Sarkis Hagopian，53岁，Getashen 村医院的主治医生，Karabagh，阿塞拜疆卡拉巴赫人；Vartan Hovhannesian 和 Gebork Grigorian，两人都是亚美尼亚人。据报道这4名医生证明说，他们遭到毒打约有5天，完全赤裸地被关在室外监狱营地，据称被雨淋，并被迫赤身睡在无褥铁床上。根据该资料来源，所有这4人在获释时都鼻青脸肿，身上伤痕累累。

259. 根据前犯人的叙述，有人进一步指称，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犯人最常受的酷刑是毒打，常常导致骨折，损伤脊椎和内脏，犯人身上被人行走，被人大小便。还有人指称，强奸也是一种通常的酷刑方式，但没有例举进一步的细节。有人指称，对犯人不允许任何医疗照顾。有一份报告描述了 Shushi 监狱的状况，描述了50名亚美尼亚犯人如何被强迫关进一个9.5平方米的牢房。有人指称，Azeri 的监狱看守从房顶开口处向犯人身上小便。

260. 一些有关斯捷潘纳克特居民案件的报道涉及下列人士：Hzmanov Safaryan、Gamlet Bagiryan、Gennadi Artiunyan 和他3岁的儿子。

261. 除上述外，特别报告员收到了有关苏联其他地区据称发生的虐待或警察暴力案件的资料，报告涉及下列人士的案件：Yu Behtchanov、Yuryi Lvanov、Olga Yantchenko、Genadyan Makarov。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信件

262. 1991年10月18日，特别报告员向联合王国政府发出信函，转交资料称：17岁的 Damien Austin 先生从1991年5月7至10日、再次8月17至20日在贝尔法斯特Castlereagh 警察审问中心被拘留，遭到虐待。他指称说，在他第一次被拘留期间，他遭到警官的辱骂、拳击、脸光并被吐唾沫。他还说，他被人用香烟在脸上烧，裤子和内裤多次被剥掉，用打火机靠近他的阴毛，审问者威胁要把他置于死地。获释后，第二次被捕之前，Damien Austin 声称他经常遭到警察骚扰。他指称，在他第二次被拘留期间，他的胃、喉和手臂以及后脑经常遭到拳击。生殖器被挤压至流血，有一次，脖子被人紧紧箍住，几至昏死。Castlereagh 的值班医生和他自己的医生对他检查后得出结论认为，他曾遭到严重虐待。Austin 先生还声称，在获释之前他受到威胁，说他可能再次被捕，可能被一个亲英派的准军事集团处决。

### 委内瑞拉

### 信件和政府答复

263. 1991年2月14日，特别报告员向委内瑞拉政府发出了信件，转交了收到的资料，其中称，El Dorado 劳改营的犯人遭受酷刑，包括电击和用涂有粪便的刀击打。Amilcar Rodriguez Macias的案件特别值得注意，控诉者说他是一名政治犯。据报道，1990年8月13日，他和同牢房的其他犯人被带到一个地方，遭到电击，殴打和脚踢等。酷刑是当着两名医生的面进行的。其他犯人也被迫观看。

264. 1991年6月7日，该国政府向特别报告提交了由政府检察官办事处人权理事會提供的下列资料：

“1990年8月，委内瑞拉感化总院关押的许多犯人根据司法部长的命令被转到 El Dorado 监狱，他们被指责行为不良。此后，检察署收到家人的许多申诉，说犯人关押条件不好。他们还抱怨说，在这些犯人被转到 El Dorado 之后，探监很困难。由于这些报告，检察署的几个委员会访问了该监狱，视察犯人被关押的条件和他们目前的状况。在其中一次访问



中, Amílcar Rodríguez 声称受到管理人员的虐待, 但没有举出、也找不到证据支持他的指控。后来, 在政府检察官办事处的要求下, 司法部长将犯人转回了他们原来的地方。关于 Amílcar Rodríguez, 他并非如有时所称那样是一名政治犯, 只不过是一名已定罪的抢劫犯。他被转到 El Junquito 监狱, 最近自称那里情况极好, 对关押条件没有任何抱怨。”

### 南斯拉夫

### 信件

265. 1991年8月6日, 特别报告员向南斯拉夫政府发出信件, 转交资料称, 在塞尔维亚科索沃省, 警察施行暴力虐待人。报导详细列举案件如下:

- (a) Lsmet Sopi: 1990年6月12日, 两名警官用警棍殴打他的背、颈和手。据报道, 在这之后 Lsmet Sopi 几乎不能走路, 身上带有严重青肿伤痕;
- (b) Xhevat Sadika, 38岁, Gnjlilane 的一家店主, 据称他在1990年7月23日被警察殴打, 不得不住院直到7月28日。普里什帝纳外科诊所的一份医疗证明说, 他被诊所紧急收留, 以便治疗殴打造成的伤害。
- (c) Alush Gashi 教授, 普里什帝纳大学医学院前院长: 据称他在1990年10月26日被警官殴打。

### 扎伊尔

### 紧急呼吁和政府答复

266. 1991年5月15日, 特别报告员向扎伊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 关于 Elima 日报的出版商和董事 Essolomwa Ea Linganga。根据该资料来源, Essolomwa 先生1991年5月11日在金萨沙政府检察官办事处大楼前面被几名保安部队的侦探和便衣警察逮捕, 被带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Essolomwa 先生在先前被拘留期间曾受到酷刑, 人们表示担心他可能再次遭到酷刑或虐待。

267. 1991年5月20日, 扎伊尔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送交了一份政府检察官编写的关于 Essolomwa 先生的报告, 详细叙述了他被指控所犯的罪行, 叙述了他被拘留

和起诉的情况。根据报告，在上诉法院有10名律师为 Essolomwa 先生辩护，没有一个人提出他遭到虐待，他在所有各次听证中都有人正式代表。根据法律，Essolomwa 先生是一份逮捕状的对象，逮捕状在1991年5月11日他离开上诉法院听证会时开始执行，逮捕理由是他发表谣言，为此他被提交检察官署的一名官员。在 Makala 监狱度过1991年5月11日和12日这个周末之后，5月13日，一名司法官员对他进行了听审，指控他散布虚假的谣言，有可能引起惊慌或煽动反抗当局。此案被列入了一个新的案卷。他从未受过酷刑，他的报纸也从未被查封，在监狱中他继续签署文章，定期在其报纸上发表。除其他外，他在这些文章中报道了他说他在监狱中所看到的一些事实。扎伊尔政府说，在资料送出之时（1991年5月20日），Essolomwa 先生已被保释。

### 信件

268. 1991年8月6日，特别报告员向扎伊尔政府发出一份信件，转交了指称金萨沙 Makala 中央监狱用酷刑以及用严酷拘留条件对待囚犯的资料。据说，犯人被迫在地上睡觉，条件极不卫生，缺少医疗照顾，营养不良。根据资料来源，在1991年4月9日至5月18日期间，有10人因肺结核、虐疾、腹泻、营养不良等原因死亡，另有9人被饿死。提出了一份在 Makala 监狱的21人的名单，他们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心。所有这些人的姓名都已通知了该国政府。

269. 还有报道说，前 Makala 监狱首席医官 Losilo Sokolakamo 医生于1991年5月8日被捕，因为他批准一名犯人去医院，据说该犯人借此机会逃跑。Sokolakamo 医生据说被关押在 Makala 监狱。

### 三、访问以后的行动

270. 1991年8月20日，土耳其政府向特别报告员送交了内政部颁发的一些新规则的案文，有关警察在审问嫌疑犯和听取他们的说明时需要遵循的程序。该案文1991年8月6日送交该国警察当局，其主要规定如下：

- (a) 被关押者在受审问前后以及在提交司法当局之前都必须进行医疗检查，并要有报告证明；
- (b) 在审问中，嫌疑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遭受酷刑、虐待或受到心理或生理压力；

- (c) 审问不得连续超过4个小时，每天不得超过8个小时。两次审问期间应有两个小时的间隔，以便嫌疑犯能够吃饭，休息等；
- (d) 应当仔细地记录有关审问人员的姓名，审问的内容和所说的话，以便主管当局可以进行审查；
- (e) 审问应当坐着进行；
- (f) 不得与受审者争辩；
- (g) 在审问结束后应当起草一份报告并由参加审问者签名，说明审问的目的以及起始时间。

271. 1991年7月19日，菲律宾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第7055号公共法案的副本，该法案于1991年6月20日由阿基诺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题为“军政加强服从民法案，废除某些总统法令，将某些涉及菲律宾武装部队成员、其他受军法管制人员和菲律宾国民警察成员的案件的管辖权交还给民事法院。”除其他外，该法案第3节废除了第1850号总统法令，不再允许军事法院管辖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成员所犯的所有罪行。特别报告员在有关其对该国访问的报告中(见E/CN.4/1991/47, 第269段)建议废除这一法令。

272. 该国政府还于1991年6月18日通知特别报告员，菲律宾人权委员会、国防部、司法部、内政部、地方政府和国民警察签署了一份协议备忘录，规定了在释放被拘留者或被指控者时所要遵循的程序，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踪的事件，即使不能将其完全消除。

273. 1991年7月25日，菲律宾政府向特别报告员转交了一份名单，其中载有该国自1986年以来因严重侵犯人权而被定罪的42名军人。

274. 特别报告员1991年10月17日致函秘鲁政府，1991年10月21日致函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政府，再次要求这几国政府通知它们根据特别报告员访问之后提出的建议而可能已经采取的任何措施。(见E/CN.4/1989/15号文件第187段、E/CN.4/1990/17号文件，第216和254段)。在这方面，秘鲁政府通知人权中心，第685号立法法令已经颁布，授权检察署官员进入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各地的军事设施和警察拘留中心，以便核实被拘留者的情况。

#### 四、结论和建议

275. 几乎没有任何国际法律准则象禁止酷刑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几乎没有任何一项人权如此受到一系列国际文书和机制的注意。所有的普遍人权公约，无

论是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公约，均禁止酷刑。然而，人们认为有必要单独缔结一些专门针对酷刑的公约，着重在全球和区域一级执行禁止。目前，已设立了一些事实调查或监督机制，以便加强防止酷刑的手段，包括：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人权委员会主管酷刑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等。而且，各非政府组织还组织了世界范围的运动，造成舆论对各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结束酷刑的现象。

276. 对酷刑的普遍疼恨表现在这一系列的文书和机制中，无疑是因为酷刑是最卑鄙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尊重人的尊严是所有人权的基础，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一序言段中所反映；酷刑是对这一尊严的绝对否定。

277. 酷刑的做法仍然很普遍，可能部分是由于它涉及一种很容易被侵犯的人权，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侵犯人权的方式。酷刑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在拘留室和刑讯室中单独进行的。而且，它是无名的，受害者几乎从来看不到施刑者的面孔，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被蒙上眼睛，戴上头套。互相尊重的首要条件，目光对视的接触被故意避开。受害者被变为了一个物体。施以酷刑者对受害者而言没有面孔，而且他常常对其社会中同胞而言也没有面孔。只有其帮凶知道他的面孔。没有人生来就是施刑者，施刑者都是逐步被卷入网络，从此再难以脱身。在其所属的小伙伴中，为酷刑的做法找出理论根据；为施刑者解释自己的行为。

278. 荷兰Leiden大学进行了一个关于侵犯人权的根本原因的多学科研究项目，以探索酷刑的原因。这个项目找了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49名军官，同他们进行了会谈，这些国家在1970和1980年代因酷刑的做法而臭名昭著。所有这些军官要么对酷刑的作法负责，要么积极地参与了施刑。研究项目尚未结束，但从这些会谈中已可清楚看出，用刑几乎毫无例外被视为迅速得到实情的唯一手段，而速度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军官说，“敌人”（无论是游击队或“恐怖主义分子”）“常常猛烈攻击过或杀害过军队的成员甚至其亲属。由于“敌人”常常经过良好训练，能够忍受通常的讯问手段，榨取对保护自己人生命至关重要的资料的唯一手段就是酷刑。没有讲明的使用酷刑的理论解释和理由是：“有他无我”。但这也解释了酷刑所引起的可怕的恶性循环，因为在国内战争或国内争斗情况下，敌人并不很容易辨认，凡是不是明显属于“我们”的人，都可能是“他们”。因此，每一位无辜公民或旁观者都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对现任当局提出批评或为其人权受侵犯者进行辩护的人。人权活动分子和人权律师被认为“他们”的一部分，因为不属于“我们”分。一旦在具体案件中使用酷刑被合理化、认为有理，在其他案件中也变得有理由了。潜在的酷刑受害者的范围逐渐变得越来越大，酷刑成为了一种习惯。由

于一般都是私下用刑，要施刑者对其行为负责，可能性很小，即使当局愿意对他们提出控诉。

279. 人权委员会第1991/29号决议重申严重关切不论来自何方在居民中制造恐怖的武装集团和贩运毒品分子在许多国家不断犯下暴力行为对人权的享受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人权经常遭到各种集团最粗暴的侵犯，这些集团都声称是为了争取符合正义的美好社会而奋斗，这确是一个令人深为关切的问题。这种行为与其主张形成最为鲜明的对照，对之应给予明确、无保留的谴责。但是，此种行为绝不能作为当局采取类似行为的借口。所有国际文书都明确地规定，酷刑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甚至在紧急状态下，对酷刑的禁止也不得中止。毫无保留地禁止酷刑是完全有理的；因为国家安全本身不是目的，争取国家安全必须是为了人民的福利，牺牲人权而实现的国家安全是对其本身的讽刺。

280. 如果当局实行或纵容酷刑，司法系统就成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后堡垒。然而，极其不幸的是，人们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司法系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它在坚持法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许多国别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司法机构往往认为，如果政府同人民中那些感到不受保护、而受当局威胁的人之间发生深刻分歧的时候，司法机构应保持公正，不偏向任一方的立场。但是，司法机构应当牢记，如联合国大会第40/32和40/146号决议认可、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司法独立基本原则》原则6所述，“司法独立的原则授权、并要求司法机构确保公正地进行司法诉讼，确保各方的权利得到尊重”。即使由于不能够确定施刑者的身份或由于检察当局消极被动，没有对施刑者提起法律诉讼，司法机构也可以拒绝接受那些它认为可能通过酷刑而获得的证据，或下令释放违犯国家和国际标准而被逮捕或拘留的任何人士，对加强禁止酷刑作出较大贡献。如果司法当局采取这样的立场，用刑就不太值得，因此也具有较小的吸引力。

281.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司法官十分认真地对待其独立性问题，依据上述方针行事，因此受到制裁或被撤职。应当认识到，只有在他们同事消极被动的情况下这种事件才会发生。如果整个司法机构都承认独立性的原则要求司法机构确保各方的权利得到尊重，此种令人遗撼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许许多多的案件中，司法机构都躲在虚假的公正和中立背后，实际上作了最厚颜无耻地侵犯人权行为的当箭牌。

282. 任何司法官员都不再能怀疑被拘留者根据国际法所拥有、并必须得到确保的权利。国际社会已在许多极其重要的文书中制定了这些标准，从经济和社会理事会1957年和1977年核准的《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开始一直到大会1988年

核准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大会1979年通过了《执法人员行为守则》，1982年通过《关于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监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德原则》，都规定了负责管理被剥夺自由者的人的职责。所有这些文件都明确禁止酷刑。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原则》第6条的一个解释说：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一词应加以适当解释，以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防止肉体或精神上的虐待”。

283. 上述文件的大多数都强调司法控制和监督的必要性。《原则》第9条明确规定，逮捕、拘留某人或调查该案的当局只应行使法律授予他们的权力，此项权力的行使应受司法当局或其他当局的复核。这也说明了司法当局在保护被拘留者的基本权利方面可以发挥的极其重大作用。在这方面，应指出，大会1988年12月9日第43/173号决议在核可《原则》时，促请作出一切努力使这本原则家喻户晓，并得到普遍尊重。该决议的这一规定不是具体针对任何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针对各国或各政府，而是普遍针对所有那些有责任确保这些原则得到尊重的人，包括司法和专业组织，如医疗协会。

284. 在指称发生酷刑的案件中保护被拘留者肉体和精神完整的权利，这并非司法机构的唯一重要任务。其在防止酷刑方面的作用可能甚至更为重要。在这方面，必须特别注意被拘留者得到法律咨询的权利。酷刑最经常是在单独拘留情况下发生，此时被拘留者得不到法律咨询。在这方面，可以强调《原则》第18条第3款。该款规定，除司法当局和其他当局为维持安全和良好秩序认为必要并在法律和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中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监禁人接受其法律顾问来访和在既不被搁延又不受检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形下与其律师顾问联络的权利。

285. 许多国家的立法尚未完全同这些国际的高标准相一致。但是，法律推理似乎应是，任何时候一名法官被要求执行某一条法律，他必须将国家法律规则尽可能解释或符合国际标准。这样，国家司法机构在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方面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根据《宪章》，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是所有各国的义务，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司法机构在这方面负有其自己的责任。

286. 令人十分关切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处理其人权遭受侵犯人士案件的律师自己有时也受到骚扰或甚而自己成为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在审查的这段时间内，有9桩案件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在这些案件中，律师被剥夺了自由，并据称遭受了酷刑。这确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世界，那些仅仅履行职责、帮助使人们权

利得到尊重的人本身成为了侵犯这些权利的受害者。

287. 特别报告员在先前的各次报告中都强调预防措施的重要性。作为此种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他提到应建立一个制度，由独立专家定期对拘留地点进行访问。在欧洲理事会的范围内已缔结了一项公约，设立这样一个定期访问的制度。根据该公约设立的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已访问了许多缔约国尽管该委员会严格保密地履行其授权，但有两个缔约国(奥地利和丹麦)决定将委员会访问该国的报告公诸于众。设立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世界范围的定期访问制度想法载于哥斯达黎加1980年的提议，去年经过修订(E/CN.4/1991/66)，目前仍然列在委员会的议程之上。特别报告员希望，防止酷刑委员会发展上述报告将有助于委员会看清此种机构的职能，使委员会能够对面前的这份重要提议作出决定。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委员会在这两份报告中都强调有必要允许独立的国家机构或机关定期视察拘留地点，履行这一职责是对其本身任务的一种补充。该委员会显然认为，建立在国家或国际基础上的访问制度对防止酷刑有很好的效果。

288. 尽管在反对酷刑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缔结了公约，设立了机制，通过了行为守则和原则--但酷刑仍继续到处出现。世界还不能够避免得出下列结论，即在国际一级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国家一级却只有失败。因此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消除国际一级的成功和国家一级的失败之间这种看来难以协调的差距？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则国内外行为之间的矛盾很可能使人犯各国反酷刑运动的口头赞同当作空谈。我们如何将书面的规定转化为在人们衷心赞成的行为规则呢？特别报告员认为，只有社会各级都认识到大家在这方面的责任，照此行事，这一目标才能实现。各国政府应当认识到，它们不能够将反对酷刑这一任务留给以条约机构和为这一目的设立的机制。它们应当在其职权范围内积极支持这一斗争，不断地使那些允许国内出现酷刑的各国政府对此类事件负责。它们可以施加外交压力及可以利用的其他手段来做到这点。

289. 在国内一级，各国政府应当认真地将它们核可的各种国际标准转变为国家保证。通过教育和培训方案，它们应促使执法人员熟悉他们所必须适用的规则。

290. 国家的其他部门--立法或司法机构--也应负起自己的责任，意识到们在保护人权方面可发挥的作用。

291. 各专业组织应从其行业中开除任何一个参与或便利使用酷刑、该行业丧失信誉和荣誉的成员。

292. 各人权组织应当揭露酷刑的行为，每逢当局不采取行动制止或防止酷刑，让它立即受到公共舆论的谴责。

293. 只有通过社会各阶层协调一致和持久的行动，才能战胜和克服酷刑。世界人权会议将于1993年在柏林召开，这前景应当激励大家更加努力，消除这种对人的尊严的最恶劣的攻击。

294. 最后，特别报告员要提出下列建议，其中许多已列于先前报告之中：

- (a) 尚未批准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各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
- (b) 司法机构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保证被拘留者根据国际和国家标准所拥有的权利；
- (c) 单独监禁的人容易受刑，应宣布为非法。发现任何人被单独监禁应当立即释放；
- (d) 同律师接触是被剥夺自由者的基本权利之一，同律师定期接触有预防酷刑的效果。因此对会见律师权利的限制应当是例外的情况，并总是将其置于司法控制之下；
- (e) 被拘留人，只应在官方中心受审讯。所有审讯均应当根据《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23条进行。除非经本人在官方中心的审讯中确认，非官方审讯从被拘留者那里取得的证据不得用作法庭证据。在审讯中严禁蒙上被拘留者的眼睛或戴上头套；
- (f) 拘留地点应当定期由独立专家视察。在条约基础上建立定期访问拘留地点的制度是一种极其有效防止酷刑的措施，应当给予认真考虑；
- (g) 对酷刑的申诉应当立即处理，应当由独立当局调查，该当局应同调查被拘留者涉嫌犯罪行的当局没有任何关系。在这方面，可以建议设立一个巡视官或有权调查和起诉的独立人权委员会；
- (h) 一旦发现有关酷刑的申诉有理，应立即向受害者赔偿；
- (i) 一旦发现有关酷刑的申诉有理，施刑者应当受到严厉处罚。如果发现酷刑是在官方拘留点发生的，该处的负责官员应当受到纪律制裁或惩罚；
- (j) 特别报告员不断收到有关医务人员参与施刑的资料，他希望重申先前的建议，职业医疗协会应对此种败坏其行业名誉者采取严厉措施；
- (k)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款，每一位被拘留者应有权在其被逮捕后立即就其拘留是否合法问题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载有同样规定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歧视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32条对紧急状态的情况未作任何例外的规定，在包围或紧急状态的



情况下，被拘留者也应有权行使这一权利；

- (l) 对执法和保安人员的培训方案应当反映对所有被拘留者固有尊严的尊重，特别是，应当指示此种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不得服从上级下达的施行酷刑的命令；
- (m) 提醒各国政府，在反对酷刑方面，它们可以利用联合国人权中心的咨询服务方案。

XX XX XX XX XX